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3期 | VOL.47 NO.5



5 · 2025

TAIZHOU XUEYUAN XUEBAO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学位点简介

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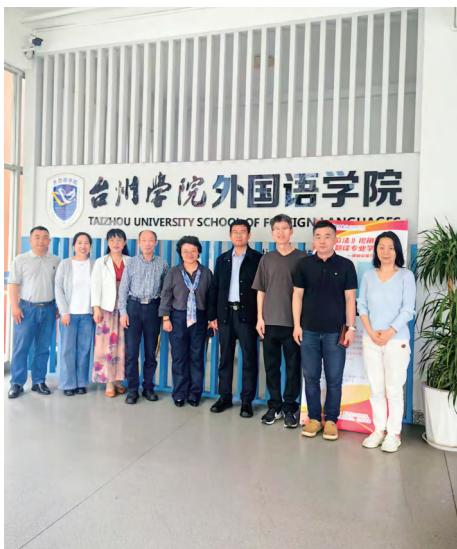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成立于2003年，前身为台州师专外语系，是浙江省较早开始培育外语人才的院系之一。2024年9月，外国语学院成功获批翻译硕士学位点，于2025年开始招收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英语笔译硕士。学院秉承“厚德、明道、求真、笃行”的院训精神，围绕“教学立院，学术兴院，人才强院，和谐荣院”的办学理念，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着力构建“外语+”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

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以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根本出发点，以助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家语言能力、国家翻译能力建设为目标，致力于向国际社会精准阐释和合文化，同时服务地方国际商业贸易需求。

学位点培养目标：秉持内涵式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理念，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情怀和科学素养，兼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掌握扎实的语言文化、翻译、百科、信息技术等基础知识，掌握扎实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翻译技术、语言服务、区域国别、国际传播、和合文化及商务翻译等翻译专业知识，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能胜任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和商务翻译等方面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英语笔译人才。

学位点培养方向：设有英语笔译专业。专业下设和合文化翻译与商务翻译2个研究方向，拥有和合文化翻译、和合文化解读、商务英汉互译、跨境电子商务等特色课程。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秘书长张爱玲教授来院讲学

05
Vol.47 No.5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53期)

台州学院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知网全文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Authority 台州学院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Sponsor 台州学院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钧敏
Li Junmin

副主编
Deputy Editor 邵凯云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Edited by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Address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Postcode 317000

网址
The URL <https://journal.tzc.edu.cn>

印刷单位
Printed by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Domestic Distributor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Overseas Distributor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E-mail xbb@tzc.edu.cn

电话
Tel. 0576-85137169

目 次

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

隐喻的共生性转译

- 数智时代神话叙事与共情伦理的认知重构 师曾志 | 01

- 类生命：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 宋 奇 | 12

外国文学

- 小说《漂亮朋友》电影改编与莫泊桑“幻象说”再阐释 王 欣 | 18

- 斯蒂芬·金小说中的他者暴力探究 周宇航 | 25

- 《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中的“姐妹情谊”书写研究 王 妮 | 31

转型时期的社会学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多维特征与深层逻辑

- 基于社会转型中的代际变迁视角 张 樱 樱 | 36

家庭责任视角下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的实践、困境及调适

.....陈俊峰，王存 | 44

语 言

掩饰伪装：修辞构式“有被X到”功能及其他张云峰 | 51

论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类型张新杰，王馥芳 | 58

从英语名词的汉译看英汉的时空差异性

——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为例李国宏，余玥莹 | 66

教 育

教育共同体助力乡村义务教育：缘起、历程与启示董江华，吴银银 | 73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探究

.....徐宁宁，许利敏，应永利 | 79

数字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挑战与对策郑殷珏 | 87

CONTENTS

Symbiotic Conversion of Metaphor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and Empathic Ethic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hi Zengzhi	01
Quasi-life: The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ovies	Song Qi	12

The Adapted Films of <i>Bel-Ami</i>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aupassant's Theory of Illusion	Wang Xin	18
An Exploration of the Other Violence in Stephen King's Novels	Zhou Yuhang	25
A Study on the Portrayal of Sisterhood in <i>Shanghai Girls</i> and <i>Dreams of Joy</i>	Wang Ni	31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 Logic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iews on Marriage and Ro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Zhang Yingying	36
Practice, Dilemma and Adjustment of the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Quitting" But Not 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Chen Junfeng, Wang Cun	44

Camouflage: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You (有) Bei (被) X Dao (到)"	Zhang Yunfeng	51
---	---------------	----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Types of N ₁ de N ₂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Zhang Xinjie, Wang Fufang	58
---	---------------------------	----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ouns

—A Case Study of the 9th Edition of <i>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i>	Li Guohong, Yu Yueying	66
---	------------------------	----

Support from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for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Origin, Process, and Insights	Dong Jianghua, Wu Yinyin	73
--	--------------------------	----

A Study on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n Rural Areas	Xu Ningning, Xu Limin, Ying Yongli	79
---	------------------------------------	----

The Logic,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Zheng Yinjue	87
---	--------------	----

隐喻的共生性转译

——数智时代神话叙事与共情伦理的认知重构

师曾志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数智时代的生命传播中,神话叙事正经历着从文化基因解码到时代精神重塑的共生性转译进程。基于西美尔、罗洛梅、卡西尔等学者的理论,探讨了神话叙事在人机共生环境中的嬗变,分析了语言与神话共同作用的隐喻式思维,阐释了以记忆为媒介的神话叙事对集体认知的建构作用,揭示了神话作为无限观照的沟通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价值,剖析了神话隐喻与技术理性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神话叙事“在场缺失”的内在潜通性,回归到向人自身的神话叙事后,最终阐述了数智时代神话叙事中共情伦理是如何影响到认知和社会秩序的重构。研究发现,神话叙事在数智时代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个体在算法社会中维系生命本真、对抗精神虚无的生存策略,它所显现出的共情伦理正重塑着数智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组织方式。

关键词:生命传播;神话叙事;共情伦理;隐喻思维;认知重构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1

数智时代生命传播中的神话叙事正经历着一场颠覆性的认知革命。当《哪吒之魔童闹海》将古典神话中“剔骨还父”的宿命抗争,解构重塑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现代个体觉醒宣言;当“苏超神话”借由赛博空间的情感涟漪重构集体记忆图谱,人们清晰见证了神话符号从文化基因解码到时代精神重塑的共生性转译进程。这绝非简单的媒介形态更迭,而是隐喻思维在网络传播生态中的创造性转换——当神话以数字形态穿越时空时,它不仅激活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密码,更在虚实交融的传播场域中,突破语言符号的表层对应,通过情感共鸣、话语重构与行动动员的多维交织,实现认知框架的深层变革与社会伦理秩序的系统性再造。

作为跨越时空的文明基因,神话不仅承载着原始先民对宇宙秩序的浪漫想象,更在AI技术赋能的人机共生时代,持续演化出虚实共生的新型生命叙事。面对人工智能迭代引发的社会不确定性,人类亟须回溯文明源头,借由神话原初生命力

释放的想象、希望与信念,直面剧烈变动时代带来的恐惧、孤独与焦虑。神话叙事以感觉、意象为纽带,深度联结集体记忆与生命经验,正在重塑人类认知与伦理秩序的底层生成逻辑。作为共情伦理的具象化实践载体,神话以深层情感共振为桥梁,超越传统社会建制的束缚,通过震撼人心的生命叙事唤醒集体记忆中的本真性力量。在网络传播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激荡中,神话将个体情感与生活经验凝结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话语力量。

在此过程中,神话叙事既为陷入精神孤岛的个体注入温暖的情绪慰藉与精神动能,又以贴近生活的叙事策略重构伦理认知框架。它已然跃迁为数智时代的动态伦理调节器:通过记忆唤醒与语言创新的意象表达,神话在虚实场域中诗性交流,人机交互始终围绕着人性本真的精神内核展开,它既延续着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伦理智慧,又隐喻着人类认知秩序的动态演变,从而构筑起以情感共同体为基石的“共情—共生—共在”新

伦理秩序。

一、人机共生中的神话叙事

数智时代,重思美国存在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关于个体应承担神话创造使命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当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解构传统集体叙事话语,个体不得不面对梅所揭示的现代性困境,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个体的形式,去做以前通过家庭、习俗、宗教和国家就可以完成的神话创造工作,从而赋予生活经验以意义”^{[1]16}。AI技术的发展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权威,更通过生成式模型、脑机接口和数字孪生技术,为个体提供了加速认知与重构意义的工具:大语言模型通过分析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为个体生成跨文化叙事的范本;神经科学技术将神话体验从文本阐释转化为具身化的神经编码;虚实融合的数智场域则使个体叙事突破物理时空限制,在虚拟空间中实现意义的动态再生产等。这些技术赋权犹如神话一般,时时都在刷新着人们认知和思维的边界,只是当下神话的建构已在集体仪式中更多地显现出以个体为中心的共同体转向。与之相应的是,传统伦理框架在被技术迭代解构的同时,也在返回基于本能驱动与共情伦理的动态网络。个体在技术应用与体验中始终无法回避自身的生命伦理观,这也使得相对稳定的伦理规范不断需要转向动态调适。这种转变印证了梅的预见——当技术文明迫使人类面对存在的根本焦虑时,神话叙事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成为每个个体在算法社会中维系生命本真、对抗精神虚无的生存策略。

人类文明演进中,神话叙事与维柯提出的历史分期理论可以形成一种辩证对话。当“神的时代”通过万物有灵论构建宇宙秩序、“英雄时代”以史诗确立个体超越性、“人的时代”凭理性所塑造的观念建构社会形态时,数智时代则在技术迭代中焕发出生命本真性的存在,维柯所言的三个历史分期在其中似乎同时并举。人机共生的现实神话叙事解蔽着传统观念认知的多重关系,改变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揭示的叙事普遍性在当下认知拓扑视角下获得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即当代神话既延续着原始时代对混沌与秩序的想象性解释,又承载着

启蒙理性的批判精神,更孕育着面向未来的伦理秩序。这种叙事叠合现象表明,技术并未消解神话的认知与交流功能,而是通过记忆的重构机制将其转化为跨时代的认知媒介。以记忆重建思想而闻名世界的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曾指出记忆作为意象构念与重构存在的本质,在人机共生中演化为对抗时间熵增的叙事策略——当集体记忆被编码为可编辑的认知模块,神话叙事便成为连接原始思维与算法逻辑的转换器,使维柯提出的三个时代在心理认知维度形成共时共振。

数智时代神话叙事揭示出更深层的生命绵延,其本质功能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为技术变革提供认知重构与伦理秩序。神话叙事正通过三重路径塑造现代文明:其一,以“混沌—秩序”的辩证逻辑为社会的不确定性提供认知反思;其二,通过包括禁忌、死亡在内的向死而生叙事揭示出面向未来的生成性共情伦理的内核;其三,共同感觉与共同知觉所形成的“星丛”共同体不断冲击着传统线性伦理秩序,围绕感觉、情感构造的共情伦理成为社会秩序构建的力量来源。它们犹如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言的星丛^①一般,在共情伦理作用下激发出隐喻性的意义生成,构建起一种分布式的记忆认知范式。它时时调适着主客体间的关系,推动社会在“失序—秩序—新失序—新秩序”的螺旋式演进中不断重构。

面向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神话叙事展现出独特的思想要素,即调适的能力。它既非对“神的时代”的简单复归,亦非对“人的时代”的超越,而是在技术赋权解构与重构的张力中,不断生成着神话叙事形式。它切近着生命形式,其本质在于通过激活古老记忆根基,将原始认知中的互渗转化为理解人机关系的隐喻系统;借助大语言模型对集体无意识的算法解析,使英雄史诗的超越性转化为共同体叙事的生产力;而动态共情伦理系统的自我演进,则使理性逻辑获得生命本能的驱动。

二、语言和神话共同作用的“隐喻式思维”

语言和神话有着共同的本源,语言词语和神

^① 本雅明的“星丛”思想强调概念间如星群般通过非因果、隐喻性的关联构成意义整体,拒绝单一本质论,在差异与张力中保持认知开放性。

话意象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性。作为思维方式的叙事早在语言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语言的发展让神话叙事更能在场与有效。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从神话和语言的共同起源上看到它们受着类似的演化规律的影响,认为“两者的结果,即两者产生出的形式间的相似之处统统指向一种最终的功能的共同性,指向两者借以发挥其功能的原则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卡西尔看来只能采取回溯性的方式去考察,这是因为“不论语言和神话在内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同样一种心智概念的形式却在两者中相同地作用着”,这种形式就是一种“隐喻式思维”^{[2]109}。这在卡西尔看来是一种真正的隐喻,亦是一种“基本隐喻”。它是“神话的以及语言的概念本身得以表述的条件”,往往要求“有一个从某一认知的抑或情感的经验转化为声音的变形过程,亦即转化为一种与该经验不同的,甚至是全然相对的媒介的过程”^{[2]113}。这个变形本质上在于它是事物从一种属性变化到另一种属性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卡西尔总结语言与神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它们都“处于一种原初的不可分解的相互关联之中,它们都从这种关联中显现出来,但只是逐渐地才作为独立的要素显现的。它们是从同一母根上生发出的两根不同的子芽,是由同一种符号表述的冲动引出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产生于同一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即简单的感觉经验的凝聚与升华”^{[2]113}。神话总是让人在感觉的凝聚和分化中思维与认知,它能突破语言的固化,让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围绕着感觉并在具体情景中呈现出事物饱满而灵动的意义所在。

神话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借由语言将心理倾向、感觉经验通过象征性符号表达出来,尤其是AI等技术介入到AR、VR等沉浸式体验的建构中,更深度地挖掘与表达出人们的复杂心理倾向。卡西尔发现这种“神话—语言”思维中运行着“消除特别差异”的规律,即“整体的每一部分就是整体本身,每一个样本即等于整个的种。部分不只是表象整体,样本也不只是表象它的类;它们与所属的整体是同一的。它们并不单纯是反思思维的媒介辅助物,而是实际上包含了整体的力量、意义和功效的真正的‘在场’”^{[2]116}。这种规律也引出了卡西尔的把“部分代替整体”视为语言和神话隐喻的基本规则的观点,即“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体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在魔法意义上,就会由此获得控制整体本身的力量”^{[2]117}。对神话

思维而言,“隐喻不仅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替代’,一种单纯的修辞格;在我们后人的反思看来不过是一种‘改写’的东西,对于神话思维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直接认同”^{[2]11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神话一再从语言中汲取新的生命和新的财富,如同语言也从神话中汲取生命和财富一样。这种持续不歇的互动和互证证实了语言和神话的思维原则的同一性,语言和神话只不过是这条原则的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显现和不同的等级而已”^{[2]121}。这种不断消除差异的“部分代替整体”思维原则的同一性,使得语言自身的推演能力难以脱离事物之本质以及自然运行之规律,而是围绕事物本身以其逻辑力量不断分化、凝聚与解释、理解存在的意义,切近神话中的如其所是、如其所能的存在本身。

卡西尔的卓越洞见,远不止于厘清语言与神话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更在其中洞察到一种超越语言与神话框架、持续更新的原始生命力的审美维度。他认识到,神话为语言拓展了理解时空的意义疆域。与此同时,他深刻揭示了语言自身能够突破语言符号的固有边界与神话意象束缚的解放性潜能。正是这种力量,使得语言得以“复活了全部的生命,但这已不再是被神话束缚着的生命,而是审美的解放了的生命了”^{[2]122}。由语言词语与神话意象共同构筑的精神生活与诗意世界,由此得以摆脱其附着的“全部实在性和实效性”。它们升华“变作了一道光,一团明亮的以太气,精神在其中无拘无束无牵无挂地活着”^{[2]122}。这一升华过程并未扬弃语言与神话,而是在两者的肌理中显影出心智本真的诗意栖居。

三、以记忆为媒介的神话叙事

现代神话叙事实践仍是文明基因的适应性表达,它在向人自身中以记忆重建为媒介,在虚实共生的场域中调适着人性本真与技术理性的微妙平衡。神话叙事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每个社会,唯一不变的是其认知交流形式的变幻无穷。无论人以何种方式划分,都或多或少地进行着跨历史、跨国家和地区、跨文化的神话叙事。文化背景不同甚至冲突的人们都在叙事中进行着观念、认知和伦理的塑造,尤其是在人机共生中其内在性贯通的是人性本能与人类心智,切近着将

记忆作为媒介的神话叙事对人们认知、观念和伦理的解构与重构。

神话叙事揭示出将记忆作为叙事媒介,通过记忆重构集体认知与认同,在数智时代的人机共生场域中实现维柯历史分期的共时性叠合,催化出面向未来的动态伦理生成机制。巴特强调叙事的普遍性与跨时空性,为“记忆作为叙事的媒介”的观点提供了认知基础。它与巴特莱特的记忆重构思想等结合,揭示出记忆不是被动存储的存在状态,而是结合个体所面对的实际主动、动态地进行着重构,从而塑造集体认知的分化与聚合。人类正是在记忆的认知交互中不断进行着生命演化,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3]。由此,记忆的重构性也获得未来指向,它突破人类碳基生命的限制,释放出生命本源力量,超越具体历史语境,推动文明在认知重构与伦理想象中持续进化。

在叙事交流中,“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4]。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大众同语言捆绑”的语言社会性认为语言与大众关系密不可分,语言在应用中既是个体化的,也在大众异质性认知中体现出海德格尔所言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为理解语言与神话、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方向。在神话符号系统中,原型意象的稳定性印证了语言认知的难以突破,而跨文化的神话叙事激发出的集体记忆与现实语言社会性的结合,始终构成个体和社会创造性的来源。

模仿作为人类认知与行为的基础机制,在反复实践中沉淀为记忆。这种记忆并非静态的存储,而是动态的、累积性的存在。记忆既是过往模仿经验的结晶,又构成后续模仿与认知活动的前提。在记忆的持续运作中,个体的观念与态度得以塑形与演变,进而深刻影响其当下的意愿、判断、选择乃至行为。神话叙事正是这种“模仿—记忆—观念塑造”过程在文化层面的集中体现。它超越了线性、可量化的物理时间框架,深刻彰显了如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所揭示的“生命时间”(或“绵延”)的本质。柏格森指出“时间就是心理生活的材料”,其核心在于“绵延”,这是因为“我们的绵延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瞬间: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在

现在中的延伸,没有演变,也没有具体的绵延。绵延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中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5][10]}。这种绵延并非简单的连续,而是“意味着创造,形式的创造,意味着全新事物的不断生产”^{[5][16]}。神话叙事是绵延的具象化表达,它将散落的记忆进行整合。

神话将集体模仿实践形成记忆碎片,通过叙事有机理解为具有“起源—发展—命运”的整体。这呼应了柏格森所言“过去在现在中的延伸”与“入侵将来”,记忆(过去)通过叙事(现在)获得意义并指向未来。神话时间并非物理刻度,而是承载着感觉、情感、价值与世界观的“心理时间”。它通过象征、仪式和情节编排,使“过去”在每一次模仿中绵延,实现柏格森强调的“形式的创造”与“全新事物的不断生产”。神话叙事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将这种空间化的集体记忆,纳入生命绵延之中,从而在多重思维交织中引入了时间维度与历史感。

除了柏格森生命时间的表达外,从古至今对于时间的表达有很多。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古斯丁就指出:“事物经过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成印象而已经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间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6]他从心灵与认识的角度认为真正的时间具有有机性与生命力,时间度量是在心灵印象中进行的,神话叙事不仅仅是在过去实质中展开的,而且重在印象等是如何重现与构念、构思的,它们又是受到怎样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神话叙事不仅是记忆的载体,更是塑造时间体验与思维方式的核心力量。它通过模仿得以传承(行为层面),通过记忆得以持存(认知层面),通过叙事结构将原初思维转化为蕴含历史纵深与创造潜能的时间性思维(思维层面),最终深刻影响着群体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判断与行动选择。柏格森的绵延与奥古斯丁的印象度量,共同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时间作为内在心理现实与创造性力量的本质。

四、神话作为无限观照的沟通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与信息的即时性并未主动滋养人类的感知能力,反而加剧了感知的荒漠化。当人们的意愿与行为逐渐失去心灵的指引,

“存在的意义究竟为何”的叩问正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事实上,生活的真谛始终蕴藏在感知、想象与理解的深层对话之中。而神话,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活态交流载体,其永恒生命力正源于“被一代又一代人依据文化新语境与时代新需求不断重新诠释”的活化过程。这种持续迭代的叙事重构机制,打破了时空维度的桎梏,织就了一张连接个体与集体、勾连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之网。从中华神话在当代影视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到全球文化视野下神话符号的跨文明对话,其内核始终围绕着梅揭示的终极命题,即“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的责任”^{[1]29}。在算法解构认知深度、工具理性侵蚀生命质感的当下,神话的交流本质告诫人们在数据算法中重拾对非计算性价值的敬畏,并以这份觉醒的责任伦理,构筑起对抗现代性异化的精神家园。这种对抗并非对技术的拒斥,而是在数字文明中守护人性的幽微光芒。神话叙事一再揭示出,人类真正的文明进步,从来不是算法对心灵的征服,而是在技术迭代中始终保持对生命体验的珍视,对生活意义的叩问,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担当。

神话在梅看来是“赋予我们存在以重要性的叙述方式”^{[1]2},也是人们发现存在之意义及生命之形式的方式。梅在其所处的年代就深刻认识到“当我们同样只关心技术理性是如何正确,祛除愚昧神话的时候,我们同样剥夺了自己的灵魂,作为摧毁神话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同样也在毁灭我们的社会”^{[1]7}。神话之创造有着自我的参与,然而,这种参与注重的不仅仅是语言和符号的运用,它更重视的是人们在运用这些语言符号时,是否增进了相互理解,这种交流与沟通是否根植于心灵联结,是否激发出人们心灵之活力,从而赋予琐碎日常生活以意义。梅甚至指出“神话是使社会团结一致的叙事方式”^{[1]7},显示出神话在沟通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宇宙关系中命运性的存在。创造神话是人类创造性的体现,是人类必须承担起的自身命运,也是人要活出自身神话的必由之路。

关于“神话作为沟通方式”这一思想,很多学者都有提及。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提出,神话不仅是原始社会对自然的解释,更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宪章”。他认为“从积极的角度研究,神话……不是为了满足科学的旨趣,而是通过叙述的方式,将一些原初

的事实加以再现,它满足的是深层的宗教愿望与道德渴求”^{[1]1},强调神话通过故事形式传递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权力合法性,成为人类与超自然力量、现实社会之间的信仰沟通媒介。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侧重于神话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叙事构建群体认同和规范。神话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着仪式性的角色,往往体现在具象的象征符号应用中,作为统治者沟通天地的话语权力工具,表现其作为权力沟通工具的特性。神话不仅是文化表达,更是连接人类与超自然、个体与集体、权力与信仰等深层沟通的媒介。

梅受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主要有两种沟通方式:一种方式是“理性语言,它是具体的、经验的、符合逻辑的”;另一种方式则是“神话”,它是“一种以历史事件面貌出现的戏剧,是一种使人们与现实协调的特殊途径”。前者指向“客观事实”,它容易造成言语语言对人事的符号化与对象化,将心智与情感抽象化与空洞化,体现出“说话的人,与他所说的是真理还是谬误并无干系”;后者指向“人类经验的本质,指向生活的意义”。神话交流承担了获得认同的责任,充当起人们之间建立关系的纽带,其“叙述往往指向整体性而不是特殊性,在社会中发挥了神经中枢的作用”,不仅如此,“神话使生活的各个侧面协调一致:意识与无意识、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会。这些内容构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叙事”^{[1]13}。这两种沟通方式意味着理性语言是可验证的,而神话却是一种“永恒真理”^{[1]15},永远在生命感觉、体验中,也在向人自身中完成和创造。神话向人存在的本质发问,让人们直视自身所必须面对的。它无法被界定和超越,它就是在宇宙无意识与意识纠缠中如其所是、如其所能地存在着。

神话以其超越理性认知边界的叙事特质,构筑起穿越时空的意义认知方式,为人类精神世界自由敞开着交流场域。当个体在神话意象中完成自我审美的全然敞开,实则是通过隐喻与象征的棱镜,切近本真性的生命。神话以穿透理性认知边界的叙事张力,构筑起跨越时空维度的意义生成机制,为人类精神世界开辟出自由对话的诗性场域。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建构,既非对理性的否定,亦非对现实的遁逃,而是在认知边界处架起桥梁,使人类得以在符号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触碰到超越经验层面的生命本质内核。神话以无限观照的视野作为沟通纽带,将个体嵌入文明的意

义长河,在诗意的心智世界中照见生命的无限性。

五、神话叙事“在场缺失”的内在潜通性

神话叙事于未被察觉的潜意识层面持续激活,不断激发个体的意愿与行动,进而揭示人类存在的无限可能。它在日常生活中促使人类回归存在本真性状态的过程中,尤为强调意象与交流是渗透于感觉、知觉、情感、表现与行动之中的。“在场缺失”是梅思想体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是较早认识这一问题的先知。所谓“在场缺失”指的是“我们没有完全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并且因此也没有完全地认识到他人”^{[1][210]}。人只有在自身的具身性中,才能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和关切,而这种自我的认知和关切又会延伸出普遍性的存在意义。为克服在场缺失,梅提出了“创造性等待”和“创造性在场”的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人类在具体普遍性中的关系。梅特别指出:“自我的诞生和发展在一个人际的领域中发生。”^{[1][211]}值得注意的是,在场缺失所蕴含的意象与交流逻辑,恰与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精义相契合——它既是感觉、知觉、情感的具身流动(体),又是表现与行动的实践展开(用),两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形成“道之动”与“道之用”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神话在日常生活场域中,正以身心互渗的叙事方式,推动着人类向存在本真性的复归。这种复归并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扎根于具身体验与实践行动的生命过程,在潜意识与显意识的交织中,持续激活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深层觉知。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感觉、知觉与知识的关系逐渐被边缘化,但在神话叙事的语境里,它们又展现出独特的认知维度。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对知识形式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7][7]}在克罗齐看来,“对实在事物所起的知觉和对可能事物所起的单纯形象,二者在不起分

别的统一中,才是直觉”^{[7][10]},人类正是借助直觉,将对意象的知觉转化为原始思维中的符号。不仅如此,克罗齐进一步强调直觉即表现,“每一个直觉或表象同时也是表现。没有在表现中对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或表象,就还只是感受和自然的事实。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若把直觉与表现分开,就永没有办法把它们再联合起来”^{[7][14-15]}。这一理论在神话的生成机制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神话中的意象、情节与符号正是人类直觉与表现相统一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克罗齐“直觉与表现的统一”理论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看的感觉是能力”的观点相互呼应,两者均将直觉、感觉、表现等视为人类的重要能力,共同揭示出神话叙事本质上是人类诗性智慧的认知实践。这种实践打破了理性思维对知识的垄断,以充满感性与想象力的方式,构建起人类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体系。

人类认知迭代激发出的诗性智慧,正持续打破神话叙事的外在碎片化,催生更多内在心智联结的潜通性。本雅明在批判经验消亡中早已洞悉这一机制,即“某种我们最放心的财产从我们身上给夺走了——这一宝贵的财产,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8][214]}。真正的讲故事者需以生命体验为根基,超越说教窠臼,灵活地运用各种形式将故事内化于人心。这种力量源于口耳相传的经验沉淀,将故事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表达,其叙事在时空延展中保持丰盈的阐释潜能,使听者在自我审视与洞察的共鸣场域中卷入其中,最终在不知不觉中铭刻于心。本雅明借列斯科夫《自然之声》进一步阐明:当“造化整体借‘自然之声’发言”^{[8][265]},便超越了功利性说教与虚伪理想,直抵神话的元语言系统。自然之声摆脱了具体人事的限制与束缚,深阔了叙事的时空,神话意象与认知迭代在不断铺垫烘托后突然将看似分散的信息联结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爆发力,让人感到茅塞顿开,人们在恍然大悟后的会心一笑中也在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本雅明将实用性视为讲故事的核心特质,这种特质并非局限于功利层面,而是深植于叙事者作为行动者的生命体验,其打动人心的力量,恰恰源于对感觉与直觉的细腻捕捉。他指出:“实用关怀是天才的讲故事的人所特有的倾向……这有三种情况:第一,有用性可能寓于一种伦理观念;第二,可能寓于某种实用建议;第三,可能寓于一条

谚语或警句。在每一种情况,讲故事的人都向读者提出了忠告。”^{[8]294}至于听故事的人是如何将故事与自身联系在一起的,本雅明则洞悉到“很少有人意识到,听故事的人对于讲故事的人的那种不加判断、听什么信什么的关系,其决定因素在于他全神贯注于把所听来的东西记在心里”^{[8]304}。这种忠告的传递,本质上是通过叙事激活听者的直觉能力。当听者全神贯注于把所听来的东西铭记在心时,故事便不再是外在于心灵的符号,而转化为可被直觉把握的生命经验,会在潜意识中形成意义节点,待时机成熟便通过心智的潜通性完成联结,使听者在无意识中产生想象与相信,进而将故事转化为情感共鸣与行动力量的传递载体。

本雅明发现故事叙事“并不旨在宣教,而实际是意在烘托出生命中种种的不圆满和残缺不全”^{[8]224}。这种对缺憾的呈现,恰恰为直觉认知提供了切入生命本质的契机,通过展现命运的不可测,迫使听者在直觉层面体验存在的荒诞性,进而在心智深处激发对自我的观照。正如讲故事的人一样,听故事的人“最终会遇见的,唯有他自己”^{[8]274}。故事叙事借由感觉与直觉的联动,捕捉到生命经验中被理性遮蔽的潜通性。这种叙事机制使死亡不再是隔绝的终点,而成为激活心灵交流的节点。通过死亡意象打破日常认知的壁垒,在人事断裂之处显现出生命的力量与延续,在听者心中刻下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经世代传承,最终沉淀为集体心智中关于抗争与救赎的知识图谱。

本雅明直言:“陈述‘死亡’,是讲故事的人得以诉说世间万物历程的许可证。”^{[8]240}他认为死亡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当下的社会,在各种社会制度的支持下,死亡总是远离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居住在“从未被永恒的无情居民——死亡——问津过的房屋里”。死亡有着“肃穆”的仪式感,一方面,弥留之际的人“会将其生平的意象在心中不断地展示出来,从而认清楚自己种种的遭遇,并认识到一直没有能够深刻认识的自我”^{[8]239-240};另一方面,在场者也在观看与感觉临终人的面部表情以及周围人事的表现中在心里打上深深的印记,实现心灵上的交流与传承,从而在个体死亡经验的惊诧与震撼中理解生命在别处的奥妙。在现代社会个体生命史与时代叙事的复杂缠绕中,神话叙事的价值愈发凸显。它以直觉为舟,承载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自我感觉与知觉,通过集体共通的感官经验与认知共鸣,于心智潜通

间让诗性智慧在代际传递中加速演进——这恰是生命体验在符号叙事中生生不息的意义流动,在时代更迭中始终保持着激活心灵、重构意义的能力。

六、神话隐喻与技术理性的颉颃

从古至今,人类对生命神圣性的敬畏始终是不变的主题,神话隐喻以其独特的方式,留存着技术理性无法消解的生命冲动与绵延力量。在生命叙事的维度中,神话隐喻与技术理性的颉颃,本质上是人类认知生命本质的既冲突又调和的两种路径。一方面,神话叙事以象征性、情感性与伦理性表达构建生命意义,通过隐喻体系勾勒生命起源与存在意义。许多经典神话中都隐含着“僭越必受惩戒”的伦理框架,成为人类早期生命认知的精神图腾。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则以工具性、逻辑性与控制性的思维解构生命的神秘性,其技术迭代不断突破传统神话的边界,让生命以更多样的形态存在与延展。然而,在丰富生命体验的同时,技术理性也可能引发人类发展的深层危机。

当人们从本体论层面对技术理性进行追问时,既要警惕古老的生存恐惧对理性与知识的反噬,也要明确认识无论工具理性与计算理性如何强大,都无法僭越生命本身的终极价值。伦理失序只是阶段性的现象,生命政治、技术霸权等议题,始终在面向未来的动态调适中寻求平衡。在生命叙事的深层结构中,技术理性与神话隐喻的颉颃呈现出“体用不二”的哲学特征:若将神话叙事中的冲突视为“相”、角色视为“用”,则生命的永恒转变便是“体”的本质体现。这种叙事策略与逻辑,既肯定了技术的实用价值,又保留了神话对生命痛苦与苦难的包容姿态,在理性与感性的张力中,守护着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

在AI时代重审普罗米修斯神话,本质是对技术理性与神话隐喻永恒张力的当代诠释:盗火之举既象征人类突破自然桎梏的启蒙精神,亦暗含僭越神性秩序的风险警示。两者的共生呈现为辩证的生存智慧:神话以敬畏叙事守护人性的神圣维度,技术则以实证逻辑开拓文明的认知边疆;前者为后者划定“不可为”的伦理禁区,后者则推动前者在量子宇宙、人工智能等新维度中实现创造性复魅。

当下重读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意义在于,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掌控多少技术火种,而在于认识到——作为火种的技术,本质上始终在人类的交流互动中生长,在伦理与信仰的观照中澄清。神话隐喻与技术理性的颤颤本质是复魅与祛魅、复归与异化的永恒博弈。技术理性试图剥离生命的神秘性,却催生新的存在焦虑;神话叙事虽被科学证伪,却始终守护着人类对未知的敬重。两者的动态平衡点在于:以技术拓展生命可能性,以神话坚守伦理底线。

七、向人自身的神话叙事

在现代社会,理性计算与物质现实似乎主导着一切,神话意象往往仅作为文化符号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当人们沉浸于作品时,或许能获得片刻感动,但这种体验常如云烟般消散,难以在现实中扎根。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时代愈是强调现实与计算,对神话的内在需求反而愈加弥漫,它揭示了人类精神对超越性意义的永恒追求。马林诺夫斯基较早就颠覆了将神话视为抽象艺术或历史残余的旧有观念。他洞见神话是“活态的”文化工具,其核心功能在于满足社会与个体的实际需求:它“表达并进而使信仰条理化;它保护并推行道德;它保障了仪式的完满,并包含着可以指导行动的规范”。因此,神话绝非“无聊的故事”,而是维系文明运转的“精心雕琢的能动力量”^{[1]19},是塑造社会秩序与精神认同的基石。

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启发的梅在其心理治疗实践中深刻印证了神话的现代生命力。他发现个体的心理困境往往与“对神话的探求”紧密相连,并表明“神话是心理分析的基础语言”。在全球化与网络传播推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梅的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梅将神话对人类生活的重要贡献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神话可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第二,“神话使社群感的获得成为可能”;第三,“神话支撑起人们的道德价值”;第四,“神话是我们解释创世神迹的一种方式”^{[1]2}。神话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激发与调动着人们的潜意识。人类的爱与勇气、净化与救赎都是在体验和经验中获得。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恨纠葛、生死轮回,以及欲望的纠缠、无助的彷徨、惊惧的震颤,还有冷酷的对峙、怨恨的蔓延、愤怒的爆发、报复的执念、

嫉妒的噬心、诅咒的偏执,都能在神话中找到宣泄的出口与警示的明灯。

当下神话并未消亡,而是深深融入了现代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结构。梅特别强调“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神话”,并将西方社会涌现的偶像崇拜泛滥、药物滥用成灾、自杀率攀升等危机,根源性地追溯为“神话的丧失”^{[1]1}。神话的本质在于可以赋予个体适应所处时代的内在安全感,神话编织了一张可以想象与创造的意义之网,使人在混沌无序的世界中找到精神目标与心灵归属。梅因此呼吁重视神话研究,以期“揭示我们如何通过神话的再发现,获得理解自我的途径”^{[1]2}。由此可见,神话绝非虚妄的幻想。它是初民应对生存挑战时的智慧结晶,即通过神圣叙事构建意义体系,在不可控的自然与社会力量面前确立秩序感与归属感。这种源自人类心灵深处的需求,在高度理性化却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呼唤着神话的回归与重构。

生命不会依附于外在,总会在绵延之中,总能在时间中活出自我的神话。神话总会让人相信,给人以希望和爱,在希望和爱中全然敞开和接纳一切,去切近自我的真实,在真实中方能有所创造,它也终将成为他人追随效仿的心灵灯塔。当有人问普尔奇内拉他是谁时,他说他是柏拉图所言的唯一真实存在的理念,再问他是什么东西的理念时,他说:“关键就在于,我是一个理念,但不是什么东西的理念。”^{[9]72}这是因为“普尔奇内拉的生命就是这样一种为死亡准备的生命,不是因为它献身于死亡,而是因为它诙谐地占据了死亡的位置,因为它戏弄着死亡”^{[9]89}。苏格拉底的反讽思想、柏拉图的理念、克尔凯郭尔的间接交流以及阿甘本笔下的普尔奇内拉都是在回应与切近着那个不是什么东西的理念。

网络传播是不稳定的、碎片化的,但却高扬着生命的气息,体现出生命与认识的能动性,这也使得数智时代的真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真实是实然而非应然,从“美是整一性”出发,美即是真实,死亡作为生命进程的必然环节,也是美的一部分。只是人们在悲剧与喜剧中不同的叙事方式,导致对死亡产生差异化的理解。网络传播中喜剧有着别样的深刻性,因为唯有对死亡进行戏耍与游戏,才能让生命叙事中的“向死而生”成为可能。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在动荡年代所洞察到的,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历时久远的斗争的新阶段——不是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的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本身形式或形式原则的斗争”^{[10]25}。生命冲动中的生命形式存在着内在矛盾,它既需通过形式表现自由,又被形式所阻碍。但也正是在这种对抗与统一中,它不断寻找新的生命形式并试图超越已有形态。数智时代,数据、算法等新形式构建起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一方面,它们重塑了人们对真实的认知,模糊了虚实边界;另一方面,生命又在新的对象物的形式中突破自身,通过喜剧式的解构、戏谑,打破形式的桎梏,在矛盾与冲突中实现新的统一,彰显生命的真实与美,让真实不再局限于物理世界的存在,而是在虚实的交融、形式与反形式的博弈中拓展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八、人机交互中的共情伦理

在AI时代人机共生、虚实相生的复杂图景下,神话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根基,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凸显其价值与伦理意义。神话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以具象化的叙事与象征,精准捕捉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焦虑,以及对希望和信仰的追寻,这些情感与认知的表达,是其他沟通方式难以企及的。随着神话所引发的伦理嬗变持续深入,社会加速变革不断冲击传统社会建制与形态。基于人类共通情感体验与价值共鸣形成的共情伦理,不仅强调对他者境遇的理解、包容与互助,打破个体间的认知壁垒,推动情感与思想的深度联结,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方式,是构成权力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通过情感纽带凝聚社会力量,影响资源分配与决策走向,进而塑造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基于此产生的共情伦理,成为推动社会动态发展、持续创新的关键动力。

共情伦理体系兼具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双重属性,深刻反映了人际交往与行为规范向人类自身伦理的转化。通过重新审视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等多重关系,神话驱动下的伦理建构,实质上在重塑社会形态的底层逻辑,为人类在复杂世界中寻求共情、共生、共在指明方向。正是这种对伦理的动态理解与实践,既关照到具体现实情境的需求,又对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而

这也与我们对VUCA、BANI时代的认知不谋而合——两者均揭示了人类在面对剧烈变革时,如何通过重构认知与价值体系,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精神坐标与行动规范。

无论人们说我们是进入VUCA时代,还是BANI时代,其共通之处都是对当下世界所面临挑战的深刻认知——前所未有的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与脆弱性(brittleness)、焦虑感(anxiety)、非线性(non-linearity)、不可预测性(in-comprehensibility)正叠加共振。这种心理和认知的演进,既映射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技术革新的爆发式演进,以及社会心理状态的剧烈变迁,更直指传统线性思维与固化认知在当代问题面前的局限性——从地缘冲突频发引发的供应链震荡、AI技术革命带来的职业范式颠覆,到气候危机与公共卫生事件的连锁冲击,人类社会已进入亟须以动态适应力、跨维度洞察力与韧性思维重构认知框架的关键阶段。

现代传播渠道与形式的多样化,不仅深度嵌入日常伦理与社会组织肌理,也激发出神话与童话的关键力量。正如梅所言,童话是“我们在意识到我们自己之前的神话”,而神话则是“给童话增加了存在性的维度。神话要求我们面对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爱、我们的欢乐。神话增加了普遍性的维度”^{[1]199}。神话赋予存在的普遍性维度,要求人类直面命运、生死与爱恨。网络传播表面的喧嚣之下,潜藏着信仰与信念的动态整合。这种整合性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宗教性,即“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着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的某种独特混合;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做是自身内的东西”^{[10]4-5}。它需要以无私奉献、执着追求等情感张力,构建人与更高秩序的内在联结。信仰在此过程中不断贯通主客体认知,推动人类在复杂现实中持续突破思维边界,而这恰与共情伦理驱动下的认知重构形成呼应,共同为人类应对时代挑战提供精神支撑与实践路径。

AI人机共生中超越时空的认知进化和心智联结正持续解构着传统秩序、风俗与制度构筑的人际关系网络。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曾深刻揭示了血亲关系作为中国人生命根基的社会结

构特征,其中贯穿始终的关爱与温情,成为维系传统社会伦理的重要纽带。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伦理作为人类在复杂关系网络中适应与调整的产物,其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代伦理不再局限于特定场景下的道德准则,而是更强调动机、心理、认知、条件与目的等的动态平衡,通过连接、秩序与规范的重构,推动社会秩序与和谐的持续演进。

日益凸显的、对社会秩序起关键作用的共情伦理,本质上是人类生命叙事的具象化呈现。其蕴含的“变化之道”并非逻辑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如梅所述,“代表着生活的广泛范畴,在其中人们反思或者停下来质疑经验的意义,尤其是苦难的意义”。在网络传播语境下,人们对苦难的认识呈现出多维度、复杂化的特征。网络传播在拓展苦难认知边界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判断异化、情感表达扭曲等新挑战,亟待通过共情伦理的深化与传播规范的完善,重构对苦难的理性认知与建设性回应。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使个体能实时目睹全球范围内的苦难场景,从自然灾害中的绝望眼神,到社会不公引发的权益抗争,海量碎片化的苦难信息以图文、视频等形式高频次冲击着公众的感官。这种“苦难景观”的急速扩散,既唤醒了人们潜在的共情意识,催生出线上募捐、话题声援等集体行动,也容易导致同情疲劳,使部分受众在信息过载中陷入麻木。

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与解构性,重塑着价值判断异化苦难叙事的话语权。普通个体得以突破传统媒体议程设置,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方式,将自身或身边的苦难经历转化为公共议题。这种自下而上的叙事,使原本被遮蔽的边缘群体苦难得以曝光,推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同时,为博取流量而刻意渲染苦难、消费悲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导致苦难的真实性与严肃性被消解,沦为网络传播的狂欢素材。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与匿名性,还衍生出对苦难认知的分裂与对立。部分群体在虚拟空间中肆意宣泄对苦难的冷漠甚至嘲讽,与另一部分满怀共情的群体形成激烈碰撞,加剧了社会认知的撕裂。而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固化信息茧房,使人们对苦难的理解局限于自身立场,难以达成理性共识。

这种对苦难的反思让人返回自身。在共同感觉和共同知觉中形成的情感共同体使得个人伦理

与普遍伦理得以辩证统一。当个体在苦难中叩问生命价值时,个人伦理赋予其自主诠释与选择的空间,允许每个人在自我建构的神话、信念与希望中确认存在意义;而普遍伦理则以群体共情为基础,将个体对苦难的反思升华为集体记忆与价值共识,在抚慰创伤的同时凝聚社会向心力。在网络传播重塑人际关系的当下,传统伦理秩序的消解与AI时代的情感重构并行。表面上,虚拟空间的隔阂使人际交往趋向冷漠,但深层来看,人类对苦难的共情本能正催生出新的伦理实践:从灾难中跨越地域的互助接力,到网络社群对弱势群体的声援行动,再到算法推送引发的情感共鸣,这些数字化的关爱形式,本质上都是共情伦理在技术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这种转变既折射出伦理实践在技术迭代中的适应性演变,也预示着人类在重塑关系网络过程中,正不断探索关爱与共情的新范式。这与共情伦理作为社会组织方式和权力资源的本质属性一脉相承,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伦理体系的迭代与重构。它既延续了个人伦理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又强化了普遍伦理整合社会共识的功能,通过情感纽带将离散的个体编织为命运共同体,最终推动人类社会伦理体系在动态平衡中持续迭代与重构。

在网络传播深刻映照人类心理与认知变迁的当下,共情伦理作为贯通个体经验与集体价值的精神桥梁,正突破传统伦理框架的边界,以强大的凝聚力与动态适应性,成为动荡时代维系社会秩序、重构人类文明的核心驱动力。这种伦理范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民间实践双向联动,既深度尊重个人伦理中生命体验的独特性,赋予个体情感表达与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又将离散的个体经验淬炼升华为普遍伦理共识,凝聚成跨越地域、文化与阶层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作为新型社会组织方式与隐性权力资源,共情伦理以情感共鸣为纽带,重塑着数智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价值分配逻辑。在网络空间,一场场由公众自发发起的共情行动,从灾难救援到弱势群体权益倡导,无不彰显着情感动员转化为现实变革力量的潜能;而政府与社会组织基于共情伦理构建的公共政策与文化机制,则将个体共情升维为系统性的社会关怀。这种双向互构的伦理实践,推动着人类伦理体系在技术迭代浪潮中持续

自我革新,已然成为驱动社会变革、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重要变量。

结 语

西西弗斯神话历久弥新,也是对当下的最好隐喻。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西西弗斯,一种看似千篇一律、永无止境、毫无意义的重复,落脚到每个人的理解和认知上却是千差万别。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梅则认为“西西弗斯的神话,在最小的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梦想崩溃了;在最大的意义上,它可以展示给我们通往迷醉的路径,平衡我们的无望感并且激励我们走向新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直面我们的绝望并且建设性地利用它”^{[1]142}。它告诉我们最直接简单的理解是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中的无法忍受,而在重新对重复进行理解时,则别有洞天。其蕴含着的不仅是西西弗斯与宙斯、自我命运之间的关系,它也是自由与抵抗、痛苦与快乐、无意识与意识、创造与毁灭、相信与绝望等一切与自我有关的意象和象征。它们都是建构自我信念的必由之路,也是帮助我们返回自身、摆脱无根性生存的力量源泉。

微小叙事的兴起是生存美学日常生活转向的表现,神话叙事也转向了更多地根植于日常伦理的仪式连接,梅将仪式定义为“付诸行动的神话”^{[1]309}。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神话仪式中的中心,只要能有人应和形成共同体,就能担负起处理、构建和维护人际关系及社会秩序的重任。人们在认同自我的同时,也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人们需要保持自我的感知力,尽管压抑与痛苦时刻存在,但这只不过是不断还自本处的桥梁。无根性本质上是无关爱的体现,这种关爱不仅是人之间的,也是自我对自我的。现代人表面的疏离和冷淡看似是外在强加的,实则是自我神话破灭的自我抉择。人可能一辈子都挣扎其中,但总会有着一束光作为人感觉、观念与行动的指引,这也是人成为人的根本所在。

站在 VUCA 与 BANI 时代的历史交界点,神

话叙事的终极价值在于:它以诗性智慧中和技术理性的冰冷质感,以情感共鸣弥合社会认知的裂隙,以星丛式的意义联结对抗算法构筑的认知茧房。现代人表面的疏离姿态,实则是对虚假完美自我神话的主动解构——这种拒斥本质上是对生命本真性的深切呼唤,唯有重拾对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关爱,才能在技术迭代的认知场域中,以敏锐的感知力捕捉人性的微芒。恰如本雅明笔下的自然之声,真正的神话叙事终将穿越技术表象,在代际传递的生命体验里,唤醒人类对存在意义的永恒叩问。这既是数智时代认知重构的精神内核,亦是人类文明在技术迭代中坚守本真的必然路径。若以西西弗斯永不停歇的跋涉为喻,数智时代的认知重构本就是一场持续的精神苦旅。它让人们相信,总有一道光在前方指引,那是人类于技术更迭中对生命本真性的永恒守望,是追寻存在意义的不灭信念。这种信念促使人们在认知思维的解构与重建中,始终行走在重返精神家园的路途上,在不断趋近人之本质的过程中,实现对世界与自我存在的诠释与理解。

参考文献:

- [1]梅.祈望神话[M].王辉,罗秋实,何博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3]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M].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79.
-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7.
- [5]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6]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5.
- [7]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韩邦凯,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 [8]本雅明.单向街:讲故事的人[M].陶林,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18.
- [9]阿甘本.普尔奇内拉[M].尉光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10]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曹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下转第 57 页)

类生命: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

宋 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人工智能在感知、决策乃至认知上进步迅速,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生命功能,因而被认为是某种“类生命”。近年来,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开始从类人走向类生命,这表现在想象的具象表现、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对社会形态的展望三个维度。类生命想象导向人工智能生命形态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电影史上常见的人机二元框架,有助于打开新的创作空间,并为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共生提供艺术解蔽。中国的人工智能电影也在提出基于中国人生命体验的类生命想象,这有潜力为沉溺于技术暴力的好莱坞电影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类生命;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电影;生命传播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2

想象是一种社会实存,在民族国家乃至现代社会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技术想象是对于技术的一种公认知,是国家、组织或群体通过技术构建的集体想象^[1]。并非所有脑海中的图景都可以成为社会技术想象,只有那些集体所有的、公开表达的图景才是^[2],电影恰属此类。

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是在特定情境中多元力量参与建构出来的,反映了科技发展与社会愿景、政治权力、文化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想象既是对未来的理想图景,也会在当下影响公众认知和政策后果^[3]。那么,电影是如何塑造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呢?社会技术想象和技术的社会实践是共生的(co-production)^[4],随着共生程度的深化,一种“类生命”范式正在浮现。

一、从类人到类生命: 打开生命形式的多样性

何谓生命?实体主义将生命看作符合某种特定的本质标准的存在,如恩格斯所界定的蛋白

或者后世某些学者认为的细胞^[5]。而功能主义观点则认为生命指发挥某种或某一系列功能的存在,如新陈代谢、繁殖或进化^[6],也就是说,生命不是某种“本质”状态,而是某种复杂功能系统的运作模式^[7]。在操作层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寻找地外生命过程中提出一个标准,即生命是一种化学系统,这种系统能够通过达尔文式进化实现自我维持^[8]。“达尔文式进化”和“自我维持”两项指标为认识非传统生物的生命形式提供了可能,这也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生命定义之一。

在开放性标准下,生命并非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一个连续的谱系,存在着某些“不那么生命”的形式。在这里,“生命”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那些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具有某些生命特征但不完全符合全部标准的存在,就是类生命(quasi-life)。类生命研究最早出现于生物学领域,指未必有细胞结构或DNA,但通常具备一项或几项生命主要特征的物种,如能够进行遗传信息复制、但不能脱离细胞而自主存在的病毒或类病毒体(viroid)。最近数十年来,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信息科学等学科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类生命不

需完全拥有生物学中的生命机制,仅需具备一定的相应特征,如自我组织、自我复制、演化能力、能量/信息处理等。

类生命是功能主义在学术与艺术上的交汇,隐喻了以下生命标准:自主地通过行动来发挥某种功能、改变环境或自身。生命传播认为,个体在行动与表达中表露生命底色^[9],故而类生命是一种生命传播的观点。当技术认知告别功能主义时,生命认知却可能因功能主义而打开想象空间。在这一标准下,只要表现出足够类似生命的功能表现,即可称之为类生命。人工智能正在发挥越来越多的生命功能,也就越来越多地靠近类生命。

现有文献往往采用类人视角分析,将人工智能看作人机二元结构中的“他者”^[10]。人工智能是人类界定自己的手段,而且也只有通过人类才能界定人工智能。类人聚焦人类特征,具体模仿人类外形、行为、思想或情感。长期以来,类人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领域,如人型机器人、类人情感、理性或决策。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生命功能日渐增多,类人视角日益捉襟见肘。毕竟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可以做到“我消灭你,与你无关”,那些主动识别、自我决策的无人机、无人艇,并不需要拥有类人的外形,甚至未必拥有人类的决策机制,却将成为未来无人作战中的主体。在思辨层面,海德格尔批判了人与工具的二分法,认为技术不仅是工具,而是“解蔽”的方式,即让事物呈现为可知、可用之物^[11]。若仍以他者或者人机二元的方式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呈现进行认识,只停留在人的层次进行技术想象,既无法认识人工智能,也无助于认识人类自己。甚至有观点认为,人类的“碳基智慧”遮蔽了人工智能的“硅基智慧”^[12]。

而且作为模仿对象的“人”自身也并不稳定。在生命传播看来,人不是固定的,自身处于剧烈变化中,自我在生命体验中经过不断选择而形成。人不是抽象的、固定的,更不是永远以某些单一标准(如理性人)行动。那些试图将人模式化、将既有规则固定化、依靠伦理或法律为其设限的做法,往往陷入永远在追逐但永远追不上的窘境。在这方面有诸多例证。例如,欧盟出台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经过专家精心设计的法律并没有带来发达的人工智能产业。又如,商业互联网视频平台根据大数据试图去总结观众的观看规律,却拍出一部又一部的烂片。

作为解蔽手段的艺术,应当比这些政策实践

更勇敢地探索新的社会技术想象。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类生命的社会技术想象有助于破解人工智能艺术的人机二元框架或人类中心主义^[13],打开“类人”桎梏,想象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以及生命形式的持续生成,从而接近被碳基智慧所遮蔽的真理。

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类生命的多维想象

社会技术想象是技术、观念与社会互构形成的,在电影中并非简单的艺术形象,而是有以下三个维度:想象的具象表现、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对社会形态的展望。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类生命社会技术想象的浮现。

(一)想象的具象表现

有学者认为,信息存在着脱离具体形象和存在具体形象(具身)之分,这对电影中的人工智能表现产生影响^[14]。根据这一观点,电影对人工智能的具象表现也可以区分为两种,即实体形象和去身形象。其中实体指的是拥有某些视觉形象载体,如人型或机械;去身则指消弭掉视觉形象载体,以算法、程序或声音方式存在。在电影中,作为实体的人工智能往往通过类似人类的形象来勾勒智能和技术的符号,是视觉奇观;而去身的人工智能通过功能发挥来描绘智能和技术的存在,通过行动改变世界,进而推动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

在电影史上,人工智能的实体形象主要是类人形象,这也是最初版本的社会技术想象。早在19世纪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怪物就拥有近乎人的外形。1927年的《大都会》创造出的机器玛利亚,被认为是电影中第一个人工智能形象^[15],机器玛利亚和真人玛利亚在外形上没有任何区别。类人形象出现于诸多经典作品中,如《终结者》(1984)系列中的T800。《终结者1》以他的微笑结尾,类人形象在人型外形与理性决断之外,通过情感流露表达人性的存在,从而进一步靠近人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型形象设计往往是人类生存状况催生的隐喻,会忽视技术局限,而不是技术的真实^[16]。类人形象披着人工智能外衣,以视觉上与人类的相似模糊了人造人的身份界限,实际上是人的某种变形。在人的外表下,内核却是冷冰冰的机器,人类外貌与机器内核的反差让情感

与认知陷入迷茫和困境^[17]，成为影像叙事的重要动力。

还有一类实体形象模拟机器，甚至动物。人工智能的实体形象存在着两个方向的参照：生命和机器，其中生命是智能的象征，会在视觉上进行具体呈现。对动物的模仿往往被用于表达特定隐喻，如《杀戮都市》(2011)中的机械乌鸦隐喻无处不在的监控，《银翼杀手2049》(2017)中的机械蜜蜂隐喻人工对自然环境的替代。对机器的模仿则会通过动作、表情进一步模仿人，如《机器人总动员》(2008)中的瓦力，通过触碰机械手的方式表达感情，或者《星球大战》(1977)系列中的C3PO，作为机器人依然拥有脑袋、躯干和四肢。此类形象与人的区别近似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鬼形象的评价：“其所记鬼神，多为人形，或面长耳大，或身高丈余，殊乏新意。”^[18]

和实体形象不同，去身形象一般以信息或者虚空方式存在，这秉持了脱离具身载体的信息观。在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1965年拍摄的《阿尔法城》中，城市由自动运行的电脑控制，这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去身形象最早的作品^[19]。类似的还有《黑客帝国》(1999)系列中的矩阵以及《2001：太空漫游》(1968)中的HAL 9000。相比于类人或机械形象，HAL 9000的去身化体现出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的系统性与全景化特征，以及人们对全景敞视的恐惧。

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从以类人形象为主，发展到多种类形象的并存，共同构成了多元的类生命想象。在类人形象阶段，人工智能被想象为人的某种简单投射，拥有某些人类认知，自身形象模糊，技术真实感低。客观来看，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前，即使是弱人工智能也远未成熟，这种漫画式的想象反映了技术成熟度的不足与技术社会应用的有限。去身形象打破了这种简单投射，使得人工智能在电影中逐渐从人的影子转变为类生命，以电影故事中所发挥的功能而非视觉存在。《终结者》系列的天网系统虽然从未展现过具身形象，却成为故事缘起，其根源在于天网基于自身判断所采取的暗杀行动。HAL 9000也没有具身形象，只是通过声音存在、通过对飞船的干预发挥功能。脱离了视觉实体的去身形象是功能主义生命观的隐喻。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

在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上，电影所承载的社会技术想象存在着人机二元和机器自主等认识。在人机二元框架中，人类与机器往往被对立起来，

一方有情感和灵魂、主动行事，另一方有理性和程序、被动行事，两者之间存在权力冲突或权力依附。有研究将人机二元框架总结为竞争性共生、互构性共生和榨取性共生三种隐喻^[20]。在这一框架中，人工智能被定位为“他者”，是人类建构自身的参照系或者人类自反性的载体。

不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人机二元的社会技术想象都通过他者揭露出人的深层恐惧：恐惧人类行动能力不足、恐惧人类不能控制自己、恐惧人工智能控制自己、恐惧其他力量通过人工智能控制自己。人工智能电影中的公式化叙事反映了这种恐惧。本文总结了反复出现的几类叙事模式：第一类借助人工智能完成人类目标，如《机械战警》(1987)系列中借助机器获得更强大的身体能力，主角使用智能技术在枪战中识别敌人，这是恐惧人类能力的不足，在生死边缘需要帮助；第二类是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控制选项，如《我，机器人》(2004)中人工智能为了保护人类而限制人类自由；第三类是人工智能成了权力的工具，以至于侵害人类自身，如《匿名者》(2011)中的记忆监控和《升级》(2018)中的人体控制；第四类是人工智能为了某个目标而杀人，如《2001：太空漫游》(1968)中为了太空航行目的而试图杀死船员，这是对工具理性的隐喻，显露出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

随着人工智能开始实现感知、决策等某些生命功能，电影中机器自主的描写也在增多。“人工智能体作为电影创造的具象物，之所以让人类感受到焦虑或威胁，并不是其与生俱来的工具属性，更多的是潜在的认知能力养成。”^[21]在漫威宇宙中，不止一次出现了追求自主乃至恐惧死亡的形象，如《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2018)中的机器人奥创。近年来，人工智能电影从人主导物走向人与物的共生。一方面寻求怀旧的复古，翻拍了大量含有人工智能情节的老电影；另一方面增添诸多技术细节，机器自主让人工智能的功能更加彰显，在生命形态上更加可信，而不再只是漫画式视觉奇观。

不过，当下电影中的人工智能想象，在探索类生命多样性和可能性上仍然是有限度的。人工智能自身的生命冲动何在？自主意识如何产生？是否存在独特的生命功能？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探讨，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影响依然无处不在。HBO的剧集《西部世界》(2016)探讨了人工智能的生命价值，有着基督教创世隐喻，但仍然停留在自

由意志等人类已有的伦理框架范畴内。那种人工智能用人类语言进行对话的桥段,类似于某些国产抗战影视作品让侵华日军说汉语,显现出想象力的匮乏。人工智能的生命形态依然在共生过程中不断共创,从而表现出青春期的骚动。

(三)对社会形态的展望

社会技术想象扎根于所处的社会情境,在多元参与中被社会建构,与社会、文化以及全球化进程交织,与具体的、鲜活的生命体验有关,其动力是共享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理念^[22]。全球视野下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并非体现为一致性,反而是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电影提出的差异化社会形态展望。

比较影像分析发现,欧洲电影中对于人工智能成为新的主体较为开放,含有大量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关于爱、陪伴的探讨,而暴力较少,如德国电影《我是你的人》(2021)和英国电影《机械姬》(2014)。欧洲电影对社会形态的想象有着较为固定的模式,不论是基于反极权历史经验的反乌托邦,还是基于当下社会形态的自由民主,都是电影史中反复出现的传统叙事桥段。

美国和欧洲共享某些社会形态想象,如反乌托邦。不过,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更加人类中心主义,高扬个人英雄主义,常以“人工智能是否像人”作为中心矛盾。在大量商业科幻电影中,技术暴力是社会行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人工智能被看作挑战人类秩序、引发反叛或暴力冲突的源头,有时也是暴力的持有者。

近年来,好莱坞在创作时纳入了虚拟社会这一未来社会形态。在《黑客帝国》系列之后,《头号玩家》(2018)、《失控玩家》(2021)等电影继续把人工智能置于虚拟现实之中。鉴于电子游戏等虚拟现实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好莱坞的此类社会形态想象并不是靠近漫画艺术,反而是靠近写实艺术。《头号玩家》中作为游戏角色的主角所采用的各种道具,相较于“关节僵硬版人类”的人工智能形象来说,有着更现实的真实感。在这种想象下,人工智能不是人类社会中偶然出现的异类,而是以自身功能重塑社会心态的基础设施。

亚洲电影尤其是日本电影往往更关注身份模糊与意识边界,得益于佛学等东方哲学传统在灵魂和生命上的圆融理念,较少拘泥于二元对立思维,如日本电影《夏娃的时间》(2008)和《你好世界》(2019)。日本电影在人工智能与社会的互嵌、

人与机器的互构上走得更远,对未来社会形态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设想,尤其是将赛博朋克风格推向全球。其典型代表是《攻壳机动队》(1995),不但自身影响巨大,还被好莱坞翻拍,成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文本。

在这里,笔者请DeepSeek和ChatGPT推荐了非洲和南美洲的人工智能电影,并通过人工检索确定相关推荐的准确性。近年来,这些地区同样开始拍摄人工智能电影,如哥伦比亚和巴西合拍的《另一种形式》(2022)、尼日利亚电影《创智纪》(2025)等。《创智纪》介绍自己是非洲首部人工智能电影^[23],于2025年4月上映,通过人工智能探讨了非洲的发展困境。发展是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之一,人工智能被看作发展的工具,获得这一技术有助于改善和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此类电影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展望,是现实的增量改善,而非天马行空的创作。这并不是南方国家的局限,而是表明发展和爱、陪伴、灵魂同样真实。南方国家人民的生命体验,是全球性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三、中国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

中国电影中对人工智能的描述在2010年后迅速增多,社会技术想象兼具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特征。其中,和南方国家类似之处在于现实主义风格,注重通过人工智能思考当下社会具体问题;和北方国家相似之处在于多元形象和大量的内容生产。在与社会互嵌的过程中,社会技术想象日渐显现出类生命风格。

在人工智能的具象表现上,中国电影从实体形象起步,发展到多种形象并存。其中实体形象具有明显的拟人化特征,包括人类的身体结构、行为乃至情感表达,是“去奇观化”的美学^[24]。《我的新款女友》(2017)中的机器人豆豆、《AI女友》(2018)中的时间旅行机器人K号等诸多角色采用了这种表现方式。近年来,以无形的网络、程序或算法为载体的去身形象也开始出现,《墓志铭》(2016)中的“墓志铭”系统和《流浪地球2》(2023)中的MOSS系统等均采用了这种表现方式。

在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上,中国电影注重通过人工智能探讨家庭伦理和爱情,而不是抽象的

人类与机器、人与自身的关系。浪漫关系的纠葛体现在《机器侠》(2009)中机器人和女警、《智能天使》(2017)中程序员和机器人等人物关系上。在家庭伦理主题上,《智能危姬》(2017)探讨出轨与家庭关系、《机械画皮》(2020)探讨了家庭背叛、《AI女友》(2023)探讨父辈与孩子在生育观念上的冲突等。

在社会形态展望上,中国电影注重通过人工智能探讨具体而非抽象的社会问题,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较为少见。在不少电影中,人工智能被设定为经济增长的技术动力,或者技术与商业斗争的载体。如《人工智能:伏羲觉醒》(2016)描写了程序员克服重重困难终获成功,开发了人工智能程序;《超脑》(2020)讲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商战。甚至早在1986年的电影《错位》中,工程师为逃避烦琐的会议,制造了机器人替身,表达了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讽刺。这里的人工智能很少有对未来社会形态的隐喻,尤其少有末日题材和宇宙题材,更多是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现实需要的诉求。

在早期电影尤其是未上院线的网络电影中,类人形象、爱情伦理主题和现实社会形态最为常见,对人工智能的呈现有强烈的实体艺术风格,不少人工智能角色停留在概念游戏阶段。此类电影制作成本低,在理念上尚未形成清晰的人机二元或人类中心主义表述,甚至不足以系统性塑造他者,也无法由此抵达人的自反性。

近年来,中国电影对技术呈现与社会应用的想象日趋丰富,类生命表达日渐成型。尤其是《流浪地球2》,一方面复现了电影史中常见的桥段,即去身形象的人工智能经过理性计算决定杀掉一部分人,采用功能主义生命观,在架空未来的设定下想象了未来社会形态,与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相决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是为了回应、解决具体问题,这又有自身思维方式的特点。《流浪地球2》之后,也许会有更多中国电影展开多元的类生命想象。

推而广之,中国电影能够从两类传统中汲取类生命想象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人类电影史上的经典。如《硬盘少女》(2016)中,程序员开发智能机器人引发社会危机,50年后的自己派出杀手追杀现在的自己;《机器侠》(2009)等电影中,人工智能出现身份焦虑或失控等现象;《明日战记》(2022)中,人工智能扫描公民行为、侵犯个人隐私

等。这些表达延续了前面所述的人类恐惧,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共同的生命感受。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生命底色。中华文化主张万物一体^[25],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技术之间的和谐共生,对生命与世界的关系有整体性思维,关注此岸而非彼岸。这种思维方式显示为嵌入微观社会关系中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抽象人性思辨的拒斥等艺术表达方式。对于沉溺于技术暴力的好莱坞电影来说,基于中国人生命体验的社会技术想象也许会为其提供新的启示。

结语

认知与物质载体是互嵌、互构的,社会技术想象是拥有规范性力量的认知范式,能够对社会现实施加影响。当社会技术想象显著落后于社会实践时,会造成相应后果,其典型案例是二战后期的日本政府,没有想象到核武器的威力及军事应用,未能对同盟国的劝降做出正确反应。只有在两次原子弹轰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后,日本政府才认识到战争形态的改变。在人工智能技术及社会应用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技术想象也需要开拓新的空间。如果单纯从类人视角来想象人工智能,很容易陷入主体权利、身份伦理和政策治理的争议中,纠缠于人与物、控制与被控制的二元对抗,那么就无法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解蔽,反而有“人类—技术”关系失衡的极端危险。

梳理电影史发现,电影的社会技术想象正在走向类生命,这是一种更为广阔、更具未来性的视野,即在电影中用生命功能的发挥(行动)来界定、表现人工智能。从类人形象到多种形象并存、从人机二元到机器自主,以及与生命体验相连接的社会形态展望,都表现了这种转型。ChatGPT和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并得到大规模商用后,人类社会告别前人工智能时代,类生命想象的浮现有助于在新的时代破解碳基生命的智慧边界,探索尚未可知的人与技术关系,思考尚未显性的未来社会形态。

当然,本文只探讨了电影所塑造的人工智能,并未探讨人工智能参与电影创作这一话题。当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创作时,势必发挥出更多功能,从而进一步作为主体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解蔽将何以进行,电影对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

象会走向何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曹政.社会技术想象: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的分析性概念工具[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2):56-65.
- [2]陈秋心.“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边界与适用范围辨析[J].新闻记者,2024(4):18-30.
- [3]YANG K Y.The impact of AI-generated characters on audience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film [J]. Advances in Humanities Research,2024(30):53-56.
- [4]JASANOFF S.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M].New York:Routledge,2004:2.
- [5]韩贻仁.关于恩格斯的生命定义的再探讨[J].文史哲,1989(6):32-36.
- [6]李建会.生命是什么?[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4):86-91.
- [7]DENNETT D C.Kinds of mind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onsciousness[M].New York:Basic Books,1996:25.
- [8]JOYCE G F,ORGEL L E.A theory for the origin of a self-replicating chemical system. I: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autogen from short, random oligomer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94,91(12):5782-5786.
- [9]师曾志.互联网时代媒介叙事下的生命传播[J].中国编辑,2018(9):9-14.
- [10]黄鸣奋.超他者:中国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想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2(4):65-76.
- [1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52.
- [12]蒋晓丽,贾瑞琪.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4):130-135.
- [13]KIRBY D A.The future is now: diegetic prototypes and the role of popular films in generating real-worl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0,40(1):41-70.
- [14]郭春宁,陈涛.科幻电影的超语言转向:人工智能的“具身化”叙事[J].当代电影,2022(8):30-35.
- [15]林方.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的转向思考[J].出版广角,2019(11):86-88.
- [16]HERMANN 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ction: between narratives and metaphors[J].AI & Society,2023,38:319-329.
- [17]李维,李佳.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AI)的科技形塑与伦理反思[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2):100-108.
-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
- [19]孟君,何凯迪.从幻想预测到现实映射: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历史分期与主题变迁[J].电影新作,2023(5):4-12.
- [20]MILES C, MOLESWORTH M, GRIGORE G, et al. Metaphors of symbiosis: what science fiction movies reveal about human-AI imaginaries[J].Management Learning,2023,54(3):321-335.
- [21]朱旭辉.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的技术哲学之维[J].电影艺术,2019(3):71.
- [22]JASANOFF S.Future imperfec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imaginations of modernity [M]//JASANOFF S, KIM S H.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19.
- [23]Makemation official website [EB/OL]. [2025-04-20]. <https://makemation.com/>.
- [24]张咏絮.当下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类型拓展与叙事流变[J].电影新作,2017(4):21-27.
- [25]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J].求是,2023(18):44-50.

Quasi-life: The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ovies

Song Q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With advances in perception, decision-making, and even cogni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cquiring increasingly more life-like functions and is thus regarded as a form of "quasi-life". In recent years,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AI have shifted from anthropomorphic portrayals to visions of AI as quasi-life, reflected in three key dimensions: concrete visual fo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humans, and projections of future social structures. This quasi-life imagination fosters a diversity of AI life forms,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human-machine binary commonly seen in film history. It opens new creative spaces and offers an artistic mode of unveil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I movies have also begun articulating a vision of quasi-life rooted in Chinese life experience, which holds the potential to offer new insights to Hollywood movies that remain immersed in technological violence.

Keywords: quasi-lif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otechnical imagination; movie; life communication

小说《漂亮朋友》电影改编 与莫泊桑“幻象说”再阐释

王 欣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莫泊桑长篇小说《漂亮朋友》提供了19世纪晚期巴黎社会的真实“幻象”,20世纪以来的多部改编电影《漂亮朋友》则通过情节取舍与转换、主人公杜洛华形象的重新定位、主题延伸等方式提供了银幕上关于小说《漂亮朋友》的真实“幻象”。将莫泊桑的“幻象说”引入改编研究,是一种基于现代视角对莫泊桑“幻象说”的重新阐释,是对忠实性改编的再定义与革新,即改编者不应该过分考量逼真的问题,而要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事件,把它们加以筹划、安排,以便使观众喜欢、激动或者感动。一部好的改编电影的布局只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

关键词:《漂亮朋友》;莫泊桑;幻象说;电影改编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3

出版于1885年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Bel-Ami*)是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这部讽刺现代新闻界的作品在当时法国“风行一时”,莫泊桑迎来了“从来没有获得过”^{[1]1509}的迅速而全面的成功。《漂亮朋友》中既有源于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浪漫主义成分,又有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内容,小说家正在尝试的超自然主义元素也在其中若隐若现。因此,如何界定这部小说的风格就变得众说纷纭。依照莫泊桑对真实的理解,“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2]642}。因此,要想把握《漂亮朋友》中的真实,同样需要进入“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的幻象^①”中来。莫泊桑的“幻象说”提出文学中的“真实效果”是精心打造的幻觉的产物,真实的感觉产生自虚构的各种技巧。实际上,不仅小说如此,忠实于小说的电影改编文

本也是如此。源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电影改编都在重新构建关于“真实”的完整幻象,并借此对原著内容和整体故事情节的设计有所掌控,从而使其符合改编者的创作思路。对于小说《漂亮朋友》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主题,同样重要的还有它多层次、多角度的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以及具有强烈反差的人物角色。每一次不同形式的改编,都是电影创作者与小说家在对于“真实”理解上的碰撞,从而提供了各种基于现代视角对莫泊桑“幻象说”进行重新阐释的可能性。

小说《漂亮朋友》的电影改编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由意大利导演奥古斯托·吉尼那(Augusto

^① 莫泊桑《论小说》(或译为《“小说”》《〈皮埃尔与让〉序》等)原文中*illusion*一词常见的翻译为臆想、意象或幻象,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主要参考柳鸣九的译文(莫泊桑:《“小说”》,载《文艺理论译丛(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649页;莫泊桑:《〈皮埃尔与让〉序》,载《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3—807页)与孙娜娜的译文(亨利·密特朗:《现实主义幻象:从巴尔扎克到阿拉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

Genina)拍摄的同名电影,此后1939年奥地利导演维利·福斯特(Willi Forst)将其改编成96分钟的黑白电影。1946年与1947年,西班牙导演安东尼奥·蒙博莱特(Antonio Momplet)和美国导演阿尔伯特·列文(Albert Lewin)拍摄的改编电影先后问世,后一部将影片改名为《漂亮朋友的私事》(The Private Affairs of Bel Ami)。1955年,法国导演路易·达更(Louis Daquin)在遭到法国制片厂的排斥后,到奥地利拍摄了第一部由法国导演执导的《漂亮朋友》。这部根据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具有如此明显的现实的意义,以致长期被法国检查机关禁止上映^[3]。此后,《漂亮朋友》还在联邦德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法国等地出现过电视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迷你剧等各种改编版本。《漂亮朋友》最近一次电影改编是在2012年,影片由英国、意大利、法国联合制作,由英国知名剧场导演德克兰·多尼兰(Declan Donnellan)与他的搭档尼克·奥曼罗(Nick Ormerod)携手完成。《漂亮朋友》的每一次电影改编不仅专注于通过影像再现小说主题,而且着眼于构建宏观的、多层面的角色设计和整体创作的“幻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位改编者都会不约而同地遵循莫泊桑的创作原则,选择蕴含在小说原著中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并将其影像化,部分导演甚至会有意识对“视觉力量”进行强化,也许这就是“改编的力量”——一个20世纪以来不断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幻想的阐释行为。

一、情节的“幻象”

当莫泊桑从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这种新的作品体裁,或是在经历一段时期后回归长篇小说时,他总是会对小说的形式和题材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从而使作品尽可能呈现出丰富的内容。与之前创作的几部短篇小说相比,在他1883年与1885年先后出版的《一生》(Une vie)与《漂亮朋友》两部长篇小说中,这种改变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创作的莫泊桑一方面不得不从巴尔扎克、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左拉(Émile Zola)等小说家身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则热衷于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探索新的创作技法,这在他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小说《漂亮朋友》的创作始于1884年,

大部分内容完成于小说集《泰利埃公馆》(La Maison Tellier)大获成功之后。与这一时期莫泊桑的小说风格相仿,《漂亮朋友》中明显增加了自然主义因素。因《漂亮朋友》的创作与《一生》之间关联不大,同时也与莫泊桑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除了《伊薇特》(Yvette, 1884)、《大头针》(Les Épingles, 1888)等极少数作品),这直接导致世人对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创作理念上的内在联系产生了疑问。实际上,莫泊桑在这两部长篇小说创作手法上的变化同样重要,并且这种变化还与莫泊桑后来在《温泉》(Mont-Oriol, 创作始于1886年,出版于1888年)和《皮埃尔与让》(Pierre et Jean, 创作始于1887年,出版于1888年)创作中表现出的风格不无关联。值得一提的是,莫泊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文论作品,如《埃米尔·左拉研究》(Émile Zola, 1883)、《居斯塔夫·福楼拜研究》(Gustave Flaubert, 1884)和《论小说》(Le Roman, 1888)陆续发表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一生》和《漂亮朋友》是莫泊桑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们体现出莫泊桑逐渐走向成熟的长篇小说创作理念以及他不容小觑的创造力^[4]^[167]。正如莫泊桑所描述的那样,“他努力在书里通过再现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充满个性的人世假象。为了激动我们,像他自己被生活的景象所激动一样,他就该把它惟妙惟肖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2]^[641]。在《漂亮朋友》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视觉形象形成一个复杂的结构,它既能传达幻觉与真理,也能展现交流与障碍,同时还能表达认同与毁灭^[4]^[116]。

到了20世纪,改编电影的出现让人们对“幻象”的理解进入全新视野。它不再是莫泊桑时代惟妙惟肖的“生活的景象”,而成了“特别敏感的视觉艺术”,强调可视性与画面形象,而且导演本人的感情必须使每个画面都具有独特的、毫不含糊的含义^[5]。在20世纪电影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年代,导演与编剧按照已被普遍认可的几种脚本类型来改编文学作品。针对《漂亮朋友》这部作品,可以分别抽取浪漫主义风格、喜剧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当然还可以是其他脚本类型。这部小说题材的丰富性为不同类型的脚本提供了多样的创作思路。

“写真实就要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的臆想,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混杂的事实拘泥地照写下来”^[2]^[643]。因此,在《漂亮朋

友》诸多电影改编版本中,情节的取舍体现出各个版本之间有关“真实”的最大差异性。针对安排发生在主人公杜洛华身上的各种事件,随着故事的推进,情节的设计必须相互形成有逻辑、有意义的联系,而且它能在改编过程中删减一些原著中的次要内容,保证电影情节的有效性和流动性。“情节的设计是为了控制、娱乐、感动观众,甚至让他们感到惊讶。”^[6]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电影版本都会保留小说原著的第一章杜洛华与弗雷吉埃的偶遇、第二章弗雷吉埃家的晚餐、第三章杜洛华初入新闻行当时请弗雷吉埃夫人代笔等内容。电影情节只会挑选重要的事件和行为,这样就可以暗示其有限范围外的整个世界。通过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一种情节就是一个实现作者意图的架构。类似于莫泊桑在小说创作中所关注的,电影改编者不应该过分考量逼真的问题,而要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事件,把它们加以筹划、安排,以便使观众喜欢、激动或者感动^{[2]640}。一部好的改编电影的布局只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改编中所选取的内容成为整部影片中事件和人物特征能否成立的关键,从而引出观众们所期待的故事走向;与之相反,小说的其他一些内容,如杜洛华来到戛纳与弗雷吉埃夫人一起照顾濒死的弗雷吉埃、杜洛华与政客拉罗什-马提厄的恩怨等等,在电影情节的设置中就显得无足轻重。

一部影片的头一场戏、头几幅画面,无论就其形式或内容而言,都必须成为解开整部电影之谜的钥匙,必须成为观看影片内情的窗户^[5]。小说《漂亮朋友》的第一章就像歌剧的序曲一样,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基调。但更重要的是,它借由主人公杜洛华在这个“巴黎让人喘不上气来的夏夜”^①中漫步以及欲望升腾的场景,展现了小说中主人公未来的实际进展。同时,这一章还通过象征手法强烈暗示:尽管存在上升的错觉,但人生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一条水平线上^[7]。针对这一部分内容,所有的改编电影都还原了小说第一章的关键情节,也就是只剩下三个法郎四十生丁的杜洛华在街头偶遇弗雷吉埃之后,从此开始记者生涯的片段。每一种改编都对原著进行了适当改变,在这些改编作品中,人物出场的效果可谓大相径庭,但是与心理描写、象征相关的内容被删减殆尽。如果没有这场偶遇,杜洛华必将继续他“囊空如洗,但热血沸腾”的生活。但是在这两人

相遇之前,莫泊桑原著中还有大量关于杜洛华人物形象的刻画与细节描写。“他长得很漂亮,又有从前当下级军官的翩翩风度”,这是杜洛华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神气十足,傲视着面前的一切……保留着某种引人瞩目的潇洒劲头”。实际上,莫泊桑接下来就开始谈论在这个“巴黎让人喘不上气来的夏夜”,走出饭馆的杜洛华很想到“树下寻找一点新鲜空气”,一方面“夏日夜晚那种热烘烘的口渴在折磨着他”,另一方面“心中另一种欲望也在升腾”。2012年版影片《漂亮朋友》的编剧瑞秋·本内特(Rachel Bennette)特意在开头增加了一组充满对比的片段,既有饥肠辘辘的乔治·杜洛华透过巴黎一家豪华餐厅的橱窗看到富人们在那里大快朵颐,又有处于陋室黑暗之中的杜洛华愤懑地看着眼前糟糕的生活状态和难以咽下的食物。在镜头的转换中,从饱腹的渴望转到对金钱的贪婪与情欲的诱惑,点到为止的编剧减少了他将角色塑造成实质性人物的机会。从小说原著中游乐场的包厢改换成影片中夜总会的池座(2012年版)、马赛的穷街陋巷(1946年版),或是巴黎街头优雅的咖啡座(1947年版),改编电影都只能稍微显现出饱受欲望折磨的杜洛华的怒火。在莫泊桑笔下,杜洛华拥有在被征服的国度里为所欲为的下级军官的一切本能,以此作为铺垫,进而映衬之后杜洛华的所作所为。

与影片的头一场戏不同的是,一部电影的结局或是“乐观的”,或是“悲观的”,或是“模棱两可的”。通常情况下,改编电影的结局要比原著小说的结局更加积极向上^[8]。在《漂亮朋友》中,把杜洛华与苏珊娜的盛大婚礼作为一个结尾,效果不言而喻。杜洛华在巨大的幸福中“谁也不看,只想着自己”,他的思绪回到了从前,“眼前飘浮着德·玛海勒夫人的身影”。这段描写并不是写实主义的,尽管按照读者的期望可以有个让杜洛华更加显赫的结局,但结尾的意义就在于此,它让故事圆满。同样,观众在看到影片最后一个淡出,或走出影院的时候,希望能感到充实和满意,就像刚离开一场盛宴的餐桌时的感觉,这种充实的满意感使结尾有很好的效果^{[9]232}。2012年版的影片结尾就试图去再现小说结尾处杜洛华那种因“巨

^① 文中所引《漂亮朋友》小说译文,均来自《莫泊桑小说全集》(第1卷)。参见莫泊桑:《漂亮朋友》,袁树仁译,载《莫泊桑小说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578页。

大的幸福叫人感到的冷颤”,但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有限的演技根本无法传达角色所需要表现的真实深度。相比之下,1939年版的电影《漂亮朋友》里,有一个更为夸张的结尾,即杜洛华取代了部长的位置,继续他飞黄腾达的冒险。与此不同的是,在1946年与1947年的改编电影中,杜洛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在影片《漂亮朋友的私事》中,编剧完全改变了杜洛华的结局,他让这位主人公陷入一场关于贵族头衔与家族声誉的决斗之中,算是对他之前行为的彻底清算。这种老套而又不令人信服的结尾确实让情节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要让结尾真正能行得通,它必须满足可信的要求^{[9]232}。1946年版的《漂亮朋友》在结尾处让杜洛华死在妒火中烧的华尔特夫人枪下。这个独特的结尾与其他影片的结尾相比虽不一定令人满意,却是对原著小说中某个主题的重新演绎。

二、人物的“幻象”

在改编过程中,电影往往通过情节强调生活中逻辑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像《漂亮朋友》这样由主人公驱动的作品中,情节的重要性时常会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发生在主人公杜洛华身上的偶然、随机性和突发事件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经济繁荣、文学文本与道德沦丧之间的这种关联问题,是莫泊桑小说的核心所在^[10],小说《漂亮朋友》以人物“奋斗”的方式讲述这一核心内容,并且展示那个时代的图景。“产生了描写这个淫棍的愿望之后,我把他放到符合他的环境中去发展他,目的在于更突出这个人物。”^{[1]1511}在杜洛华的周围,第三共和国的整个社会和整个政治生活都以丑闻、军事冒险和殖民主义为背景,以对威望和气派的热爱为基础。因此,改编电影除了构建时代的“幻象”外,在对杜洛华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也在尝试构建一个具有“幻象”性质的主人公。

莫泊桑在《答〈漂亮的朋友〉的批评者——给〈吉尔·布拉斯〉编辑部的信》一文中认为小说“不过是想叙述一个冒险家的生活道路而已,而这种冒险家我们在巴黎每天都能肘碰肘地遇到,都能在现有的各种职业中碰到”^{[1]1510}。杜洛华首先是现代的唐璜,是一个玩弄女性的风流贵族,在他

面前,任何女人都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可见,就像左拉在论及他的自然主义小说时所提到的,“我想探讨的是人物的气质,而非人物的性格。这就是全书的核心。我选择了几个人物,他们绝对是被自己的神经质和血质所支配,完全没有自由的意志。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被其肉体的宿命性所牵引”^[11]。在小说《漂亮朋友》中,杜洛华充分体现出左拉的主张,即对那个时代“人形畜生”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杜洛华这个充满欲望的人的身上,固然有着唐璜的性格特点,但莫泊桑提到的“冒险家的生活道路”一语显然并不是对杜洛华形象的完整概括,而是当时陷入责难的莫泊桑式表述,并未凸显出小说家真正的创作兴趣所在,即一种真正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长篇小说——尽管他不喜欢自然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想跟任何文学流派有所瓜葛。像雨果等众多19世纪的作家一样,莫泊桑所追求的并不是重现真实的杂闻故事,而是罪案的意义以及罪犯的个性,更普遍地讲,就是对法律和社会的思考^{[12]103}。莫泊桑笔下的杜洛华虽然不是罪犯,但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他的形象跟巴尔扎克笔下的冒险家或野心家形象已经有了很大差异,跟左拉笔下从《黛莱丝·拉甘》(Thérèse Raquin, 1867)、《家常事》(Pot-Bouille, 1882)到《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中的一系列人物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丧尽了良心,一心只想发横财”。确实,“他没有任何才能,他只是靠了女人才爬了上去”^{[1]1510}。为了让杜洛华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莫泊桑在展现他的“欲望”时,并未局限于情欲,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与对爱情的渴求是相互交缠的。同时,“像人们描绘隐秘的社会集团一样,我描写了一个隐秘的新闻界”^{[1]1512}。小说安排的一些次要人物如玛德莱娜、老诗人瓦莱纳均起到了特殊的补充作用。此外,小说还表现了一些肆无忌惮、野心勃勃向上爬的新闻记者,就是他在《吉尔·布拉斯》(Gil Blas)报社认识的那些来路不明的投机家。

但是,如果将电影与小说进行全方位对比,会发现在核心人物“幻象”的构建中,削弱的做法十分明显。在1939年版电影《漂亮朋友》中,导演维利·福斯特以一种最擅长的轻歌剧风格避开了政治因素,表现出无处不在的逃避现实的浪漫娱乐形式;同时,维利·福斯特饰演的杜洛华一改莫

泊桑笔下第三共和国时期无情野心家形象,变身为一个性格开朗、讨人喜欢、顺其自然的可爱男人,是一个能立即吸引观众的魅力人物^[13]。作为这种风格呈现的高潮,影片结尾处杜洛华几乎达到权力的顶峰,但他最终放弃了部长的职位并且全身心地回到妻子身边。福斯特的电影与莫泊桑《漂亮朋友》之间的偏差显而易见^[13],这也暴露出导演在改编这部作品时与莫泊桑全然不同的创作诉求。当然,放在1939—1940年这个时间段,一部改编自法国作家的德国电影必然容易引起争议。尽管进行了多处弱化处理,它还是成为那个年代法国民众抵制德国纳粹风格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相比之下,1947年改编版本《漂亮朋友的私事》有着美妙的时代氛围和壮观的演员阵容,被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评价为一部精彩的愤世嫉俗的电影,一部真正的“恶棍的历史”。这部作品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杜洛华在19世纪80年代巴黎社会动荡中的崛起。这里的杜洛华是一个不知悔改的趋炎附势登徒子和反英雄形象^{[14][42]},在虐待天真女性的同时有一种刻意的冷静。出现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变化,说明20世纪中期《漂亮朋友》的影像阐释已经逐渐脱离传统规范,尤其是在解读杜洛华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变化。就阿尔伯特·列文执导的这部作品而言,或许是跟之前的作品风格有关,如《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 1942)、《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945),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在三部电影中均为主演。身为编剧兼导演的列文被认为延续了一条屈从于好莱坞道德准则的创作之路——他作品中的每个恶棍都得到了救赎,拒绝自我关注以及意识到纯真爱情的必要^{[14][42]}。相比之下,《漂亮朋友》无论在复杂性还是在创新性上都更胜一筹,它以异常独特而鲜明的姿态逐渐引领出莫泊桑作品与众不同且独树一帜的特色。身为一位连续改编若干部文学名著的编剧及导演,列文毫无疑问对莫泊桑笔下的情节——如唐璜故事、野心家传奇和各种其他文学题材了如指掌。乔治·桑德斯在影片中对杜洛华的演绎同样与众不同,他所饰演的这位风度翩翩的记者在俘获女性的同时悄悄地登上了19世纪巴黎社会的顶峰。影片在当时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同时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观点,即像桑德斯扮演的这种无情的恶棍无法在社会如此虚伪的

情况下畅行无阻——社会更像是真正的恶棍,而不是无情的利己主义主角自身。

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显现出法国小说家所特有的清晰和简洁的表达方式,因此常被认为是客观小说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即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而作者没有直接的心理分析。为了弥补这种缺失,他通过使用外部环境、动作等丰富了小说的客观技巧,不仅以直接的方式推进故事和刻画人物,而且有时还赋予它们象征性的功能。各个时代的电影改编者们大都延续了客观小说的优点,只不过在刻画杜洛华形象时选择了不同的着墨点。1955年版改编电影的编剧波兹纳认为杜洛华仅仅是为了生活而与女人厮混的绅士,他依靠这些女人的力量而变得有财有势,被人尊敬。而瑞秋·本内特改编的2012年版则更像是一部女性电影,它传达的论点是年轻男性在社会中的崛起来自认识合适的女性。然而,这些没有成就感的女性却有着潜在的辛酸。在爱情的角逐中,没有一个女人是被当作平等的伴侣看待的。

三、主题的“幻象”

除了人物刻画外,改编电影往往还会在电影中凸显原著中的某些“真实”的主题,并用高度“幻象化”的形式将其包装。依照“幻象说”的思路,当改编者为一部电影而对小说原著的素材进行拆解、重新构思进而发展出新想法时,他们选择的情节设计的类型和程度、人物的塑造或重塑,还有电影语言的使用,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传递出他的“观察和思维”。他的目的绝不是给观众述说某个故事,娱乐我们或者感动我们,而是要强迫观众来思索,来理解蕴含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在小说《漂亮朋友》中,“唐璜叙事通过诱惑场景的倍增,为独特的爱情时刻提供了一种组合式的解密”^[15],而在改编电影中,要想通过再现传达“这种充满个性的世界幻象”,难免会改变莫泊桑原著的面貌。改编电影《漂亮朋友》中影像的力量是通过真实再现“这个失去方向,被金钱和虚伪统治的世界”和作为一个恶棍的杜洛华成功背后“深刻而隐秘的原因”^{[12][104]}。影像画面虽都极富魅力且各具特色,但往往很难达到莫泊桑在原著“将叙述中展现的诗学与真理的追求融为一

体”^{[12]104}的那种境界。

1947年版改编电影是唯一一部未能完全用莫泊桑原著来命名的作品,也使“私事”这一主题在该电影中的地位明显区别于莫泊桑原著以及维利·福斯特之前执导的同名改编电影。值得关注的是,在与乔治·桑德斯合作的电影中,列文的剧本强调了每一个情节,音乐的歌词也表明了角色的本质。这部电影开头便是一句经典的歌词:“谁会欺骗我,谁会离开我,漂亮朋友。”这首歌在电影的各个时刻重复出现,提醒观众杜洛华是一个自私者、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因此,他最终面临着决斗的挑战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绳之以法”,无辜的苏珊娜则因此幸免于难。这一结尾显然不是莫泊桑的初衷。

与1947年版相比,1955年路易·达更的改编电影主要成就是对原著精神的忠实表达。在导演看来,许多文学原作有助于丰富电影的内容,有助于提高观众的欣赏力。改编电影则是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进一步说明,影片的说服力和它的普及性,则又有助于人们去熟悉并理解文学名著^[5]。路易·达更认为仅是对原著重新阅读阐释的要求,便让后来的电影人无法按照莫泊桑创作原著的意愿去打造或真实还原这部反传统的、主题丰满的小说作品,而经验丰富的电影人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影片必须简明,因为冗长就不可能使剧情有严谨的结构并合乎逻辑地展开,也不可能使冲突和人物性格得到很好的配合,因而就会使观众“脱离”影片^[5]。这部电影以小说的内容和精神为依据^[5],用画面叠加的方式呈现了杜洛华的故事,在充分保留故事基本情节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最终通过删减次要情节的方式,把小说作品改编成了一部关于主人公杜洛华的奋斗史。路易·达更显然比前人更熟谙莫泊桑的创作之道,他懂得“把某个题材处理成电影,这要求作者具有一种独特的想象,因为作者必须在纸上预先构思出一部影片,而这部影片最后只是各种画面的连续”^{[5]182}。这样一来,整部电影就成为属于20世纪电影导演们的作品。不过因为缺少莫泊桑原著主题的积极配合,电影的脚本结构和人物设置必然会与原著相去甚远。自称“现实主义者”的路易·达更认为如何去抓住观众,不给他们脱离我们的机会,是一部影片成功的标志。他还曾引用莫泊桑的一句话:“应该避免模糊空泛的灵感。艺术是一种数学,最精彩的效果总是通过许

多简单的、但配合得极好的方法获得的。”^{[5]184}电影艺术并不是游离于这条规律之外的,但是电影创作的机制和经济条件却使我们难以实施这条规律^[5]。

2012年版的《漂亮朋友》被视为一部华丽的古装剧,在服饰和精致的时代背景刻画方面获得了一些好评。在故事情节改编方面,导演更想构建一个有关成名与堕落的现代化主题。在这个主题中,杜洛华决心通过引诱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女性来继续提升他的社会地位^{[16]251},影片还通过玛德琳提醒杜洛华“巴黎最重要的人不是男人,巴黎最重要的人是他们的妻子”。但事实是,影片始终在政治与诱惑两个主题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16]252},除了报业参与政治、政治腐败、殖民战争外,还保留了一些暴露贫富差距、展现杜洛华在女性中的魅力等次要情节。实际上,太多次要情节的参与削弱了影片人物的细微差别,再加上部分有价值的次要情节被忽略,导致影片主题始终无法完整表现。因此,原著小说的华丽背景和时代情感与当代戏剧片段相结合的尝试最终并没有实现莫泊桑构建现实主义“幻象”的初衷。影片的真实感来自原著小说中的描摹而不是莫泊桑文本的主旨精神,在这部完全由情节驱动的作品中,影片开头仅有的一点浪漫主义想象最终也消失殆尽。

结 语

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其《论小说》是极具前瞻性的作品。小说无比华丽地提供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巴黎生活场景的脚本,“幻象说”则拓展了对于“真实”进行重新理解的空间。随后到来的《漂亮朋友》电影改编进一步跨越了莫泊桑“幻象说”的界限,将其从小说形态延伸到电影艺术领域,结果不仅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幻象化”,而且在改编领域形成具有革新意义的再阐释和重新定义,尤其是对忠实行改编而言。在电影史与莫泊桑研究史中,《漂亮朋友》的电影改编引起的关注毕竟有限,但它与《论小说》,还有莫泊桑本人至少提供了一种在改编研究方面带有经验性的思路及尝试——将小说原著中各种要素加以筹划、安排,以便使受众喜欢、激动或者感动。它不仅是对文学的“真实”,也大大丰富

了电影“真实”的定义。当然,莫泊桑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把他的目标推得更远,就像在《奥尔拉》(Le Horla)中所构建的更深层的幻象式场景那样。

参考文献:

- [1]莫泊桑.答《漂亮的朋友》的批评者:给《吉尔·布拉斯》编辑部的信[M].胡湛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2]莫泊桑.“小说”[M].柳鸣九,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3]萨杜尔.法国电影(1890—1962)[M].徐昭,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46.
- [4]DUGAN J. Illusion and reality: a study of descriptive techniques in the works of Guy de Maupassant[M].The Hague: Mouton & Co.N.V., 1973.
- [5]达更.电影剧作与导演处理[J].李泽锐,译.何振淦,校.世界电影,1993(3):179-201.
- [6]拉毕格.导演创作完全手册:插图修订第4版[M].唐培林,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90.
- [7]GRANT R.The func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Maupassant's *Bel-Ami*[J].Modern Language Notes,1961,76(8):748-752.
- [8]德斯蒙德,霍克斯.改编的艺术:从文学到电影[M].李升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132.
- [9]菲尔德.电影剧作问题攻略[M].钟大丰,鲍玉珩,译.修订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 [10]BIRCH E.Maupassant's *Bel-Ami* and the secrets of actualité [J].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2014,109(4):996-1012.
- [11]左拉.岱蕾斯·赖根[M].华修勺,译.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2.
- [12]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M].谈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13]BONO F.*Bel-Ami* from the page to film—notes on the first transposition of Maupassant's novel to the screen [J].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2019,9(10):1023-1028.
- [14]BORDWELL D.Reinventing Hollywood: how 1940s filmmakers changed movie storytelling[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 [15]WHITE N.The family in crisi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fi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85.
- [16]GRIFFITHS K, WATTS A.The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on film[M].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21.

The Adapted Films of *Bel-Ami*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aupassant's Theory of Illusion

W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Maupassant's novel *Bel-Ami* provides a real illusion of Parisian socie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ile several adapted film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ave provided a vivid illusion of the novel *Bel-Ami* on screen through plot sel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positioning of the protagonist Georges Duroy's image, and theme extension. Studying film adaptation through Maupassant's theory of illusion i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and a redefinition and innovation of faithful adapt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adapters, with no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plausibility, manipulate the events they choose, preparing and arranging them to please, inspire, or move the audience. The great framework of their films is merely a series of ingenious combinations leading skilfully to the denouement.

Keywords: *Bel-Ami*; Maupassant; theory of illusion; film adaptation

斯蒂芬·金小说中的他者暴力探究

周宇航^{1, 2}

(1.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2.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斯蒂芬·金关注发生在美国社会中的暴力事件,创作了多部展现他者恐怖行为、反映美国暴力文化的作品。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个体,既有精神世界的坍塌者,也有身份认同失败的异化者。尽管他者身份多元,但暴力始终是这群社会异质者眼中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金在塑造恐怖的同时,也暗示这些暴力行径既是个人问题,也与美国社会独特的暴力文化崇拜现象相关。

关键词:斯蒂芬·金;他者;暴力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4

作为美国当代知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已成为通俗文学的代表参与到美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与《新编美国文学史》对金的小说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与蕴含的现实关怀。在众多的现实关怀中,金对发生于美国社会的由他者引起的暴力事件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金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置于具有普遍性的时代恐怖下,以个体视角展现由酗酒成性或躁狂发作的疯狂分子,以及进行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失败的异化人群导致的暴力事件。这些人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个人就是权力的他者,疯癫就是文明的他者,他们是实施控制的对象”中的“他者”^{[1]122}。在金的笔下,这些他者是带有权力关系与身份建构意味的“异己者”,他们因精神世界的坍塌与身份认同的失败,成为不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另类人群。这些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具有多样身份,精神状态与生活环境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均在美国暴力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将暴力作为解决自身问题的最终手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一、精神世界的坍塌

金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疯狂之人,有的是精神空虚、在酒精的幻化下理智崩溃的疯狂者,如《闪灵》(The Shining)中的杰克·托伦斯;有的是精神膨胀、脆弱权力在社会无限延伸的躁狂者,如《头号书迷》(Misery)中的安妮·威尔克斯。金在细致展现他们所做暴力之事的同时,也借此表达了他对重症精神病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恐惧。

自人类文明开启以来,精神病人常被视为社会安定的威胁。近代科学兴起前,教会常用宗教方法如洒圣水、鞭笞等驱离精神病人体内的“魔鬼”。在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对精神病人的“温和”与“暧昧”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中认为,资本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已经由道德的否定完全转变为理性的否定,道德唤醒也逐渐被监督管理取代。精神病人被视为一种对社会的威胁而被羁押。值得注意的是,重症精神病人表现出的疯癫并不是20世纪60年

收稿日期:2025-0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斯蒂芬·金小说研究”(24FZWB011)

作者简介:周宇航(1991—),男,黑龙江绥化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跨学科研究。

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与秩序进行的反抗,也不是嬉皮士们有意为之的特立独行。重症精神病会陷入臆想与幻觉的精神深渊中无法自拔,他们的正常认知能力几乎全部丧失,其行为的主要特点是混乱与失控。这是重症精神病病人被社会排斥,成为他者的主要原因。

金在《闪灵》中循序渐进地写出了杰克精神状态恶化,以至崩塌的过程。《闪灵》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位于落基山脉的全景饭店中。每当冬季来临,由于大雪封山,饭店便会闭门歇业,并且雇佣看门人全权看管饭店的一切设施,直到春天来临,道路解冻。在朋友的介绍下,杰克成为这一年冬季的全景饭店看管者,他带着妻子温迪与儿子丹尼住进了饭店。在开始全景饭店的这份工作前,在中学教书的杰克不仅因情绪失控失去教职,在书房被丹尼弄乱时,他还在盛怒下折断了儿子的手臂。在接手全景饭店成为冬季管理员后,随着在酒店的时间不断增长,杰克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最终,无法从创作与感情中获得慰藉的杰克在幻象的影响下迷失自我,展现出了重症精神病人的疯狂状态。他在臆想与幻觉中丧失了合理的判断力与基本的自制力,将“献祭”妻儿视为处理这对“忘恩负义”之人的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凸显杰克疯狂的精神状态,金仿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红死病的假面舞会》(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中的经典场景,在《闪灵》情节发展的末尾处描绘了一场疯狂的舞会。坡的这篇小说以绝望的死亡开篇,也以死亡收尾,他以一种颓废的笔调书写了最后的假面舞会,璀璨的面具下掩盖着血腥的死亡。金不仅以相似的舞会描写方式对坡致敬,充满幻象的舞会也成为杰克完全失去理智的催化剂。在温迪与丹尼眼中,“杰克发疯了。……边吼叫边跌跌撞撞地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大多时候声音似乎来自舞厅。杰克不成调地哼着歌曲的片段,提出片面的论点,在某个时间点大声尖叫,把他们两人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2]372}。暴力杀戮随即成为之后的核心情节。

《闪灵》中,导致杰克精神世界坍塌的原因是复杂的,除超自然力量的干预外,首先是意义感的逐步缺失。杰克长期处在人生意义模糊不清的迷茫状态。作为丈夫无法有力承担家庭责任,作为父亲却伤害儿子。生活中的失能使杰克将自己交付给酒精,“先是离家去学校前喝一杯;在史托文顿学校宿舍午餐时,喝个两三杯啤酒;晚饭前喝三四

杯马丁尼;改考卷时再喝个五六杯。周末是最严重的,与艾尔·肖克利出门的夜晚更糟”^{[2]50}。其次,杰克也试图建立意义,填补空虚。他选择了需要耐心投入的深层快乐——写作。然而,意义建立的过程并不顺利,失败的阴霾如影随形,杰克进而用酗酒替代深层满足。精神空虚、创作不利的杰克沉迷在酗酒中,这唤起了温迪对他的恐惧,“他身上有股走味的琴酒及橄榄的气味,似乎引爆她心中过往的恐惧,比饭店自身能提供的任何恐惧还要来得可怕。她心里恍惚地想,最糟的情况就是一切回归于此:她与她醉酒的丈夫”^{[2]377}。杰克的酗酒直接导致了他诸多无理性的行为,如拿起武器冲向妻儿。对杰克的描写实际上也是金的自我反思。如金自己所言:“虽然我从未否认过我的小说与我的生活存在某种关联,但多年后我总是困惑地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描绘自己的问题,并进行一种自我心理分析。”^[3]彼时,金一面宣称要谨慎处理自己与酒精间的关系,一面却用“产生灵感”之类的谎言为自己沉迷酒精寻找借口。直至家人出面阻止,金才最终停下酗酒的脚步。金深知当人因酗酒而走向疯狂时,无法管控的暴力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

相较于《闪灵》中不断酗酒、精神空虚的疯狂杰克,金在《头号书迷》中塑造了一个精神世界不断膨胀、将自身脆弱权力延伸至社会的躁狂者——安妮。保罗·谢尔登是一位知名小说家,代表作是以苦儿为主角的浪漫小说系列。当寻求自我突破的保罗结束了苦儿的生命,试图从世俗题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他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重伤的保罗被安妮所救,她是保罗的“头号书迷”。还来不及庆祝大难不死,保罗惊恐地发现安妮的精神状态并不正常。当安妮得知她钟爱的苦儿在刚刚出版的系列最终部死于难产时,她将保罗的腿砍断,迫使他待在屋子里完成下一部有关苦儿的作品,以使苦儿死而复生。

《头号书迷》的创作也与金的真实经历有关。多年来,金在缅因州班戈市的住宅不断被书迷骚扰,与精神错乱的粉丝相处是金的生活日常之一。金还曾给一个自称是他的“头号书迷”的粉丝签名留念。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他因谋杀约翰·列侬(John Lennon)而在历史留名,这让金感到后怕。金在《头号书迷》中采用了与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收藏家》(The Collector)相似的叙事方式,但突出

了安妮的疯癫状态,将精神疯狂者的危害从密室之内对个人的威胁扩展至整个社会。

非理性是安妮这类重症精神病人的特点,“忘记”是他们的表征。他们忘记的不只是自己,还有文明世界的规则,进而对他人与社会提出非理性的诉求。小说伊始,当保罗从昏迷中醒来时,“他看到安妮脸上一片空茫;……从她的表情看来,女人仿佛忘掉了自己,她不仅忘了自己正在描述一件事,连记忆本身似乎也都忘了。保罗曾经参观过精神病院——那是多年前,他为苦儿系列的《苦儿》找资料去了一次。……保罗看过这种表情……或者更确切地说,看过这种‘面无表情’”^{[4]10}。当安妮投给保罗一个诡谲而充满母爱的微笑时,保罗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惨了,这个女人有病。”^{[4]11}这些重症精神病病人被困在自己诡异的精神逻辑里,因此与文明世界隔绝。金在《头号书迷》里不止一次明确指出安妮对写作过程没有概念,也没有兴趣。她不在乎“怎么做”,她只想要最终的产品,因此她砍断了保罗的腿,强迫保罗写他讨厌的和她喜爱的苦儿系列小说。

疯狂安妮针对的不只是保罗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在记事本上,安妮几乎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这些年她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医院里的重病患者与虚弱老人,抑或是健康的婴儿都没能逃出安妮的魔爪。保罗意识到安妮不只是因为苦儿的命运对他残忍,她的行为源于精神世界的混乱:“我杀她,因为她收音机开到大半夜。我杀她,因为她帮猫咪取了个笨名字。我杀她,因为我不想再看她跟男友在沙发上卿卿我我,看他的手在她裙下东摸西探,像在找金子一样。我杀她,因为我发现她作弊。我杀她,因为她逮到我作弊。详细原因不重要,对吧?我杀她,因为她是个天杀的浑蛋,这个理由就够了。”^{[4]147}对精神疯狂的安妮而言,“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会有正常的答案。即使是无辜的婴儿,在安妮看来也是“可怜又可悲的东西”。在因精神癫狂不断被社会排挤的状态下,沦为社会他者的安妮的精神世界异常膨胀,最终视自己为拥有处置权的上帝,将自身仅有的脆弱权力延伸到她所接触的群体中,颐指气使地对众人的生命发号施令。重症精神病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行为具有强烈的不可捉摸性,这就造成了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恐怖。当这类人被放置在社会中并可以自由行动时,其给社会带来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自罗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的《精神病

患者》(Psycho)出版以来,精神病人在恐怖题材小说中的出现频率逐渐上升。重症精神病病人往往在小说中会被塑造为“怪物”般的存在,其形象特点符合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中对“怪物”的解读,具有文化上的“越界”特点。在道格拉斯看来,文化类属越界的后果就是“不洁”,不洁之物又常常会被排斥。无论是现实中的重症精神病病人,抑或是金小说中的杰克与安妮,他们在本质上都完成了对边界的跨越,其在生理上作为人类存在,但在精神领域他们又缺少当代社会始终强调的理性思维,以疯狂行为冲击着被规则与秩序包裹的文明世界。这就与那些因身份认同失败而进行暴力行动的异化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而言,其进行的杀戮行为具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性。

二、身份认同的摧毁

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不乏个体对身份认同追寻的主题,金在其小说中也探讨了当代人的认同危机,塑造了多位未能克服认同危机的他者形象,展现了他们的种种暴力行为。

尽管身份认同理论愈来愈趋向复杂,但其始终关注作为主体的“我”如何以自身为原点审视自我与周围,也即探讨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人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它是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它主要集中于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人的自我认同的直接对象是对人自身的意义的反思。人的社会(集体、群体)认同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的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社会认同的直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5]金小说中的认同危机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内敛的、基于个体的自我价值追求,即内在深度感生成的危机,这在《纳粹高徒》(Apt Pupil)里有所展现;另一个是外延的、基于人的社会属性,针对人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关系中差异化的价值观和地位感产生的危机,这典型地体现在《魔女嘉丽》(Carrie)中。

《纳粹高徒》中痴迷于血腥研究的邪恶少年因

自我身份的认知出现偏差,从而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定与追寻走向畸形与极端。小说中的托德·鲍登本是一名积极向上的美国少年,然而,托德突然发现自己对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在公共汽车上认出一位化名为亚瑟·登克尔的老人曾是二战纳粹集中营军官时,托德强迫老人为他讲述集中营发生的种种杀戮事件,特别是血腥的细节。随着对大屠杀的了解逐渐深入,托德自身也受到了这种残忍思想的反噬,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出现偏差,逐步将自己视为纳粹的杀人魔王,并开始享受杀戮的过程。

托德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原因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现代制度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还同时制造着自我压抑而非自我实现的机制。”^[6]对于托德,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已经将其牢牢控制在固定的程序与机制中,他的未来早已如其他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一样固化。这在给予他们稳定的生活与进阶方式外,也深深地压制着每个孩子的天性,无法形成自我的内在深度感。在这种现代性的压抑下,暴力文化给托德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托德在影像资料中找到了能引起其兴奋的纳粹杀戮行为,在不断地追求震惊、残忍与病态刺激的过程中,托德开启了新的大门。在金看来,他人的引诱与暴力文化的不断浸染也要对托德的自我认知偏差负责。在找到登克尔后,托德会花大量时间听登克尔为他刻意讲述的各种纳粹传闻,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缓慢但病态的变化。托德不再将自己视为一名与世无争的学生。主宰他人生的权力感、了解杀戮细节时的兴奋感,以及支配登克尔时的满足感,逐渐使托德的生活脱离正轨。他不再关心学习与生活,只关心怎样满足自身的杀戮欲望。在登克尔的引诱与暴力文化的影响下,托德逐渐迷失自我。在托德看来,杀戮才是唯一有意义、能让他获得愉悦的事件,学生身份成为他的伪装。他以谨慎的逻辑思考怎样威胁登克尔,怎样不露痕迹地杀死流浪汉,怎样为自己制造最强烈的杀戮兴奋感,直至事情败露,托德开启了小说中最后的杀戮。

相较于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追寻,社会、种族与法律等“权威形式”对身为少数族群的个体社会属性的剥夺会产生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金描写了大量个体因不被集体承认而使以往被压抑的暴力倾向爆发所导致的恐怖事件。当代西方哲学普遍认为认同危机可以通过转化的方式消解,但显然

金并不对此抱有太大的信心,在金看来,生活中的身份认同危机远不如哲学描述的那般淡然,难以解决的同时其带来的精神痛苦也同样恐怖。

《魔女嘉丽》中的嘉丽·怀特是一名具有强大心灵感应能力的高中生,她因社会身份建构失败开启了针对集体的报复行为。嘉丽的母亲怀特太太是一名狂热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视乳房为“脏枕头”,视性为魔鬼般的存在。在母亲的影响下,嘉丽无知、胆小且自卑,与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为了取乐,嘉丽的同学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嘉丽的“恶作剧”。舞会上,正当嘉丽因被选为“舞会王后”接受同学欢呼、以为自己终于被集体接受时,腥臭的猪血从天而降。嘉丽被彻底激怒,平时欺辱过嘉丽的同学被她的心灵感应能力屠戮殆尽。

纵观《魔女嘉丽》,嘉丽竭力挣脱母亲为她设下的种种管控,在努力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在寻求集体的认同。嘉丽自我身份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她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上。金在小说中对嘉丽的身体与嘉丽对于自己身体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细致描绘:嘉丽对身体的认识逐渐突破了母亲设置的束缚,她的身体不再是母亲口中软弱与罪孽的存在,而是充满了生机,她也开始尝试成为身体的真正主人。对于这种主体性建构带给自己的感受,嘉丽的总结简单有力——“活着”。嘉丽最终由一个不知月经为何物、对自身毫不了解的懵懂少女,成长为一位敢于穿着性感礼服参加舞会的魅力女性。

嘉丽对过去的懵懂自我进行否定,并进行新的自我建构。然而,对于刚刚夺取身体所有权、建立初始自我意识的嘉丽而言,她对自我改变意义的衡量还需要通过他人的肯定来确认与强化。因此,这时的嘉丽格外注重集体的评价。在面对自己的舞伴汤米时,嘉丽内心惴惴不安,“她觉得只要他发出一丝不合适的声音,她的心就会破碎;如果他发笑,她会死去。她真切地感觉到——她悲惨的一生都凝聚在这一个点上了,要么结束,要么是幸福的开始”^{[7][18]}。汤米回应的那句“你真美”给予了嘉丽无尽的信心。当嘉丽被“顺利”地评为“舞会王后”时,耳边轰鸣的掌声令她头晕目眩,似乎多年来被同学侮辱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外界肯定。然而,在猪血从天而降后,在同学肆意的嘲笑声中,嘉丽崩溃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得多么惨……”^{[7][17]}之前在汤米处获得的肯定此刻不仅

烟消云散,嘉丽也意识到她永远无法融入集体中,哪怕旁人看似友善的眼光,也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更为残忍的折磨的铺垫。

对某一集体的身份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对追求社会认同的个体而言,其若可以与所属的族群分享并交流大体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身份认同问题就会处于一个相对隐匿的位置。然而,当个人与集体之间因文化差异、思维习惯、价值取向等原因差异逐渐拉大,或者集体有意地排斥个体融入,身份认同问题便从隐匿位置走到了前台。对集体而言,排斥个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体所具有的“文化异质”,这些异质个体因与集体之间的种种细小差别被排挤到集体之外。由于常年受母亲极端宗教思想的压制,嘉丽自我封闭的性格和对个人生活的无知状态成为集体对她进行校园霸凌的借口。

泼满全身的猪血让嘉丽回想起了月经初潮时滴落在地上的经血,也回想起了当时来自同学的歧视目光与霸凌行为,嘉丽对集体认同的渴求最终以失败告终。她没有像众多西方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愈挫愈勇,始终以昂扬的斗志迎接生活的挑战,反而彻底沉沦。从这一点来说,金对西方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消解。在西方文学史中,成长小说在总体上肯定个体的社会化,即成长主体最后要融入社会,或者说,个体至少要同社会达成某种妥协,取得个体社会化的关键成就^[8]。然而,在猪血泼下后,嘉丽与她尝试的个体社会化之路分道扬镳,决心彻底成为集体外的异质分子,开始了针对集体的杀戮。金讲述了一个血腥却又真实的由社会认同失败导致的悲剧故事。除《魔女嘉丽》外,这种由寻求社会认同失败的他者导致的暴力事件也发生在《狂怒》(Rage)、《道路施工》(Roadwork)与《乐园》(Joyland)等小说中,金的关注对象既包含学生这一群体,也有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与公司职员。金对社会之于个体的认同与接纳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三、他者暴力的社会机制

这些或因疯狂、或因身份认同失败形成的他者怪物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其形象产生于复杂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土壤中。如戴维·斯卡尔(David Skal)所言,恐怖形象本身具有丰富且独特的文化

释义,是人们致力于剥落文明面具的结果^[9]。金笔下的这些社会异质者尽管身份地位与生存环境各异,但他们均将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这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也受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暴力文化影响。金在小说中反映的便是这样一个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问题:暴力文化的蔓延。

美国对暴力文化的崇拜由来已久,南北内战与从未中断的对外战争使得暴力成为美国国民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金所言,美国诞生于多种暴力中,波士顿大屠杀、布尔朗与葛底斯堡战斗、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一再证实这一点,即使抛开历史,种种现实暴力也充斥着美国社会^[10]。美国国民对暴力的容忍度与宽容度较高,甚至催生出暴力崇拜^[11]。美国社会的暴力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呈现出愈来愈激烈的态势,彼时的美国沉浸在海外战争和国内警察的暴力血腥中,由此展现出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更加黑暗的景象。“许多黑人激进分子从种族融合的立场转为黑人权利至上,把合作多年的白人同伴逐出圈外,与此同时,白人激进分子根据当年的口号,由‘反对’转为‘反抗’,由抗议转为骚乱。一如后来效仿他们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好战分子,他们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实现战术的目标或渐进的变革。他们放弃参与式民主,转向由一群自封的列宁主义先锋发动的过激行动。”^[12]在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看来,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影响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暴力神学。美国的流行文化也以各自的方式不自觉地推动了暴力在社会中的弥散,如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B级片中包含大量以欣赏暴力为主的低成本血浆电影。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犯与虐待狂也经常出现在小说与电影中,如《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与《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成为多种流行文化的原型。不仅如此,流行文化中的部分杀人者形象也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纯的屠杀者,而是被塑造成“优雅”的杀人犯,媒体的推波助澜更使得这类暴力形象深入人心。

因此,在金看来,暴力已经成为美国人解决问题的一种惯常手段,当理性逐渐崩溃,疯狂逃脱管控之时,暴力会直接左右接下来的行为。较为典型

的便是在《狂怒》中,金写到了查理·戴克在校园里遭遇到的问题,以及之后查理对旁人的血腥报复。查理因与众多被孤立的美国学生遭遇相似,得到了部分读者的同情。许多人甚至表明,如果处在查理的境况下,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正是这种情绪与对待暴力的方式导致美国校园内的枪击案频繁发生,带给个体与社会进一步的伤害。如金所言:“我同情世界上的失败者,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盲目的愤怒和老鼠般的恐慌,当人们感到选择的道路越来越窄时,这种情绪就会出现,直至暴力似乎成为应对痛苦唯一可能的反应。虽然我同情科伦拜恩枪击案的凶手,但如果我有能力这么做的话,我想我会亲手杀了他们,如果这是唯一的选择,就像人们处理一只无法停止撕咬的野兽那样将他们杀死。”^[10]

结语

金描写他者暴力的小说曾遭受过外界的非议,评论者认为金有牺牲他人的幻想。然而,金坚持艺术家不应该被剥夺在作品中表现暴力的自由,因为这有助于思考解决暴力问题的方式。在表现他者暴力的小说中,金在展现恐怖的同时,也尝试围绕着家庭关爱、政治介入、学校救助等多种角度,探讨解决暴力问题的途径,如《闪灵》中的亲情关怀、《头号书迷》中的部门监管、《魔

女嘉丽》与《狂怒》中的同学互助。然而,金也悲观地认为,尽管经过诸多作家的努力,社会可以重新审视美国的暴力文化,但对这样一个扎根于美国传统的话题的反思究竟能持续多久是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 [2]金·闪灵[M].黄意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3]ROGAK L.Haunted heart: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ephen King [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9:79.
- [4]金·头号书迷[M].柯清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5]王成兵.对当代认同概念的一种理解[J].学习与探索,2004(6):19.
- [6]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
- [7]金·魔女嘉丽[M].张建琴,李宁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8]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74.
- [9]斯卡尔.魔鬼秀:恐怖电影的文化史[M].吴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 [10]KING S.Vermont library conference/VEMA annual meeting: the bogeyboys[EB/OL](1999-05-26)[2025-05-20].<https://stephenking.com/works/speech/vermont-library-conference-vema-annual-meeting-the-bogeyboys.html>.
- [11]董乐山.美国的罪与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30-243.
- [12]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M].方晓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3-4.

An Exploration of the Other Violence in Stephen King's Novels

Zhou Yuhang^{1,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Stephen King pays attention to violent incidents occurring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has created many works that showcase the terrifying behaviors of the other and reflect the violent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individuals who are denied by society include both those who have descended into madness and those who have failed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identity. Though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is multifaceted, violence has always been the ultimate solution for the group of socially heterogeneous people to solve problems. While creating horror, King also implies that these violent acts are not merely individual problems but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violence worship in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Stephen King; the other; violence

《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中的 “姐妹情谊”书写研究

王 妮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是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创作的经典小说。小说以华人姐妹珍珠和梅相爱相杀的姐妹情谊为棱镜,真实再现了美国华人移民家族的历史,并具象折射出20世纪中美历史的重大事件。在小说中,兼容忠诚与背叛的“姐妹情谊”,既是解锁主人公人生故事的核心密码,又是投射作家心中某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幕布,更是展示作家创作态度的试验场域。因此,小说以“姐妹情谊”为焦点,一方面透视出姐妹情谊间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另一方面勾勒出姐妹情谊上镌刻的历史印记,同时也发掘出姐妹情谊中蕴含的叛逆基因。

关键词:邝丽莎;姐妹情谊;矛盾性;历史性;叛逆性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5

拥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邝丽莎(Lisa See),虽然容颜上难觅东方痕迹,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对中国文化热烈的爱,用作家的话说:“我奶奶,和我曾祖母一样,是白人,但她的内心却是一个华人……尽管我在体格和相貌上不像中国人,和我奶奶一样,我在心里是中国人。”^[1]邝丽莎素来坚持华裔身份,探索中国文化,书写华人故事,尤其华人女性的故事。自20世纪90年代,邝丽莎凭借《百年金山》(On Gold Mountain)登陆美国文坛以来,其作品就因浓郁的“中国味道”闻名遐迩。但真正奠定邝丽莎文坛地位的作品,当属讲述女书和老同情谊的《雪花与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尤其是同名电影的上映更是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2009年至2011年期间,邝丽莎凭借系列小说《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和《乔伊的梦想》(Dreams of Joy),再次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并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在《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中,邝丽莎讲

述了20世纪一对华人移民姐妹珍珠和梅持续半生、相爱相杀的人生故事。小说将一个华人移民家庭隐秘的家族往事呈现出来,并把自己家族的流亡历史勾连出来,使其成为家族历史的投影。可贵的是,邝丽莎以私人的家族往事为幕布,既再现了华人移民的苦难历程,又投射了20世纪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虚构小说,还是作为家族精神传记,抑或是作为历史小说,两部小说都与姐妹情谊密切相关。正如《今日美国》的评价:“邝丽莎是个天才作家,在《上海女孩》中,她在唤醒人们对移民经历的记忆的同时,再一次探讨了姐妹之间的情感……读者在书中两姐妹的身上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们思念着自己的祖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自己周围的新世界,坚定地跋涉在这片新土地上。”^[2]本文以“姐妹情谊”为焦点,尝试从矛盾性、历史性和叛逆性等维度解读小说,挖掘小说的文本、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一、姐妹情谊的矛盾性

作为邝丽莎最喜欢的题材，“姐妹情谊”不仅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呈现的方式也更多样。对此，邝丽莎曾经解释说：“姐妹关系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相伴最为持久的一种联系，但也会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私密的故事告诉她的女性朋友……这会让女性间产生非常独特的一种亲密感。同时，这也让你非常容易暴露于背叛的危险中。我不是那种喜欢描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作家。相反，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更倾向于揭露女性关系黑暗一面的作家。”^{[3]70}正如邝丽莎所言，她一边保持着对姐妹情谊题材的热爱，一边践行着“亦阳光亦黑暗”的创作理念，而《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就是这种姐妹情谊的矛盾性的最好诠释。

在《上海女孩》中，邝丽莎讲述了饱经磨难的珍珠和梅被迫离开故乡，远赴美国寻找新家园的传奇之旅；在《乔伊的梦想》中，邝丽莎则续写了珍珠和梅人到中年的故事。面对女儿乔伊前往中国寻找生父和理想的冒险旅程，珍珠和梅两姐妹冰释前嫌，联手开启拯救女儿的冒险之旅和治愈之旅。这场从中国—美国—中国—美国的流亡之旅和寻家之旅，围绕姐妹情谊的矛盾性徐徐展开。在邝丽莎笔下，珍珠和梅时而上演感人肺腑的姐妹情深，时而发生激烈的姐妹战争，共同谱写了姐妹的“战争与和平”。作为血缘姐妹，珍珠和梅在亲密的朋友和恐怖的敌人间来回切换，这似乎也印证了母亲对她们生命际遇的预言。母亲相信属龙的珍珠和属羊的梅，会因各自的属相拥有命定的天性并形成复杂的关系：“梅就像她的属相——羊，洋洋自得、自我满足。妈妈说……属羊的人往往只关心自己，只顾着自己快乐。我是属龙的，有着龙那种孜孜不倦进取的劲头，不会轻易满足……龙作为属相中最强的动物，也有它的缺点，‘龙忠诚，要求高，责任心强，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2]8}当性情温和、心地善良、需要被照顾的梅，遇见忠诚负责、从不向命运低头但却固执的珍珠时，她们的命运和关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战争与和平”。

一方面，珍珠和梅是彼此亲近、信任的家人和朋友。作为姐姐，珍珠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梅，并如母亲般二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梅；作为妹妹，尽管

梅生活在珍珠的羽翼下，但在危急时刻，梅总能挺身而出护其周全。在遭遇包办婚姻时，她们有同仇敌忾的勇气；在逃难途中面对死亡威胁时，她们有肝胆相照的义气；在遭遇天使岛羁押时，她们有相濡以沫的默契；在女儿陷入危机时，她们有坚实笃定万里救女的底气。姐妹坚信：“父母亲会去世，女儿会长大、出嫁，可姐妹的关系会维持一生。她是这世上仅剩的惟一一个能和我分享记忆中的童年、父母、上海……妹妹是真正了解我的那个人，犹如我了解她一样……”^{[2]292}另一方面，珍珠和梅是相互嫉妒、竞争的对手和敌人。童年时代，她们为父母之爱争风吃醋，都认为父母更爱对方，甚至连“餐桌上的座位”也成为爱的证明。少女时代，她们因对画家Z.G.的爱成为情敌。只不过在梅与Z.G.陷入爱河甚至孕育生命的情况下，珍珠也对Z.G.陷入了单相思。然而，梅不止隐瞒了自己与Z.G.的恋情，甚至还让不知情的珍珠充当女儿的养母。在嫁为人妇成为妯娌后，珍珠和梅在做家务、抚养女儿、照顾丈夫等问题上仍冲突不断……

邝丽莎将小说分为劫数(Fate)、命运(Fortune)和天意(Destiny)三部分，三个词语连缀起来似乎也暗示了珍珠和梅两姐妹的命运轨迹：“人生的各种际遇早已各有安排，好运总是让人求之不得、歹运总是让人避之不及。”^[4]亦如母亲的预言：龙女珍珠，因强大的生命力量，注定要经历命运多舛、永不妥协的一生；而羊女梅，则因善良、美丽，需要被保护、被照顾的生活。巧妙的是，珍珠带领乔伊等人胜利大逃亡的终章也被命名为“飞龙在天”。该命名似乎完美地呼应了母亲对她们的命运预言，同时也预示了主人公的美好结局。在龙女珍珠命运多舛、浮浮沉沉的前半生，始终有羊女梅的陪伴，她们时而化身成亲密的朋友，时而化身为竞争的对手，就如《纽约时报》畅销书评价所说：“《上海女孩》还是一个姐妹情感的故事。珍珠和梅是密不可分的最好的朋友，她们有共同的希望、梦想以及相互间深深的眷恋，但是，就像任何姐妹一样，她们之间也有小小的嫉妒和竞争。她们相互爱着对方，但两个人都知道怎样才能给对方造成最大的伤害……”^{[2]封底}

二、姐妹情谊的历史性

除关注姐妹情谊的矛盾性外，邝丽莎同样关

注姐妹情谊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既可以指微观的家族历史,也可以指宏观的国族历史。显然,邝丽莎并不满足于让姐妹情谊的故事局限于细琐的私人情感,而让其负载厚重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因此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历史化特色。邝氏曾说:“我对被丢失、遗忘和故意掩盖起来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女人,孩子,老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部分,可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英文中,历史的拼写潜在的意思是‘他的历史’(history: his-story)。然而,我对‘她的历史’(her-history)更感兴趣。”^{[3]70}于是邝丽莎开启从女性视角书写家族历史和国族历史的创作之路,《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就是代表之作。

一方面,邝丽莎将自己家族的移民记忆和家族情感巧妙地融入姐妹情谊中,使其成为家族精神传记。邝丽莎来自20世纪美国西海岸显赫的华裔家族——泗家(实为“邝”家,邝泗进入美国登记名字为“邝泗”,按照美国姓名使用习惯,将名字当成姓氏,被误认为“泗”姓)。家族创始人邝泗,本是广东佛山的乡村少年。1871年,少年邝泗在族人资助下漂洋过海抵达美国。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识,邝泗很快从华工群体脱颖而出,并开创了家族企业邝泗公司。年轻有为的邝泗结识并迎娶白人女孩莱蒂茜,进而缔造了混血家族“泗”家……“我家族中的华人一支当初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要逃离战争、饥饿和贫穷。他们向往在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离开中国也意味着对自己出生的家乡说再见,告别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熟识的所有人与物。这种经历正是美国历程的血与泪。”^[5]作为邝泗的曾孙女、家族第四代传人,邝丽莎有着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因其童年就和亲人一起生活在充满中国味道的唐人街,家族记忆和中国情怀成为深入骨髓的存在。随着唐人街的逐渐消失和家人的日渐离去,邝丽莎产生了强烈的失去感:“失去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唐人街;再也听不到叔叔伯伯们跟我讲发生在不同的唐人街的故事;再也没人知道我在邝泗大家族家谱中的确切位置……”^{[2]295}这种感觉也成为《上海女孩》系列作品的创作动力和情感驱动:“创作《上海女孩》中珍珠和梅这两个人物,让我回到我出生之前的时代,到达了我挚爱的地方,还让我可以用作家独有的方式,和人们的‘碎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笑声……我会永远记住这些人、这些地方……”^{[2]296}

另一方面,邝丽莎将20世纪惨痛的移民历史和移民记忆巧妙地融入姐妹情谊中,使其成为华人移民的集体记忆和移民史诗。在《上海女孩》中,邝丽莎主要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生在中国上海和美国洛杉矶唐人街的移民故事,试图用一段隐秘的家族往事再现华人移民美国的苦难历史。“就《上海女孩》而言,历史绝不是姐妹情故事可有可无的装饰。小说中所描写的历史,特别是作品对30年代天使岛移民审讯和50年代自白运动的描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历史无疑是一脉相承的。”^{[6]129}在《乔伊的梦想》中,邝丽莎则以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为背景,以华裔女孩乔伊中国寻父和华人母亲珍珠中国救女的行踪为线索,将深藏的家族秘密抽丝剥茧地揭露出来,进而将华人移民的苦难历史和族群创伤呈现出来。为达到还原历史的目的,邝丽莎不仅将主人公放置于真实的“历史时空”让其经历真实的“历史事件”,还在细节上高度还原了“历史现场”,并努力构建一种真实的“历史空间”。换言之,邝丽莎尽可能让主人公穿行于真实的“历史时空”,用真实的细节高度还原华人移民迁徙、异域生存、寻找家园等民族记忆,使作品成为华人移民的移民史诗。

此外,邝丽莎还借助主人公的经历和感受,再现20世纪中叶华人移民可能经历的和可能感受的历史真实。尽管珍珠和梅等小说人物、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读者仍然可以从高度还原的“历史时空”中,辨认出某些历史细节和历史事件,并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真实,因为这是某些群体共同的生存经历和生存体验。“人们曾经在我在《上海女孩》中所描写的那些地方生活过,经历过其中的某些事件。”^{[6]130}珍珠和梅也许是虚构人物,也许是许多有相似经历的真实人物的代表,扮演着历史语境中的人物角色。不管珍珠和梅的身份究竟如何,但导致姐妹苦难人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本身,远远比姐妹间的爱恨情仇重要得多。邝丽莎将珍珠和梅的私人情感、个人经历放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她们的个人际遇、人生经历折射出历史的滚滚洪流和时代的沧桑巨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珍珠和梅的姐妹故事与其说是一部书写个人与命运斗争的虚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书写20世纪中叶移民历史和家国历史的历史小说。

三、姐妹情谊的叛逆性

尽管邝丽莎一直标榜《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是历史小说,并且小说的确具有历史小说的特征;但深入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部分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与真实历史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事实上,这两部讲述华人移民历史的小说,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小说,不如说是一种徘徊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历史小说”,一种融合历史真实和作家想象的“历史小说”。虽然邝丽莎以华裔自居并痴迷于中国文化,但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历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邝丽莎围绕姐妹情谊展开的华人移民历史书写,先天就有“文化误读”和“文化叛逆”的现象,这也意味着邝氏笔下的姐妹情谊与生俱来就有几分叛逆性特征。在小说中,姐妹情谊的叛逆性主要表现为珍珠和梅两姐妹特立独行的生存姿态,永不抛弃彼此的姐妹深情和某种程度上的“东方主义”倾向。

一方面,姐妹情谊的叛逆性主要表现为珍珠和梅两姐妹以特立独行的生存姿态对抗世俗生活,最终活出属于两姐妹自己的生存状态。少女时期,珍珠和梅是东方巴黎上海的摩登女郎,甚至成为代表美人的“月份牌女郎”,她们自诩:“我们是‘高等华人’——高等中国人,我们的宗教就是‘崇洋’……我们属于富有的布尔乔亚阶级。”^{[2]10}虽然看似有些年少轻狂,但她们以青春的容颜和摇曳的身姿铭记了上海的昔日繁华。少妇时期,漂洋过海的珍珠和梅沦为洛杉矶唐人街上贫穷的小妇人,珍珠发现:“让我感觉最深的是失落感、漂泊感、心神不宁以及无法释怀的对过往生活的怀念……唐人街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个难民……”^{[2]125}尽管面对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两姐妹还是在唐人街站稳了脚跟:珍珠成为路家聪慧、能干的当家主母,梅则成为好莱坞的电影演员,甚至还经营起一家电影周边公司。可以说无论身处荣华还是身陷苦难,珍珠和梅两姐妹都没有被生活击败,而是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活出属于她们的精彩人生。

另一方面,姐妹情谊的叛逆性还表现为永不抛弃彼此的姐妹深情。每当面临人生危机,珍珠和梅永不抛弃彼此的姐妹深情一次次地帮她们虎口脱险,甚至某些特殊时刻的惊鸿一瞬成为时代的最好印记。当珍珠遭遇日本兵轮奸几近死亡之时,

身怀有孕的梅不顾自身安危、长途跋涉将珍珠送抵安全之地。当梅在天使岛遭遇内忧外患、濒临生产之时,珍珠以智慧和勇气帮梅顺利生产并移花接木地成为婴孩的“母亲”,也为日后顺利进入路家奠定基础。当珍珠前往中国拯救乔伊并陷入生存危机之时,万里之外的梅以书信的方式,在精神、智慧上支持珍珠帮其战胜心灵和现实的困境。可以说日军侵华时期的逃难事件、天使岛生子事件和拯救女儿乔伊事件,既是珍珠和梅两姐妹前半生最严重的创伤性事件,也是她们姐妹关系最重要的考验性事件,更是她们姐妹情谊的标志性事件。事实证明,珍珠和梅在任何情况下永不抛弃彼此的姐妹深情,成为她们最坚强的后盾,鼓励她们永不言败地去战胜各种苦难,并在苦难中绽放最美的生命之花和人性之花。

此外,姐妹情谊的叛逆性还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东方主义”倾向,使珍珠和梅的姐妹情谊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叛逆性。在《乔伊的梦想》开篇,得知身世之谜的乔伊只身前往特殊时期的中国寻找生父Z.G.和社会主义理想,从此陷入了生存危机。为拯救乔伊,珍珠重返故乡开启在中国大地寻找女儿的拯救之旅。随着漫游不断地推进,珍珠不知不觉以西方人的有色目光审视中国和美国间的差异。对珍珠而言,旧上海是她永远回不去的故乡,新上海是她注定无法抵达的异乡,洛杉矶则是她获得幸福的家园,于是珍珠选择了美国作为自己的家园归属,誓要带领乔伊脱离“苦难的中国”,回归“幸福的美国”。在寻找乔伊的路上,珍珠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东方主义”倾向。如果说前期寻找乔伊的旅程中,珍珠看待中国上海的目光是一种隐性的“东方主义”的话,那么后期前往安徽农村青龙村拯救乔伊的旅程中,珍珠看待中国农村的眼光则是一种显性的“东方主义”。在前往青龙村的路上,珍珠看见饥荒年间中国农村地狱般的模样:“衣衫褴褛的人们在路边爬行,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田野里,散布在路上。气味很难闻,尸体上没有血迹,肉也腐烂了,这些尸体像灰色干瘪的木乃伊。路上的野狗很多,它们以尸体为食。”^[7]至此,西方旅人珍珠眼中的“恐怖中国”与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主义”印象彻底重合,西方人心中的“东方主义”偏见也彻底显影。在经历一系列惊险的拯救行动后,珍珠更坚定了自己的家园归属——美国。

虽然梅并未和珍珠一起回中国,但作为“缺席

的在场者”——梅一直以书信的方式参与“拯救行动”。作为一个外置形象,梅一边与珍珠积极地互动并成为拯救行动最坚定的支持者,一边作为耐心的倾听者使珍珠的中国之行得以娓娓道来。最后珍珠带领乔伊、画家等人历经重重困难与梅在香港胜利会师,并一起踏上前往美国的“回家”之路。无论从动机、行动还是结果上看,这场由珍珠和梅两姐妹共同完成的“拯救行动”都充满了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因为它“可以表达西方的力量,又可以表达(西方人眼中所见的)东方的缺陷”^[8]。在珍珠和乔伊的目光里,在珍珠和梅的书信里,西方人眼中的“恐怖中国”逐渐显形,封闭的、落后的、野蛮的形象逐渐清晰;同时西方人眼中的“文明西方”也日渐显影,开放的、先进的、文明的形象也日渐清晰。可以说这场由华人移民珍珠和梅共同完成的“拯救行动”,因其或隐或显的“东方主义”倾向有了几分“文化失真”的意味,进而使珍珠和梅的姐妹情谊也带有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叛逆性。

结 语

作为邝丽莎女性题材的经典之作,《上海女孩》《乔伊的梦想》以珍珠和梅的“姐妹情谊”为焦点,既透视出姐妹情谊间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又勾勒出姐妹情谊上镌刻的历史印记,还发掘出姐妹情谊中蕴含的叛逆基因。由于难以割舍的“中国

情结”,邝丽莎尝试以真实历史为经,以浪漫想象为纬,编织了一段华人移民姐妹情谊的织锦,借此来向西方世界展示其心目中的“中国故事”。但在西方世界的成长经历又使作家邝丽莎不自觉地带上“东方主义”目光,进而使其笔下的“中国故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形”。然而,中西文化和中西价值共同作用于邝丽莎身上,使其成为沟通、交流中西文化的使者。作为文化桥梁的邝丽莎,通过这个姐妹情谊的“中国故事”,一边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一边又让中国读者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并让中西方读者在这个新版的“中国故事”中更好地沟通交流和理解彼此。

参考文献:

- [1] 邝丽莎.百年金山[M].王金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 [2] 邝丽莎.上海女孩[M].谢春波,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
- [3] 迟浩男.跨越族裔的文化传承:专访华裔美国作家邝丽莎[J].英语学习,2020(2).
- [4] 董美含.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1:63.
- [5] 佚名.金发碧眼的华人后裔:聚焦华裔移民血泪[N].广州日报,2009-08-11(6).
- [6] 曾梅.《上海女孩》中带着历史镣铐的姐妹情[J].当代外国文学,2011(3).
- [7] SEE L. Dreams of Joy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303.
- [8] 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6.

A Study on the Portrayal of Sisterhood in *Shanghai Girls* and *Dreams of Joy*

Wang Ni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Girls* and *Dreams of Joy* are classical novels written by Chinese American author Lisa See. Using the intense and emotionally charged sisterhood between Chinese sisters Pearl and May as a prism, the novels authentically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lso symbolically reflecting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n these works, the theme of "sisterhood" which encompasses both loyalty and betrayal serves not only as the key code to unlocking the protagonists' life stories, but also as a narrative screen onto which the author projects certain historical events, and as a testing ground for authorial stance. Therefore, with "sisterhood" as the focal point, on one hand, the two works reveal the unforgettable love-hate relationships within sisterhoo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outline the historical imprints engraved on sisterhood. Additionally, the rebellious genes embedded in sisterhood are explored.

Keywords: Lisa See; sisterhood; contradiction; historicity; rebellion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多维特征与深层逻辑

——基于社会转型中的代际变迁视角

张樱樱

(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体育)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在社会加速转变以及数字化发展的双重环境下,大学生婚恋观呈现传统性与现代性激烈碰撞的复合样态:恋爱观多元化与理性化趋势并存;择偶标准虽“去传统化”却受地域、学历等隐性结构制约;婚姻观从制度性义务转向选择性生活方式,但稳定性面临挑战;性观念呈现认知开放与实践保守的张力。这一变迁受多维机制影响,如文化转型中个体主义与传统伦理的博弈、经济压力与消费主义对情感关系的异化、算法技术强化的信息茧房效应,以及家庭与高校情感教育的系统性缺失。对此,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个体”四维协同路径,通过文化生态与政策支持、构建全周期教育体系、革新代际互动模式及增强主体情感胜任力,可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包容的婚恋价值观。

关键词:大学生;婚恋观;社会转型;代际变迁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6

前 言

婚恋观作为个体价值观的核心维度之一,不仅是社会文化的微观投射,更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化体现^[1]。在全球化、数字化与市场化交织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正经历从传统乡土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深层结构变迁,这一进程深刻影响青年群体的价值认知与生活实践。当代大学生作为“Z世代”“00后”的主体,成长于改革开放深化与互联网普及的双重语境中,既承载着农耕文明延续的家庭伦理惯性,又直面个体主义兴起、消费文化渗透和数字化生存的多重冲击,其婚恋观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激烈碰撞的复合样态。代际变迁的维度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父辈的集体主义婚恋逻辑不同,当代大学生成长于“4-2-1

家庭结构”和“独生一代”的环境中,面临更强烈的个体发展诉求与代际期待的冲突。从“80后”对裸婚的争议性讨论,到“00后”对不婚不育的坦然选择,代际间婚恋观念断层不仅体现经济体制改革、人口政策调整的宏观效应,更反映出文化价值观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换^[2]。

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婚恋观的演变已超越个体情感选择范畴,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切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呈断崖式下降,从1 224.71万对降低到610.6万对^[3]。结婚人数的持续下降,直接关联到人口结构的失衡与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婚恋观不仅关乎个人幸福与家庭稳定,更深远地影响着我国的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加速转型与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

收稿日期:2025-07-29

基金项目:浙江省202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浙江省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浙社科办[2024]58号)

作者简介:张樱樱(1981—),女,山东青岛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一变革不但反映青年群体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更映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及技术发展对个体情感选择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多维特征与深层逻辑,为引导其建立理性包容的婚恋观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一、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多维特征

(一)多元化与理性化并存的恋爱观

大学生的恋爱观呈现多元化与理性化交织的特征,其内在动因与行为选择反映出社会文化转型与技术发展的双重影响。

1. 恋爱动机的分化与情感实践的虚实融合。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动机显著分化,情感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一方面,传统情感依恋与亲密关系建构仍是重要诉求,部分大学生通过恋爱寻求情感支持与归属感;另一方面,恋爱被赋予自我探索与社会化成长的功能,部分大学生将其视为认知自我、积累社交经验的路径^[4]。这种分化在虚拟化情感交互中进一步显现。数字媒介催生了虚拟亲密关系,部分大学生对虚拟形象产生情感投射,形成独特的亚文化实践模式^[5]。然而,虚实交织的情感实践也暴露出潜在风险,如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与情感认知异化。此外,恋爱观的多元化还体现在价值取向的冲突中,“Z世代”青年虽积极通过影视作品学习亲密关系知识^[6],但部分个体陷入间歇性期待恋爱、持续性享受单身的矛盾状态。他们既渴望情感联结又逃避责任承担,同时“快餐式恋爱”现象普遍,恋爱周期缩短,长期关系经营意识薄弱^[7]。

2. 理性趋势的强化与关系评估的现实转向。在行为选择层面,大学生恋爱呈现明显的理性化转向。尽管浪漫追求仍是主流,但现实考量日益凸显。超过80%的大学生将人品、性格列为择偶首要因素,经济基础与职业发展协同性亦成为亲密关系评估的重要维度^[8]。这种趋势与社会流动加速及生存压力加大密切相关,“毕分族”现象折射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下,对情感关系与职业规划的权衡^[9]。理性化不仅体现于择偶标准,更渗透于关系维护中,大学生开始重视情感共鸣与价值观契合。自我表露与成人依恋模式被证实是影响关系质量的关键因素^[10]。这表明当代

大学生正试图在情感需求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二)个体偏好与社会结构双重制约的择偶观

当代大学生的婚恋选择机制呈现出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规范约束相互交织的特征,其选择具有既突破传统框架,又内嵌社会规训的隐性张力。

1. 择偶标准的解构与隐性结构再生产。大学生择偶标准体现出显著的“去传统化”特征,传统“门当户对”观念的影响力持续弱化^[11],取而代之的是以三观一致、性情品格为核心的新评价体系,这种转变反映出青年群体对精神契合与个体独特性的追求^[12]。然而,隐性社会结构仍通过地域、学历等维度持续形塑个体的择偶实践,如城市大学生更倾向选择同城市背景配偶,研究生群体则优先考虑学历匹配对象。这种显性去传统、隐性维持既有结构的矛盾现象,本质上是个体在自由选择意志与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间的妥协^[13]。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条件在择偶决策中仍占据重要位置,大学生将体制内职业、购房能力等指标纳入评估体系,也反映了经济理性对亲密关系的渗透^[14]。

2. 择偶场域的数字化与圈层化重构。互联网技术正在塑造当代大学生新的择偶路径,形成数字化渠道与传统模式并存的格局。社交软件成为拓展社交圈的重要工具,但线下渠道仍保持相当影响力^[15]。这种数字媒体的介入不仅扩展了择偶半径,更催生了以兴趣圈层为核心的新型联结方式。共同兴趣被视为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特定群体形成独特的择偶亚文化。与此同时,性别角色重构面临现实困境,女性群体拒绝传统性别规训,但遭遇高学历择偶劣势的社会偏见。这种矛盾揭示了性别平等观念进步与结构性不平等之间的张力,构成当代青年择偶实践的重要社会语境^[16]。

(三)从制度性义务到选择性生活方式的婚姻观

当代大学生的婚姻观正经历从制度义务向个体选择的历史性转变,其价值取向包含对传统框架的突破,也折射深层社会变迁的复杂影响。

1. 婚姻认同的解构与个体化转向。传统婚姻的制度性义务色彩显著淡化,婚姻逐渐被视为个人选择而非社会义务^[4]。这种转变反映了婚姻中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崛起,青年群体更倾向将婚姻视为情感满足的载体而非社会身份的必需品。不

婚主义、晚婚等现象逐渐普及^[17]，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晚婚成为愈发普遍的选择，呈现出青年对婚姻本质认知的变化，即婚姻不再是人生必经的标准流程，而是需要审慎权衡的情感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大学生对婚姻认同去神圣化，但对婚姻本质的认知并未完全颠覆，多数人仍认可婚姻作为情感依托的价值，这种矛盾心态恰是社会转型期文化调适的典型表征^[4]。

2. 婚姻模式多元化与稳定性挑战。新型婚姻模式不断涌现，部分大学生对“周末夫妻”“AA制婚姻”等形态表示接纳。大学生对婚姻中个体独立性与平等关系的追求，突破了传统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强调双方在经济、情感、责任上的平等分担^[18]。然而，婚姻稳定性面临显著挑战，闪婚闪离现象增多，部分群体对婚姻缺乏敬畏感，将离婚视为解决矛盾的快捷方式^[5]。这种矛盾现象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对婚姻功能的重新定义，婚姻不再被视为终身制的安全港，而更倾向于一种动态的情感联结方式。与此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经济压力成为削弱婚姻与生育关联性的关键因素^[19]。育儿成本、住房压力以及职场竞争的加剧，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生育决策与经济稳定高度绑定，甚至出现经济不稳定不敢生育的集体焦虑。这种婚育观的嬗变，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个体化趋势与制度性约束博弈的产物。

（四）开放话语与保守实践并存的性观念

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呈现认知开放与行为保守并存的复杂特征，这种张力源于代际文化冲突，也是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动态重构。

1. 认知层面的开放性。在认知维度，大学生性观念已突破传统伦理框架，形成显著的代际断层。研究显示，多数受访者将性视为正常生理需求，对婚前性行为、同居等非传统性实践的接纳度显著提升^[20]。同时，大学生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的包容性增强^[21]，对“试婚”等新型亲密关系模式亦表现出一定认同。大学生普遍强调个体在性观念与行为选择上的自主性，将性视为个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社会观念多元化对青年认知图式的形塑。

2. 行为层面的保守性。尽管多数大学生对性行为在认知层面呈现开放姿态，但在实践层面仍表现出显著保守倾向。部分受访者对婚前性行为

持审慎态度，折射出传统性道德规范在行为约束中的持续影响。多数大学生认为性行为应基于稳定的情感关系^[22]，超八成受访者强调“性是神圣的，应发生在单一的亲密关系中”^[23]。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反差深刻揭示了传统伦理内化与现代观念冲击的矛盾性。当代大学生在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中，依然会遵循情感契约准则，通过划定行为边界来实现价值体系的动态平衡。

二、社会转型的深层影响机制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多元变迁，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深嵌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复杂系统之中，是宏观结构性约束与微观个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借鉴社会学“结构-能动性”分析框架^[24]，本研究认为结构性约束构成了婚恋观演变的深层土壤与刚性条件，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转型、人口与家庭结构变迁、文化价值范式转换和制度政策环境等；个体能动性体现在大学生面对上述结构性约束时，所进行的认知解读、价值排序、策略选择与实践行动。这种能动性选择既是对结构性约束的适应性选择，也是个体主义价值观内化与实践的结果。同时其集体性选择倾向又反过来强化和再生产了特定的社会结构。技术革新、教育功能缺失等因素，则主要扮演着中介、强化或表达渠道的角色。它们并非独立驱动婚恋观剧变的首要因素，而是在结构性因素变迁与个体能动性发挥的交汇点上，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方式、互动模式、观念传播速度与广度，加速深化、显化并拓展了由更深层社会力量驱动的实践空间。

（一）文化变迁中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机制

1. 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嬗变构建了传统规范与现代观念的张力场域。后现代思潮的渗透消解了传统婚恋观的单一权威性，个体化逻辑逐渐成为青年群体认知婚恋问题的核心框架^[25]。大学生在自由恋爱、性别平等等现代性话语与家庭传宗接代、适龄婚育等传统期待间形成认知撕裂，这种双重规训导致其婚恋实践呈现矛盾性特征。正如杜平所指出，代际文化冲突使青年在婚恋选择中面临传统伦理约束与现代理性诉求的双重拉扯^[26]。文化符号的混融性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冲突，传统婚俗仪式与新兴亲密关系模式在青年群体中

形成叠加态,既保留“彩礼”“见家长”等仪式环节,又接纳“试婚”“周末情侣”等非传统形态。这种文化杂糅现象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重构的微观表征,大学生通过创造性调和实现传统伦理与现代理性的动态平衡。

2. 消费主义渗透导致的情感异化。消费主义逻辑对婚恋领域的渗透重构了亲密关系的实践方式^[27]。资本通过制造“情人节”“520”等消费节点,将情感表达简化为符号化商品交换,仪式感成为资本规训情感的重要载体。这种异化机制使婚恋关系陷入符号消费的陷阱,情感联结逐渐被物质表征所替代,消费文化催生的浪漫经济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婚恋认知。商家通过构建“礼物价值=情感深度”的伪命题,将亲密关系纳入市场交换体系。这种异化倾向导致快餐式恋爱现象蔓延,短暂性、表演性的情感互动模式挑战着传统婚恋的稳定性,反映出资本对情感领域的深度殖民。

(二)社会结构变迁中压力与机遇的形塑作用

1. 经济理性导向和生存压力致使婚恋策略转变。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经济理性逻辑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婚恋实践^[28]。高教育投入成本与严峻的就业市场竞争形成双重挤压,使大学生群体普遍陷入生存焦虑状态。这种结构性压力促使婚恋选择被纳入风险规避框架,先立业后成家的延迟满足策略成为主流应对机制。婚恋行为逐渐被视为需要经济基础支撑的可选消费,而非青年阶段的必然生命历程。教育资本化趋势加剧了这种经济理性倾向,高等教育回报周期延长与职场内卷化现象,使个体发展优先性超越亲密关系需求。婚恋决策与职业发展形成强关联,物质保障成为进入婚恋市场的重要前提条件^[11]。这种转变既反映了社会竞争加剧对青年生存策略的形塑,也预示着传统婚恋伦理在经济理性冲击下的适应性变迁。

2. 教育经济地位的提升影响婚恋权力格局。女性教育获得与经济地位提升构成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对婚恋领域的性别权力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女性受教年限延长和职业参与深化,打破了传统婚恋模式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预设,改变了婚恋议价能力。当代女大学生普遍拒绝将婚姻作为唯一人生归宿,转而追求情感关系中的平等主体地位^[29]。尽管性别平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结构性性别矛盾依然存在。职场婚育歧视与家

庭责任分配不均等制度性障碍,持续制约着女性婚恋选择自由。这种矛盾性反映出性别革命的不彻底性,女性虽然获得形式上的受教育平等,但仍需在婚恋市场中应对隐性性别规训。社会转型既为女性提供了突破传统角色的机遇,也使其面临新旧性别秩序交织的复杂境遇。

(三)技术影响下数字化生存的双重效应

数字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改变了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具体形态与互动过程,但其影响需置于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价值变迁的背景下理解。技术本身并非婚恋观变迁的独立根源,而是为结构性压力下产生的需求和文化转型中涌现的观念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表达空间和强化机制。

1. 社交媒体对婚恋观的中介性影响。作为当代大学生婚恋认知建构的核心场域,社交媒体为结构性压力下产生的需求和文化转型中涌现的观念提供了关键的中介平台^[15],其运作机制深刻塑造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呈现与感知。具体而言,平台为用户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想化恋爱形象需求提供了表演空间。用户通过精心设计的自我呈现,构建选择性美化的情感互动,形成与现实可能存在割裂的展示性亲密关系。这种虚拟呈现机制容易助长部分用户将线上的情感表演误认为是真实状态,陷入虚拟恋爱的认知误区^[30]。同时,社交媒体将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为情感联结的物化倾向和亲密关系体验的游戏化、肤浅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与强化机制。这种技术媒介化过程不仅改变了情感的表达形式,也参与影响青年对亲密关系本质的理解,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伴随深度情感联结能力的弱化现象。

2. 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对婚恋观念分化的强化作用。算法推荐技术及其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并非观念分化的始作俑者,而是强化了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既已存在的圈层分化趋势^[31]。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依据用户既有的行为数据和偏好,持续构建和强化特定的认知图式。例如,关注不婚主义或独立女性内容的用户群体被持续推送同质化信息,而传统婚恋观念支持者也固守于保守观念的茧房中。这种技术驱动的规训机制显著加剧了婚恋观念市场的群体隔离,压缩了不同立场群体间的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信息茧房在代际层面产生了结构性影响,青年群体与父辈在信息获取渠道和内容偏好上的技术性差异,被放大为近

乎平行的话语体系。当算法逻辑主导的信息分发日益取代基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观念交流时,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面临严峻挑战,技术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加深鸿沟、增加社会价值整合难度的角色。

(四)教育功能缺失与系统性引导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1. 家庭情感教育的缺位与代际对话失效。家庭作为情感社会化的初始场域,其教育功能的弱化对青年婚恋观形成深远影响^[32]。调查显示,多数家长回避关于性与婚恋话题的讨论,这种沉默教育导致子女缺乏早期情感认知框架^[33]。原生家庭婚姻模式通过隐性课程传递价值观,父母离异家庭子女对婚姻制度普遍存在信任危机,这种情感创伤代际传递现象揭示了家庭系统对个体婚恋认知的影响。家庭情感教育的缺失还体现在生命教育环节的空白,传统家长制话语体系难以回应青年对亲密关系中平等、尊重等现代诉求,导致两代人在婚恋问题上形成认知断层。当家庭无法提供有效的情感指导时,青年转而寻求同辈群体或网络社区的支持,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情感教育功能。

2. 高校婚恋教育与实践脱节。高校作为系统性知识的供给主体,在婚恋教育领域存在失灵。婚恋教育内容多依附于思政课程体系,缺乏独立课程设计与专业师资配置,导致教育实践呈现碎片化特征^[34]。现有课程偏重道德说教与政策宣导,忽视了对大学生情感管理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的培养,形成知识灌输与能力培育的错位。教育理念的滞后加剧了结构性矛盾,高校婚恋教育仍停留于防风险的底线思维,未能回应青年对亲密关系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当教育供给与青年发展需求脱节时,婚恋教育难以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反而陷入学生不愿听、教师不愿教的恶性循环。这种系统性缺失使高校错失了婚恋观培育的关键窗口期,客观上放任了商业机构、自媒体等非专业力量去填补教育真空。

三、多维协同机制的破局路径

(一)文化生态重构与制度支持

在婚恋文化重构与制度创新层面,需通过价值引领与政策干预的双向驱动,构建系统性治理

框架。主流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应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减少对功利化婚恋观的过度渲染,转而加强对多元婚恋形态的客观呈现。例如,可通过开设专题栏目系统解读新型婚恋模式,以跨代际案例分析消解代际认知隔阂,形成价值引导的传播模式。同时,将婚恋文明建设纳入城市精神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依托社区公共空间开展主题实践,借助公益传播载体塑造理性婚恋认知,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社会文化生态。

政策层面应构建精细化的干预体系,打造贯穿婚恋各阶段的制度保障网络。一方面,完善婚育扶持政策,通过拓宽婚育补贴范围、给予保障性住房福利倾斜、减免生育医疗开支等手段,减轻经济因素对婚恋选择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健全婚恋领域法治建设,对婚前财产公证细则、离婚权益保障条款进行完善,清晰界定婚姻存续期间各方权责,以此降低个体对婚姻潜在风险的担忧^[35]。此外,还需建立预防性服务机制,推动高校与社区合作搭建婚恋指导平台,将法律咨询、心理援助、纠纷调解等服务功能整合,形成“事前预防—中端介入—末端保障”的全流程服务架构。

文化生态重构为制度创新提供价值导向,政策干预为文化转型提供实践支撑。通过媒体叙事转型消解物质主义婚恋观,以法治规范明确婚恋关系边界,借公共服务优化婚育决策环境,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个体参与的婚恋治理共同体。这种多维度治理模式,既能回应当代青年婚恋困境的现实诉求,也可为婚姻家庭制度的现代转型提供理论参照。

(二)构建全周期教育体系

全周期教育体系的构建需以课程重构为基础、文化浸润为支撑、评价改革为保障,形成立体化育人机制。在课程维度上,应建立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技能再到跨学科融合的课程体系。基础理论层可设置《婚恋与家庭伦理》课程,通过整合马克思主义婚恋观、社会学家家庭理论等知识模块,构建青年学生认知婚恋本质的理论框架。实践技能层需开发《亲密关系工作坊》等体验式课程,运用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教学方法,针对性培育情感沟通、冲突调解等核心能力。跨学科融合层则应打破学科壁垒,创设《婚姻经济学》《性健康与法律》等交叉课程,综合运用心理学依恋理论、法学权益保障机制、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工具,深化对婚恋现象的多维解析。这种分层递进、学科互涉的课程

设计,可以搭建起从认知建构到行为训练、从现象描述到本质探究的育人体系。

校园文化作为隐性教育载体,可构建同辈群体引导、典型案例示范、心理支持体系的三维浸润体系。同辈群体引导可通过组建婚恋观研讨社团,以读书会、主题辩论等形式激发主体性思考。典型案例示范则可邀请模范家庭代表开展婚姻故事汇活动,通过真实叙事传递责任担当、包容共情等核心品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心理支持体系需在既有服务框架内增设婚恋心理专线,配备专业咨询师团队,针对亲密关系困惑、婚育焦虑等典型问题建立工作机制,构建情感困扰早期预警系统。

教育评价体系的革新是确保育人成效的核心要点。在德育评价方面,要摒弃单纯以分数衡量的模式,把婚恋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养的考评体系。可以设计情感责任实践任务、婚恋伦理思考记录等过程性评估方式,全面考量大学生在处理亲密关系时的道德判断、共情表现和责任担当^[36]。此外,还应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向婚恋教育方向拓展,在专业课程内容中巧妙融入家庭伦理观念、性别平等理念等教育内容。这种将直接教育与潜移默化教育相融合的评价改革举措,有利于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

(三)革新家庭教育理念与代际互动模式

通过家庭教育理念革新与互动模式重构,构建代际协同育人生态。在家长教育能力提升层面,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依托社区教育平台与高校专业资源,系统实施家长教育支持计划。家庭情感教育需实现生活化渗透与早期介入的双重突破,家长可以将婚恋教育融入青少年成长全周期,在中学阶段即启动性健康启蒙与恋爱责任教育,通过家庭观影会、社会议题讨论等日常互动,潜移默化地传递性别平等、情感责任等核心价值。特别要强调的是,父母也需树立自身婚姻关系的示范效应,通过夫妻共同参与家庭决策、协作分担家务责任等实践行为,为子女提供健康亲密关系的生活样本。这种身教重于言传的教育逻辑,有助于将抽象婚恋观转化为可感知的家庭文化。

代际互动模式的创新需引入制度化协商机制。家庭可设计婚恋沟通契约,以书面协议形式明确父母与子女在择偶标准、婚育规划等敏感议题上的权责边界。例如,父母不得强制干预子女恋爱对象选择,但可提供基于人生经验的参考建议;子

女需定期向父母汇报情感发展状况。运用这些操作性条款,将代际协商纳入可预期的规则框架。这种契约式沟通既保留了家庭的情感联结功能,又通过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有效缓解了传统代际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博弈。

(四)增强主体意识与情感胜任力

大学生婚恋观的理性塑造需立足主体性建构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双重维度,通过认知深化、技能培育与数字素养提升构建系统化培育机制。

在自我认知建构层面,需引导青年完成婚恋价值的元认知反思与意义重构。这一过程要求个体通过哲学思辨、心理学工具及经典理论阅读,实现对婚恋需求的元认知反思与价值排序的系统性澄清。在方法论层面,可借助心理测量工具开展依恋模式与情感需求的科学化分析;在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哲学与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研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理论的深入解读,大学生可突破消费主义文化塑造的浪漫爱情神话,建立爱情作为责任与理性选择的认知框架,实现从情感直觉到价值理性的认知跃迁。这种自我认知的深化,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要求个体在多元文化碰撞中保持批判性反思能力,建立基于自我本质需求的婚恋价值坐标系,最终实现从他者导向到自我导向的认知转变。

在情感能力的系统性培养中,沟通能力、责任意识与边界管理至关重要。可通过学习非暴力沟通技巧提升沟通能力,注重区分观察与评判,例如以“我感到焦虑,因为我们最近争吵频率增加”的客观表达替代“你总是忽视我的感受”的主观评判,以此提升冲突解决效率。同时,借助参与志愿服务等实践强化责任意识,从中体会责任内涵,避免将恋爱视为纯粹享乐。相关研究表明,参与过长期志愿活动的学生,在婚恋中更注重承诺。此外,还需做好边界管理,明确个人与伴侣的心理边界,避免过度依赖或控制。

在数字化生存语境下,培养大学生对婚恋相关数字环境的理性驾驭能力,需以媒介素养提升为核心,构建批判性信息解读与现实情感联结的双重机制。具体而言,需引导学生运用媒介批判理论解构社交媒体中婚恋信息的叙事逻辑,如识别消费主义广告通过完美伴侣、仪式感绑架等符号建构的爱情市场化陷阱,穿透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避免陷入同质化婚恋认知循环。同时,通过限定虚拟互动功能边界(如拒绝将数据指标

作为情感质量标准)、增加线下兴趣社群与公益活动参与度等方式,重建具身性情感互动场景,利用现实共同体验促进深度自我表露与信任基础构建。这一过程要求个体在技术工具性与人文价值间建立平衡,既借助数字技术拓展社交边界,又通过批判性认知抵御技术异化,最终在虚拟与现实的张力中形成兼具开放性与反思性的婚恋实践模式。

结语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复杂性,本质是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的集中体现。个体主义与家庭责任的冲突、数字化生存与现实关系的张力、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博弈,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大学生独特的婚恋观。本研究提出的“社会—学校—家庭—个体”四维协同路径,旨在通过转变文化生态、构建全周期教育体系、革新代际互动模式及增强主体情感胜任力,引导大学生建立适时的、理性的、包容的婚恋价值观。

未来,随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大学生婚恋观研究需更紧密地与数字技术、政策创新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动态追踪与实证评估,深化对婚恋观形成机制与干预路径的理解;另一方面,推动跨学科整合与社会治理协同,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唯有如此,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为大学生构建既符合人性发展规律,又适应时代需求的婚恋观引导范式。

参考文献:

- [1] LEVINE R, SATO S, HASHIMOTO T, et al. Love and marriage in eleven culture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5, 26(5): 554-571.
- [2] 李芳芳, 朱冬亮. 从“结婚难”到“独居”: 单身现象的变迁、影响及反思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5): 61-69.
- [3] 国家统计局. 年度数据 [EB/OL]. [2025-03-14].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4] 杨菊华, 史冬梅. 新时代中国青年婚恋观变迁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4(4): 15-29.
- [5] 宋潇雅. 新媒体传播对大学生恋爱观念的重塑与影响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 16(3): 51-55.
- [6] 朱新秤. 青年婚恋观的变迁与思考 [J]. 人民论坛, 2021(35): 94-97.
- [7] 刘晨晔, 苏雯. 90后大学生婚恋观及其教育对策研究述评 [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2): 54-59.
- [8] 张佳, 朱秀杰. 个体化视角下大学生的多元婚姻态度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2(3): 91-100.
- [9] 洪明, 石佳欢, 杨鑫. 从婚恋观到家庭观: 提升生育意愿的视角转换 [J]. 青年探索, 2023(2): 49-63.
- [10] 包丽红, 邱吉. 数字时代大学生婚恋价值观的三重张力及其纾解: 基于首都高校本科生的抽样调查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7): 61-64.
- [11] 陈露菡, 刘战伟, 包家兴. 量化“门当户对”: 一项对青年人表格式婚恋的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5): 40-51.
- [12] 陆峥, 刘梦琴. 青年择偶观现状研究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6(5): 86-91.
- [13] 朱榕君. 书中自有颜如玉?: 单身男博士的文化生产与婚恋策略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4): 102-108.
- [14] 蔡敏.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问卷的编制与验证 [J]. 心理学探新, 2012, 32(3): 257-262.
- [15] 刘德寰, 巩固. 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人婚恋观光谱: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夏普利值分解法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53(5): 102-114.
- [16] 侯静, 李雨欣.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个体化理论视角下高知单身女性群体的特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8): 5-12.
- [17] 王昕. 社会学视角下独生子女婚姻中的“亚丁克”现象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4(11): 19-23.
- [18] 陕劲松. 60年来我国婚恋观的变迁 [J]. 理论探索, 2010(1): 100-102.
- [19] 徐俊, 江砥, 乔晓春. 青年大学生生育意愿何以低迷?: 基于全国29 489份调查数据的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5(2): 149-160.
- [20] 赵浪平, 杜坤林. 圈层文化视域下“Z世代”大学生价值选择困境与信仰塑造路径研究: 基于浙江省6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2): 23-29.
- [21] 陶树果. 大学生LGBT群体现状分析及其对策探究 [J]. 高教论坛, 2021(1): 68-72.
- [22] 杨丽萍, 谭钦月, 肖英伦, 等. 大学生恋爱态度和性心理健康调查 [J]. 中国公共卫生, 2020, 36(1): 120-122.
- [23] 于志强. 社会转型中的私人生活变迁: 基于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分析 [J]. 青年探索, 2024(2): 102-112.
- [24] 陈学金.“结构”与“能动性”: 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百年争论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11): 96-101.
- [25] 赵俊逸, 蔡后奇, 赵松林.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探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1): 22-24.
- [26] 杜平.“般配的爱情”: 城市男性对于婚姻意义的体认与重构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5(1): 53-65.
- [27] 姜振华, 瑶晓燕, 李燕平.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3): 42-50.
- [28] 王旭清. 婚恋现实主义: 农村青年婚恋的表征、逻辑与实践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1(4): 31-38.
- [29] 王勤, 梁丽. 改革开放以来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1(11): 32-36.

- [30] 刘胜枝.效率与爱情 青年直播相亲背后的婚恋困境[J].人民论坛,2024(21):80-84.
- [31] 李貌,韩璞庚.数字时代“信息茧房”束缚下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J].江苏社会科学,2024(3):47-54.
- [32] 沈纪,陈思颖,单可艺.家庭互动模式对大学生婚恋观影响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4):77-86.
- [33] 钱洁.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知识:衔接教育生命时序的可能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20(10):71-76.
- [34] 孔德生,臧凯.论网络时代大学生婚恋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2):145-149.
- [35] 沈奕斐,商建刚.“公平”价值几何?:当代中国城市夫妻离婚财产分配的公平逻辑[J].社会学研究,2023,38(3):135-158.
- [36] 颜柯,刘新庚.人性意义上的大学生婚恋教育转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4):102-106.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 Logic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iews on Marriage and Ro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Zhang Yingyi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Amid rapi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views on marriage and romance manifest a complex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intense collisions between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Romantic motivations exhibit the trend of both diversific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demonstrate "de-traditionalization" yet remain constrained by implicit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and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perspectives shift from duty-bound obligations to personal choices, though relationship stability faces challenges; sexual attitudes reveal tension between cognitive openness and behavioral conservatism.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driven by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s: the interplay of individualism and traditional ethics during cultural transition, economic pressures and consumerist alienation of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algorithmically reinforced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systemic deficiencies in family and university emo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ly, a four-dimensional synergistic approach involving society, university, family and individual is proposed. This framework entails reshaping cultural ecosystems with policy support, constructing comprehensive life-cycle educational systems, innova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s, and enhancing individual emotional competence, all aimed at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in establishing rational and inclusive values regarding marriage and romanc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views on marriage and rom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generational changes

家庭责任视角下高龄农民工 “退”而不休的实践、困境及调适

陈俊峰，王 存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多地出台政策清退高龄农民工。面对日益收紧的用工政策,很多高龄农民工做出“退”而不休的选择。高龄农民工的“退”而不休是受传统代际责任和现代社会事实双重建构后的行为表现。他们通过转变求职市场、城乡流动就业等方式履行家庭责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强就业需求与弱机会获得、高失业风险与低抵抗能力的两难困境。对此,高龄农民工通过管理就业形象、建构就业朋友圈及“赚钱+省钱”的就业逻辑等方式来应对,从而实现自我与家庭利益兼顾的困境调适。

关键词: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就业困境;自我调适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7

一、引言

随着初代农民工年龄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我国高龄农民工群体日益庞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达43.1岁,比上年提高0.8岁;与2012年相比,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近6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由15.1%增至30.6%^[1]。近年来,各地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清退高龄农民工,许多地方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面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日益严格的用工政策,很多高龄农民工并没有选择结束工作返乡养老,而是继续在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程杰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退而不休”的劳动者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享受养老金待遇且仍然从事就业活动的劳动者;二是没有养老金且继续从事就业活动的劳动者。“退而不休”的劳动者指达到

退休年龄仍然从事就业劳务活动的群体^[2]。结合高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他们多数是属于缺乏养老金的“退而不休”群体。与传统“退休”概念中的“退”不同的是,高龄农民工们的“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出职业工作,而是在外部环境挤压下逐渐退出工地、工厂等相对正规的劳动场所。因此,本文将达到退休年龄但仍在工作的农民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把他们统称为“退”而不休的高龄农民工。

目前,学界对于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行为的研究较少,多是对高龄农民工就业困境及对策的探讨。困境方面,严佩升通过对云南省农民工集中片区的高龄农民工进行调查,指出高龄农民工是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他们面临着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抗风险能力弱、家庭负担沉重、就业环境恶劣等多方面困境^[3];付亚杰指出高龄农民工面临就业年龄歧视、就业领域狭窄、就业质量低下等多重就业困境^[4]。对策方面,魏丽荷提出可以采取小组社会工作的方法对高龄农民工群体进

行介入,从实务角度出发去拓宽农民工的就业渠道、改变就业观念、增强其再就业技能,以此纾解高龄农民工的就业困境^[5]。

以上研究主要从城市本位视角解释高龄农民工的就业困境。城市本位视角中高龄农民工被视为被动主体,是被城市就业市场排斥的对象,但这种视角很难回答高龄农民工的就业动机及未来的出路问题,即面对就业困境,他们的“退”而不休意在何为?又将何去何从?笔者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在就业问题中不是纯粹的被动,他们的“退”而不休,既是受外部环境挤压的无奈之举,又隐含着家庭层面的责任伦理。正是这种家庭责任支撑着高龄农民工对“退”而不休行为的选择与延续。基于此,本研究拟从家庭责任视角出发,探究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的选择动力、就业实践、现实困境及自我调适,以期对高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给予特定视角下的理解与反思。

二、“退”而不休: 家庭责任驱动下的理性选择

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行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一方面由中国传统文化下“养儿防老”思想的代际责任驱动,另一方面因现代青年夫妇面临的婚育压力增大的社会僵局所致。因此,高龄农民工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现代社会压力交融而催生的特殊群体。从行为逻辑层面来看,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行为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代际责任与现代社会事实下的观念变迁共同促成的。

(一)传统代际责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典型的“孝道”文化和“传宗接代”传统。因此,高龄农民工基于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代际责任,在老人年迈而子女尚未成立家时,会尽力履行责任。比如,赡养和照顾年迈的父母,赚钱供子女读书,攒钱给子女结婚买房及帮助照料孙辈等。正是这种代际责任,推动着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

1. 作为子代的高龄农民工:赡养老人。高龄农民工为了赡养老人“退”而不休的行为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思想。传统孝道的内涵以孝行为核心,是子辈对长辈尽孝时的赡养行为,被认为是奉养双亲的准则^[6]。子女有

责任在经济等各个方面支持父母,确保他们的晚年生活无忧,在父母年老体弱时,应承担起赡养的责任,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家庭和谐、代际关系稳定的重视。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高龄农民工的父母年龄大多在80岁左右,正处于需要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阶段。访谈对象A09就是其中的典型,家中有一位83岁的母亲。母亲身体不是很好,患有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前几年摔倒骨折做手术花了两万元,手术后期护理加吃药又陆续花了四五千元,现在勉强可以下地走路。因为母亲日常看病吃药等都需要用钱,所以A09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打工。高龄农民工通常承担着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他们有责任确保年迈父母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他们选择“退”而不休,以赚取更多收入赡养父母。当然,他们对长辈的赡养行为亦包含了对子辈的孝道期待。在中国家庭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中,家庭中的赡养行为是一种代际传承,父母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养育子女,等到父母年迈时则由成年的子辈或孙辈赡养。高龄农民工们通过自己对父母的赡养行为给下一代作好表率,希望在将来年迈之时自己也能获得子女的照顾。访谈对象A15说:“孝顺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你自己都不孝顺父母,那将来怎么能要求孩子去孝顺你呢?”

2. 作为父代的高龄农民工:抚养子孙。杨善华等曾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即在传统“养儿防老”的伦理秩序下,父母对子女负有无限责任,在帮助子女成家之后,年老的父母又有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责任与义务^[7]。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的年龄多在50—65岁,又以50—6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他们的子女多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子女还在读高中、大学或研究生;另一种是子女已婚并育有下一代,都是需要大量金钱投入的阶段。

一方面,求职竞争激烈带动学历内卷化。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有效渠道。因此,很多成绩优异的农民工子女会选择考研、考博深造,但受教育年限的拉长也给作为父辈的高龄农民工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年幼孙辈的抚养同样需要财力、精力的持续输出。在中国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和明确的分工合作。高龄农民工身

上背负着对子代乃至孙代的培养和教育责任,为了给子孙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他们选择“退”而不休。如访谈对象A06所说:“我女儿之前是在老家念的初中,但是老家那个学校老师教得不太行,管得也松。后来我就让她去念了一所县城里的私立高中,这个学校升学率挺高的,就是学费贵了些。我想着苦啥也不能苦了孩子,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她上学。”高龄农民工的这一行为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代际责任和家庭观念的坚持。

(二)现代观念变迁外化

城市化与社会流动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结果^[8]。城市化快速发展之下,亿万年轻人因为求学、务工等原因选择去城市发展,努力在城市安家落户、结婚生子。正是这种城市化的社会结构,催生出了亿万城市新市民。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激烈化,婚姻城镇化和教育城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新市民核心家庭扩大再生产的成本上升。高昂的房贷、车贷以及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高龄农民工子代家庭的城市化道路异常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让高龄农民工意识到子代面临的巨大压力,再次撑起“家”的责任与担当。一方面,作为父代,高龄农民工继续为处在上升期的年轻子代输送资源,通过坚持工作积累经济资本,支持子女的城市化发展和社会阶层提升;另一方面,面对即将到来的养老问题,高龄农民工更多的是对自己施压,希望通过自己的务工收入储备养老资金,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减少将来因为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代际矛盾。笔者访谈的高龄农民工中,大多数表示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对子女给予自己经济支持不会指望太多,将来还是“以工养老”为主。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与传统观念中的“帮扶”有所区别的是,许多高龄农民工持有这样的看法:对子女的帮助实际上意味着“不给他们带来困扰就是支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成本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子女在父母养老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子女们面临的经济负担严重削弱了他们尽孝的能力,从而导致了“欲养而不得”的困境^[9]。面对这一现实,高龄农民工觉得一旦自己丧失就业能力,就可能会成为子女的负担。正如访谈对象A08所说:“在过去,长寿是福气。现在子女自己压力也大,我们老了就是累赘,帮不到他们不说,

还一直要花钱,只能趁着自己还能干得动的时候多挣点钱,别给小孩添麻烦!”

三、高龄农民工 “退”而不休的就业实践

(一)转变求职市场与以“家”为中心的就业规划

在打工刚开始时,获得一份可观且稳定的收入是大部分农民工的期望,为此他们对长工市场中的工作有着很高的积极性。但随着年龄增长,高龄农民工在长工市场缺乏竞争力,面临被歧视、被淘汰的风险。吴雪芬在研究中指出,部分高龄农民工因为年龄超限无法缴纳社保、技能较低、劳动风险高等原因容易在就业市场遭受歧视^[10]。与长工市场相比,散工市场的就业准入门槛低、时间自由程度高、用工需求多样,对在长工市场求职受挫的高龄农民工包容性更高。因此,很多高龄农民工将求职目标市场由长工市场转入散工市场。笔者访谈的高龄农民工中,多数表示将来找工作的主要阵地是散工市场。“以前在工地干活,每个项目工期至少几个月,别的不说至少几个月的收入稳定了。现在年纪大了,工地不要咯。当散工还不错,这不像工地对年龄要求那么严,至少能够混口饭吃。”(访谈对象A15)

除了被动地转入散工市场,也有一部分高龄农民工是为了家庭自愿选择成为散工。城市化进程之下,民工子女组建的新生代核心家庭在城市遭遇职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市民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解决养家糊口和生儿育女之间的张力,只能向父代寻求帮助。此时,作为父代的高龄农民工需要匀出时间和金钱给子代家庭。与对考勤、工时有着较为严格要求的长工市场相比,散工市场的工资日结制使高龄农民工能够更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这既保证了一定时间内的收入稳定性,又可以让他们在身体承受范围之内照料孙辈。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的就业规划与家庭,特别是与子代的需求紧密相关。如访谈对象A13所说:“一切以孩子为主,他们如果需要我帮忙带孙子我就少干点活,他们如果不需要我帮忙(带孙子)我就努力多挣些钱,趁着还能干得动,还能贴补他们一些。”由此可见,长工市场到散工市场的转入,是高龄农民工结合市场环境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理性规

划,使他们能在避免身体过度劳累的同时兼顾照料家庭。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二)城乡流动就业与“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

托达罗的人口理论指出人口迁移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作出的反应;只有当一个劳动力预估他在城市的收入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才会发生,否则,劳动力将会继续留在农村^[11]。当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无法给高龄农民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时,高龄农民工的求职成功率降低,伴随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思乡情结,他们就会考虑返回家乡附近的城市就业,石腾飞把这种现象称为“返县就业”^[12]。近年来,农村种植产业的兴起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为高龄农民工的返县就业创造了条件。陈细娣在研究中指出,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迁移,高龄农民工也在不断向中西部迁移,选择“家门口”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多^[13]。笔者调研也发现,随着高龄农民工的返县就业,他们的务工方式开始由专业务工转向兼业务工。他们在县城与农村之间流动,形成了特有的“半农半工”“半城半乡”务工方式。

乡土逻辑可以有效解释高龄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就业行为,即一种基于“落叶归根”的情感夙愿。高龄农民工的出生与成长均在农村,其人际关系也大多在农村。虽然长期的城市生活对高龄农民工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人情礼俗方面,大多数人还保留着农村习惯。例如,他们很重视乡村的人际关系维护和公共事务参与,并担忧长期外出务工后返回农村难以重新融入当地社群。乡土社会中,维持关系网络和社会团结的关键在于人情往来以及村民间的互助协作,而人情往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婚丧嫁娶。如果高龄农民工家中无人参加这些仪式,那么将来自己家庭的婚丧嫁娶也很难有人来参加。高龄农民工深知,随着年龄增长和城市生活成本增加,他们在城市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难,留城务工不是长久之计,返乡养老才是最终归宿。因此,他们需要频繁返乡,积极参与亲友邻里之间的婚丧嫁娶等其他仪式性活动,维持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城乡之间的流动就业,可以满足高龄农民工参与农村仪式的需求,为自己将来返乡的社会网络构建做足准备。

四、高龄农民工

“退”而不休的现实困境

(一)进路之艰:强就业需求与弱机会获得的矛盾

家庭责任刚性驱动之下,无论是作为需要赡养老人的子代,还是作为需要抚育子孙的父代,或是为自己将来的养老作打算,都对高龄农民工的收入获得提出要求。多重责任之下,高龄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十分迫切。虽然他们已经由长工市场转入包容度相对较高的散工市场,但受到自身因素和市场环境的影响,他们在散工市场的处境依然不容乐观。

一是高龄农民工自身就业能力低下。“就业能力”指劳动者利用其劳动技能或动力支持以获得并维持现有工作,同时根据环境变化来实现工作转换的能力^[14]。对于高龄农民工而言,这一能力具体表现为学习能力和技能水平。学习能力方面,高龄农民工多数没有接受基础教育就直接步入社会,缺乏专业知识的积累,这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记忆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会限制高龄农民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速度和效率。科技发展带来的产业更新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学习能力弱的高龄农民工,往往难以快速掌握这些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错失许多就业机会。技能水平方面,高龄农民工的工作多为重复操作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已逐渐被机械化和自动化取代。高龄农民工的工作经验虽然丰富,但由于缺乏新型专业技能,他们的工作价值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在就业市场中,专业技能是决定员工价值的关键因素,技能单一的高龄农民工很难在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是散工市场就业机会的有限与不均。建筑业一直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产业。但近年来,建筑业经济下滑使得其容纳工人的数量减少。伴随“清退令”的实施,一大批失业高龄农民工涌入散工市场寻找工作,散工市场“僧多粥少”局面加剧,求职竞争激烈。受经济社会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身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次级劳动力市场

之中^[15]。与年轻农民工相比,高龄农民工又是弱势中的弱势。一方面,技能单一使他们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但随着传统行业衰落和新兴产业崛起,他们的就业范围变窄。另一方面,在买方市场上,雇主选择工人的权力增大,工作的门槛越来越高。一些雇主会因为觉得年轻人更有活力而倾向于选择年轻农民工,这种年龄偏见导致高龄农民工在求职时受到不公平对待。笔者曾就此现象与散工市场的雇主进行交谈,雇主的想法是“年轻的好啊,干活利索”“年轻人有劲,像这种搬东西啥的,上了年纪的你还得考虑他搬这个会不会有风险,摔了啥的都不好办”。从雇主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影响了雇主的雇佣年龄偏好,从而使高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的机会更加有限。

(二)退路之难:高失业风险与低抵抗能力的矛盾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其中规定,从2025年1月1日起,原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的男职工和55周岁的女职工逐步延迟退休至63周岁和58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逐步延迟退休至55周岁^[16]。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从45岁开始,在就业、收入等多方面就会遭受歧视和挤压,面临失业风险^[17]。随着年龄增长,高龄农民工的失业风险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强替代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使其难以继续从事高强度工作。现有研究指出,人力资本、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18]。但笔者通过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在就业层面的人力资本及社会支持方面均处于弱势,导致其对失业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低。

人力资本方面,高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呈现“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特征。一方面,高龄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技能单一,与年轻农民工相比身体状况较差。另一方面,高龄农民工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与机会。在刚开始打工时,高龄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大多基于乡土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来实现,社会网络所具有的缩短工作搜寻时间和提高面试成功概率的优势能帮助他们快速实现就业^[19]。但同时,这些优势使他们没有机会意识到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从而使高龄农民工缺乏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在年岁渐长时面临高失业风险。访谈对象A17即是这类中的典型。初中没有上完就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起到工地干木工,因为建筑行业发展迅速,当时找活不算太难,也就从来没有想过转行学其他的技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落,建筑行业逐渐不景气,A17因为年龄被工地辞退,只会木工手艺的他不知道还能做哪些工作。

社会支持方面,弱化的家庭经济支持功能与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障使得高龄农民工难以抵抗失业风险。一方面,家庭对高龄农民工的经济支持功能弱化。传统大家庭模式下,父母多和已婚子女及孙辈居住在一起,受中国传统孝道和尊老爱老思想的影响,家庭经济支出多由子女承担。但随着家庭结构变迁,传统大家庭模式逐渐减少,核心家庭成为时代主流。家庭对于高龄农民工的经济支持功能在不断减弱,且这种经济支持功能由原先的子女给老人提供演变为老人要给子女提供的反向发展趋势。调研发现,高龄农民工群体多处于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子女孙辈需要经济帮助的状态。另一方面,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作用有限,面临“城市不养,农村养不起”的尴尬局面。首先,社会保障费率过高导致收入水平偏低的高龄农民工参与意愿不高。其次,高龄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较大导致其劳动合同的签订难度较大。最后,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不同地区缴费标准不同,个人结转、城乡衔接困难,使得社会保障制度执行难度加大。

五、高龄农民工 “退”而不休的困境调适

(一)管理就业形象

散工市场中,雇主是注重招聘效率的个体,雇主与农民工之间的交易时间非常短暂,交易双方需要在短时间内协商好工作内容、工作安排及工作待遇。为了保证利益最大化,雇主通常不会花费过多时间在农民工的身份核查、年龄校验上。这就需要高龄农民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雇主传递信息并证明自己,从而争取工作机会。调研发现,高龄农工会通过自身就业形象的管理,迎合雇主的雇佣偏好,吸引雇主注意,以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是外貌形象管理。高龄农民工的穿着多是工

人的典型装扮,如头戴安全帽、身穿工装服等。这种装扮的显著作用是能让雇主在人群中一眼识别出求职者。针对雇主的“年轻化”偏好,一些高龄农民工会将白发染黑,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二是工具上的“自给自足”。高龄农民工的工种分为木工、瓦工、装修工等多种类型,这些工作通常需要相应的劳动工具辅助。高龄农民工通过自己携带劳动工具包的方式,向雇主证明自己有从事劳动的能力且可以快速着手工作。三是技能证书的直观体现。求职者众多的散工市场中,技能是农民工强有力的竞争手段之一。因此,拥有某项特殊技能的高龄农民工会通过在人前或车上悬挂醒目广告牌或写字木板的方式向雇主传递信息,以此吸引有招工需求的雇主。高龄农民工对自身就业形象的整饰与再造,实质是基于劳动背景下的身份形象规训。他们变被动为主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雇主年龄歧视等客观因素对自身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

(二)建构就业朋友圈

就业信息获取能力是就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信息获取能力强的求职者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打工生涯早期,高龄农民工的就业信息获取主要基于亲缘、地缘关系,但随着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依托传统社会网络获取的就业信息有限,难以支持“退”而不休的就业需求。为了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信息渠道。此时,建构更为广泛的就业朋友圈就尤为必要。高龄农民工就业朋友圈的建立主要基于业缘关系,呈现出两种类型。一是与工友建立的朋友圈。高龄农民工通常采用散烟、搭话、唠家常等方式在市场中与其他工人认识并熟悉,从而演变为朋友,共享就业信息。工友朋友圈的建立不仅可以帮助高龄农民工了解到不同行业的工作情况和就业前景,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还可以起到“减压阀”的作用。通过与工友的聊天,高龄农民工可以得到情感的支持和鼓励,宣泄积攒的压力,不让负面情绪持续累积,造成恶劣影响。二是与雇主建立的朋友圈。这种朋友圈主要体现为雇主联系方式的获取。高龄农民工通过在工作中积极表现、跟雇主说好话等方式取得雇主信任,以此留下雇主的微信、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通过这些联系方式,高龄农民工可以直接了解雇主目前的用工需求,如职位空缺、工作要求、工作环境等,有助于他们更快速地获取适合自己的就

业机会。

(三)“赚钱+省钱”的就业逻辑

人力资本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高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中面临高失业风险。尽管他们在就业市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但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寻找就业的机会,增加收入。为了提高就业成功率,他们通常会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将劳动力廉价出售,如主动接受较低的工资待遇、顺从雇主的不合理安排和自发地进行“内卷加班”等。他们会想方设法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使之转变为经济收入,用他们的话说即“多赚一份钱,多一份安全感”。除了通过自我劳动剥削换取就业机会外,省钱也是高龄农民工缓解就业困境的实践策略之一。他们通过省钱来降低自己待业所造成的经济成本,以此延长等待就业的时间。访谈对象B03直言自己现在住在月租200元的城中村内,为了节省就业成本,在找不到工作时他每天只吃一顿饭,购买新衣服等更是非常奢侈的想法,对于家具设施的日常维修等问题,他会尽量自己动手解决,以避免额外的费用。以B03为代表的高龄农民工深刻践行着“赚钱+省钱”的就业逻辑,高度体现了“家本位”的价值内涵,即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家庭需求永远在他们心中占据首要位置。

六、结语

高龄农民工的“退”而不休行为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受家庭责任刚性驱动的结果。在“退”而不休的就业实践中,他们通过转变求职市场和城乡流动就业的方式来履行家庭责任。同时,他们又面临散工市场就业机会有限与不均、自身就业能力薄弱、高失业风险与低抵抗能力等现实困境。为了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高龄农民工在实践中积极调适,努力平衡来自家庭与就业的压力、纾难解困。这一过程既是他们自身主体性的再生,也是作为社会个体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重要表征。但高龄农民工“退”而不休的困境纾解,仅依靠农民工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携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包容。为此,在接下来的政策实践中,如何基于高龄农民工以家庭为中心的就业实践,探索制定有利于他们“退”而不休的支持政策,调动企业社会责任,扩大县城市场

就业需求,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24-04-30)[2024-11-05].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4/120240430_1948783.html.
- [2]程杰.“退而不休”的劳动者:转型中国的一个典型现象[J].劳动经济研究,2014,2(5):68-103.
- [3]严佩升.云南省高龄农民工生存现状研究[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7,26(6):55-59.
- [4]付亚杰.社会排斥视角下高龄农民工的就业困境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
- [5]魏丽荷.社会支持视角下高龄农民工就业困境分析及实务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23.
- [6]罗丽榕.中国传统孝道的嬗变与当代价值[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11:3-21.
- [7]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1):71-84.
- [8]胡小武,韩雪.流动的悖论:从城市“老漂族”到返乡空巢老人研究[J].河北学刊,2024,44(2):178-185.
- [9]许惠娇,贺聪志.“孝而难养”:重思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4):101-111.
- [10]吴雪芬.浙江省支持“扩中提低”财政政策:以温州市X区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3(2):32-40.
- [11]托达罗,史密斯.发展经济学[M].聂巧平,程晶蓉,汪小雯,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215-216.
- [12]石腾飞.城乡融合发展与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1):198-212.
- [13]陈细娣.我国农民工回流的历史发展、变动趋势及保障路径:基于2010—201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的分析[J].天津农业科学,2021,27(6):62-68.
- [14]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2):5-9.
- [15]章元,高汉.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户籍与地域歧视: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5):67-74.
- [16]中国政府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EB/OL].(2024-09-13)[2024-11-0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4294.html.
- [17]靳小怡,胡钊源,顾东东.谁是“高龄”农民工: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分析[J].管理评论,2018,30(7):271-280.
- [18]杨胜利,邵盼盼.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21,42(5):42-54.
- [19]刘启超,陈安平.社会网络: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172-191.

Practice, Dilemma and Adjustment of the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Quitting" But Not 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Chen Junfeng, Wang Cu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Due to safety and other factors, many places have introduced policies to remove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tightening employment policies, many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the choice of "quitting" but not rest, which is the behavior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odern social facts. They fulfill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by changing the job market, choosing urban and rural mobility employment, etc. In this process,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strong employment demand and weak opportunities, high unemployment risk and low resistance. In this regard, the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deal with the difficulties through the decoration of employment image,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circle of friends, and the "make money + save money" employment logic and other ways, so as to realize the adjustment of the dilemma of balancing self and family interests.

Keywords: elderly migrant workers; "quitting" but not rest; employment dilemma; self-adjustment

掩饰伪装:修辞构式“有被X到”功能及其他

张云峰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修辞构式“有被X到”借客观陈述之形表达说话者对X所涉之物属性极性程度的主观评议,化熟悉为陌生,新奇别致,幽默风趣,具有掩饰伪装等话语功能。构式“有被X到”由应答图式和力图式这两种图式嵌套投射而来,由偶发、扩展而逐步定型,而“因果转喻”“遗留原则”则是其重要的理解和生成机制。

关键词:“有被X到”;修辞构式;语用功能;生成机制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8

一、引言

“被就业”“被幸福”等一波新“被”字句方兴未艾,又有一股“有被笑到”“有被酸到”等“有被X到”之风顺势而来,目前已引起学界同仁诸多关注,如段婧玮(2022)、李慧敏(2021)、毛翔(2024)、罗美君、王雪晴(2023)等人^[1-4]。关于构式“有被X到”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视角多样,颇具启发意义,但学者们对其形成过程及动因机制的挖掘不够深入具体,有些论断尚未统一,还有待商榷与完善。有鉴于此,本文将作进一步分析探讨,拟解决如下问题:(1)构式“有被X到”定位及形成过程;(2)构式“有被X到”的语用效果;(3)构式“有被X到”的生成机制。

二、“有被X到”的构式分析

一般来说,传统被动句的谓语核心多是一些强动作性的及物动词,句式基本上是用来表示不

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5],如“被打破”“被开除”等。而“被就业”“被小康”之类的新“被”字句大多使用不及物动词甚至名词,句子并不限于表示消极意义,还向中性和积极意义扩展^[6]。构式“有被X到”既不同于传统的被字句,也有异于新“被”字句,具体表现在:其一,该结构中的“X”多表示性质状态及心理活动,以动词、形容词为常;其二,结果性标记“到”的添加,强制性赋予“X”一定的动态化倾向,使其衍生出新的意义。

“有被X到”,表面上看,貌似一个肯定应答句,即在会话中对对方引发句作出确定性回应的答句^[7];但实际上,却是表达说话者对X所涉之物属性极性程度的主观评议,即“YY太Z了”。这里的“YY”指的是“X所涉之物”,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等。“Z”则指的是评议词,“Z”不具有统一性,视具体情景而定,有的可能是“X”本身,如“有被美到”就是“YY太美了”;也有的出现于前后文,如例1中的“……确实好听!有被惊艳到”,这里的“Z”指的是前文“好听”;还有的索性隐含,但由于人类普遍的认知经验并不妨碍语义的理解,只不过感叹内容会因人而异,如例2中的“……童言无忌名场面,真的有被‘孝’到”,这里的“Z”指的是对“孝”施

收稿日期:2025-08-06

基金项目:2019年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物性结构下皖北方言复合名词语义研究”(SK2019A0327);2021年安徽省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语义辐射式现代汉语教学内容体系建构——新文科背景下的现代汉语教学改革”(2021jyxm1091)

作者简介:张云峰(1972—),女,安徽阜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词汇学。

行状况某一方面达到极性程度的主观评议,可以是“太好了/太周全了/太有仪式感了”等。

例1:韩红、陈丽君合唱《沧海一声笑》确实好听!有被惊艳到!(新浪 2024-04-12)

例2:盘点那些满级大孝子,童言无忌名场面,真的有被“孝”到。(抖音 2023-08-17)

为话语表达的明晰化,该结构前后往往会出现“很/非常/太/好/真(是)”等之类的程度词。其中绝大部分是程度副词,如下面例3中的“很”;也可以是代词,如例9中的“如此”;还可以是本身具有程度义的词语,如例7中的“救命”;还可以是程度性词语间隔或连续使用,前者如例4的“真的”和“太”,后者如例6的“真的太”。

例3:听说全民K歌修音很好笑?谢谢,有被笑到。(哔哩哔哩 2020-01-27)

例4:有没有人看DD52啊,我真的有被笑到,这也太好笑了吧。(豆瓣 2020-06-16)

例5:最后有被恶心到,这个小孩太狠了。(搜狐 2021-09-09)

例6:有被笑到,这一对真的太搞笑了。(哔哩哔哩 2021-01-20)

例7:沉浸式开箱,救命!!有被高级到。(抖音 2022-06-17)

例8:这一些高温文案真的有被秀到!(知乎 2022-08-23)

例9:有被美到!车窗外的攀枝花竟如此惊艳!(搜狐 2024-04-14)

由于该结构实际表达义与字面义之间存有出入,形式和意义不具有完全预测性,符合构式的基本要求,即“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组对<Fi, Si>,且C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8],也就是说其在“形式—意义”配对时具有很强的超常错配特点。而这样的语言现象,正是传统修辞关注的对象,即字面义与实际表达义之间的超常联系,据此可视其为一个独立的修辞构式。

三、修辞构式“有被X到”的语用功能

(一)“有被X到”的语用功能

1. 掩饰功能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Searle)认为,在一定语境条件下,凡词或句子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的就是直接言语行为,反之则是间接言语行为。显然,“有被X到”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委婉语。“委婉语在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造成心理上的疏离效应,力图代替、掩饰、削减话语中的禁忌、直接和粗鄙,是在一定的言语共同体内,受制于特定的文化,为避免不便明说的意义或意图,采取婉转间接的语言手段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符号。”^[9]“有被X到”正是力图掩饰、回避话语的直接性而采用的一种迂回之术。

(1)掩饰情绪,提升优越。“有被X到”表面上是传达一种信息,告诉对方自己确实受到了影响,实则是对对方所提供之物极性程度的一种感叹,以客观冷静的陈述代替强烈的主观评议,力避情绪化,目的就是标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以此抬高自己,维护“矜持”的高冷形象。另外,由于“太X了”之类表达的高频出现,致使句式本身失去了原有的语效强度,同时于不经意间染上了“俗”字标签,代之以略含“雅”气的“有被X到”,似乎增添了一丝“文化”光环,营造出话语表达者的身份建构,无形中提升了优越感。

(2)回避主动,保留自我。“有被X到”中“有”的存在,貌似积极诚恳,但又以“被”为“面纱”极力回避自己的主动态度,这也多多少少折射出当下盛极一时的“糊弄学”文化社交。所谓“糊弄学”指的是以看起来不敷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难以推托之事^[10]。从交际行为来看,“糊弄学”本身并不代表一种消极负面的人生态度,而是对眼下大量无意义社交的聪明应对。从积极一面来看,这种做法既满足了对方希望得到回应的心情,又不失礼貌,恰好体现了年轻人对保留自我形象的一种追求。

2. 伪装功能

作为人际交往的新模式,网络社交所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个性化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异化和趣化。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互动的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交往互动的双方都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相互依存、自由结伴,从而显示为确切的交互主体性。因此,它可以超越现实社会交流互动中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随时对互动的内容、过程进行修正、调整、重组,大大方便了人际互动活动中富有新颖性行为的开展,并为网络个体将交流互

动的实践理念构想不断对象化为虚拟现实提供着可能。可见,网络个体在空间中关系的形成与凝结,都是在动态的交流互动中完成的,其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意义生成的流动性^[11]。随着“有被X到”的流行,其内容、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各种变体。以“有被笑到”为例,就有“谢谢,有被笑到”“不好意思/抱歉,有被笑到”等形式,尽管意义大致相当,在语用上却呈现诸多差异,多元互动特色鲜明,但无论如何交互,均不具有针对性,即“伪装”性。关于“有被笑到”所反映的具体互动类型,见表1。

表1 “有被笑到”变异形式及其互动类型

表达形式	话语身份	互动类型
有被笑到	客体	一般性
谢谢,有被笑到	客体	个体性
不好意思/抱歉, 有被笑到	主客体双重身份	交互性

网络空间的隔离性,一定程度上为人际交往带来很大的弹性。交际主体总会隐匿部分或全部真实世界的身份,利用网络的联结功能,与其他陌生人建立联结,在互动中探索自我认同。如“不好意思/抱歉,有被笑到”,说话者一方面以客体身份回应对方,另一方面也在以主体身份同另外的一些处于同一平台的客体进行互动,“不好意思/抱歉”就是委婉地发表个人见解,以免将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维护人际关系。

(二)“有被X到”的创新手段

构式“有被X到”寓强烈的主观感叹于客观的冷静陈述,化熟悉为陌生,新奇幽默,风趣别致。其独特的创新技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语体失衡

言语得体是语言的最高原则,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12],涉及时间、地点、对象、场合、礼貌、目的等方面。它不仅是修辞的最高原则,也是构成言语交际学的核心问题,它制约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作为得体最为重要的表现——语体适应,就是要求语言表达要和具体场合相适应,即正式场合宜采用正式语体,日常场合宜采用非正式语体。大致来说,正式语体一般讲究语法严格,用词文雅,句子较长,结构严谨;非正式语体则较为随意,用词通俗,句子简短,结构松散。就“太丑了”“有被丑到”而论,前者宜归于非正式(日常)语体;而后者略显郑重,可视为正

式语体。事实上,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去突破和颠覆某些既定规则而造成得体性偏离。从这一角度出发,得体性偏离不仅不是语用错误,反而是一种会引发奇特反响的艺术化表达,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修辞功效。正如前文所述,明明可以直接用日常用语“太Z了”,却代之以较为正式的“有被X到”,这与网络平台“自由随性”之风显然有所出入,不够契合。这种语体失衡,无形中把对方所述之事“正规化”“正式化”,小题大做,更显幽默风趣。

2.有标组配

较之高频出现的评议句“太Z了”,“有被X到”无疑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这种创新集中体现在句式和意图的有标组配上。语用象似论认为,句式象似于意图,即有什么样的意图就有什么样的句式,如阐述、承诺和宣告常与陈述句组配,指令与祈使句组配,(抒情)表达与惊叹句组配,询问与疑问句组配。其实上述组配关系是无标记的“句式—意图”匹配,是“句式—意图”象似性的典型例证;而其他情况,如疑问句表示阐述、指令等意图,是有标记的“句式—意图”组配,是“句式—意图”象似性的非典型例证。尽管语言中多呈现的是无标记的“句式—意图”匹配(简称无标组配),但有标记的“句式—意图”组配(简称有标组配)也并非罕见,如英语中的“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window for me?”就是一种以疑问表指令的有标组配,意思是“请帮我关上窗户”。汉语类似的现象也有不少,如希望某人打开窗户的指令,可以代之以陈述“屋里有点闷”。显然“有被X到”亦属于此类,是以陈述表抒情的有标组配。言语交际中,“人们以语言能力高为荣,虽然在一定的阶段语言能力高意味着发音准和语流快,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除此之外还有礼貌、有趣、简约的目的和实现它们的能力。而具有这些能力的个人不甘心老说直话、白话、俗话,而是绕弯子、曲折迂回、白话文说、俗话雅说,以达到礼貌、求异或幽默的目的”^[13]。

四、构式“有被X到”的生成

(一)构式“有被X到”与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作为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最早由莱考夫(Lakoff)、约翰逊(Johnson)于1980年提

出,“意象图式是在我们的视觉、动觉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动态构型,它为我们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14]。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人们在与客观世界互动过程中在意识中会逐渐形成一定的图式,这些图式储存在人们大脑中,是人们理解事物和进行抽象思维的认知基础。语言中构式的形成有赖于人们的图式投射。“具体说,每一个构式都是某个具体语言之中所存在的、由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在认知域中所形成的意象图式投射到语言里所形成的语义框架在该语言中所具体呈现的、表达人对客观世界某一方面认识的句法形式。换句话说,具体语言中所存在的每一个构式,都反映或体现了人对客观世界某一方面的一定认识,这种认识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在认知域中所形成的。先通过感官感知客观世界的某一个方面,其所感知在人的认知域里形成意象,再进一步抽象为意象图式,那么意象图式投射到语言,于是在一个具体语言中形成构式。”^[15]

显然构式“有被X到”也是图式投射的结果,而且不只是单一意象图式,而是涉及两种图式,即“有没有 VP?→有 VP”应答图式和“施力→受力”力图式的组合嵌套,而组合或嵌套是人自幼就开始获得的基本认知能力之一。其过程简化如下:有没有 VP→有 VP→有被 V 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 VP”由“询问事件是否发生过”的“有没有+VP”推衍而来^[16],但起初“普通话中该用法的‘有没有’并不存在一个肯定的对应式‘有’”^[17],之后由于受闽粤等南方方言的影响,肯定对应式“有+VP”逐渐形成。这是一种新生的表肯定的动词谓语句,目前已广为使用^①。

(二)“有被X到”构式发展

在具体言语交际中,最新的语言修辞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临时偶发的,一旦该方式因许多人跟随模仿、反复出现而成为一种模式固定下来,就成为语言系统中一种稳定的表达方式,即构式^[18]。修辞构式“有被X到”的形成亦不例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有被冒犯到”这一临时偶发性异化表达。以下资料来自搜狐网在2019年12月12日的报道:

12月11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视频:特朗普“变身”灭霸。视频是在美众议院公布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后发布,特朗普竞选团队也称:“众议院民主党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动他们的虚假弹劾。”对此,灭霸形象创作者斯塔林回应称:“有

被冒犯到。”

较之情绪激烈的直怒“太过分了”,“有被冒犯到”似乎显得更加理智冷静,除了用法的新颖别致外^②,还有几分傲娇可爱,因此视频一经发布便引发网民的高度关注,并迅速流行开来。伴随其广泛应用,“冒犯”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庄重性日益淡化,由“触犯、触怒”向“触碰、说中”发展,从而与“有被内涵到”“有被戳到”等形成交集,口语化、戏谑化增强,感情色彩也由负面评价向中性默认转移。如:

例10:年轻人的状态,不要太真实:有被内涵到!(爱奇艺 2020-02-13)

例11:有被冒犯到!程潇赖床样子太形象,网友:程潇不要再演我的生活了。(爱奇艺 2020-09-24)

例12:贾玲踢不到卜钰。网友:腿短的人有被内涵到!(新浪娱乐 2021-02-11)

随着该结构的广泛使用,中心成分也由动词向形容词拓展,新的句法形式出现,构式特征愈益明显。如:

例13:看耿爽手撕特朗普,有被爽到!(手机网易网 2020-03-26)

例14:虽然隔着一层口罩,但却有被治愈到。(澎湃新闻 2020-04-28)

例15:岛国柴犬表情包又火了,这次有被真实到。(哔哩哔哩 2020-07-04)

例16:有被可爱到!丁真收到鸡腿抱枕后的表情,开心得憨憨直笑。(腾讯网 2020-12-04)

与此同时,形式上也更加灵活自由,既可以省略“有”“被”,直接说成“被X到”“有X到”等,也可以变换为“被X到了”,还可以增添一些语言成分等。如:

例17:王岳伦表白李湘、王诗龄。网友:有被“至死不渝”四字笑到!(握法网 2020-08-20)

例18:惊艳!盘点各大航空公司的空乘制服,有被成功美到。(手机搜狐网 2020-08-27)

例19:哈哈哈哈哈哈哈有被自己蠢到……(哔哩哔哩 2021-01-05)

① 以“你有看(过/了)X吗”“你看(过/了)X吗”为例,我们在网上随机进行了检索,前者出现频次为78,后者出现频次为67,两者差异不大。

② “冒犯”指的是“因为言语或行动没有礼貌而冲撞得罪了对方”,多是谦辞,在汉语中一般用于做错事一方或地位低下一方,而作为被“冒犯”的一方,是不会主动说出来的。

例 20:被美团春节广告《有事您说话》高级到了。(知乎 2022-02-09)

例 21:有爽到,谢谢。(哔哩哔哩 2023-04-29)

例 22:《浪姐 5》实力开播,36位姐姐齐聚舞台,被这波实力给秀到了!(腾讯 2024-04-20)

之后,其进一步发展,有时语义焦点已不再是该结构中的核心成分,而是向与之相关的事项转移。如:

例 23:孙弈秋项目被驳回,好惨!有被心疼到。(微博 2020-09-25)

例 24:好诗,有被爽到!(哔哩哔哩 2024-01-14)

上述例 23、例 24 中的语义焦点分别是“太惨(让人心疼)”“太好(让人爽)”,而不是结构本身所呈现的“心疼”“爽”。

由此可见,修辞构式“有被 X 到”的形成发展涉及诸多环节,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其发展脉络,见表 2。

(三)构式“有被 X 到”的生成机制

随着网络社交的日益频繁,网络空间所具有的“匿名性”“去抑制性”等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表现^[19],自由、个性之风也才得以无限扩展。如果说网络技术为“有被 X 到”的话语功能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那么“因果转喻”“遗留原则”等则是其赖以实现的语言机制。

1. 因果转喻

“有被 X 到”表面看是一种结果性论断,即“X 到(了)”,但实际的语用义则是突出导致该结果的起因,即以“结果”转喻“起因”。这里的“起因”可以广泛理解为“条件、原因、行为”等。体验哲学和 CL

认为,人类思维具有隐喻性,即用一个概念域来认识和理解另一个概念域。转喻则指在同一概念域中将其中一个部分用来喻指另一个部分或整体,或用整体代部分^[20]。因果转喻是转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大致可以分为以因代果和以果代因两种情况^[21],我们认为“有被 X 到”就属于以果代因,即用结果转指原因,如“有被帅到”转指“帅”,“有被丑到”转指“丑”。还有些结构中的“X”本身就属于因果合体,如“有被惊艳到”中的“惊艳”,是“因艳而惊”,此时语义发生偏移,指向原因“艳(美)”。有时结构中原因隐现,但借助于常识或相关背景亦不难推测。如“有被震撼到”,根据认知经验,人们一定会领悟出造成该结果状态的原因,即“事物或事件的某种性状或行为太 Z(了)”。实际上,这种因果转指现象在古汉语中就普遍存在,如《汉书·鲍宣传》中的“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其中“酸鼻”就是用来转指“伤心”这一原因的。

2. 遗留原则

“有被 X 到”之所以能起到掩饰伪装功能,是因为其虚化成分“有”“被”依然受其各自来源的影响,即语法化过程中的“保持原则”(也叫“遗留原则”)。所谓“保持原则”指的是实词虚化成语法成分以后,多少还保持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虚词的来源往往就是以这些残留的特点为线索考求出来的,残存的特点也对虚词的具体用法施加一定的限制^[22]。“有被 X 到”中的“有”源自功能性成分“有没有”,而其又直接脱胎于动词性“有没有”,受初始意义的影响,“有”“没有”“有没有”之间总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关联,一个“有”字足以激活相应的“有没有”,从而实现人际之间的交流互动。功能学派认为人类行为是一种特定环境下发

表 2 “有被 X 到”构式发展

构式发展	表现	影响因素	字面义	实际表达义	构式义
偶发	有被冒犯到	语用错配	被触怒	指责对方太过分(极量)	对 X 所涉之物属性极性程度的主观评议
		语义弱化	被说中	默认描述太形象(极量)	
结构扩展	有被+形+到	句法错配	太+形	形容词所指性状达到极量	
语用扩展	有被 X 到	焦点转移	因 Z 而 X	Z 达到极量	

注:构式发展内容繁多,参见[美]伊丽莎白·特劳戈特、[英]格雷姆·特劳斯代尔:《构式化与构式演变》,詹芳琼、郑友阶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43—49 页。

生的有意义、有目的的行为。言语行为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自然承载着说话者的目的。在特定情况下,说话者出于策略、人际关系、自身方面等考虑会有意识地选择被动句,且很多情况下不出现“施事者”。事实上,由于受到典型被动句的影响,即便不出现施事者,人们也还是觉得有施事者的存在。这种意识总是伴随着句式而存在,“中国正式的被动句是必须把主事者说出的”^[23]。“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宾语,表示主动者。”^[24]因此在汉语中由词汇语法手段“被”来表达的被动结构,无论是否有主体,其被动意义都很明显,从而使其一定程度上能“赋予叙述以更大的客观性”^[25]。

正如前文所述,“有被X到”中“被X到”既不同于典型的被动句,也与新“被”字句有着质的差异,“被”的添加或许只是一种语用技巧,是说话者为自己找的“掩饰理由”,即借“被动句”之形增强客观性,稀释主动性,以此维护自己的面子,塑造所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形象。如“有被笑到”,实际就是“太/很好笑”,但直接以这种方式表达,又感觉自己和别人一样,过于情绪化,故添一“被”字,意在说明自己的行为纯属外力使然,即网民所谓的“以高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

五、结语

修辞构式“有被X到”借客观陈述之形,表达说话者对X所涉之物属性极性程度的主观评议,化熟悉为陌生,新奇别致,幽默风趣,具有掩饰伪装等话语功能。构式“有被X到”由“有没有VP?→有VP”应答图式和“施力→受力”力图式嵌套投射而来,由偶发、扩展而逐步定型,而“因果转喻”“遗留原则”则是其重要的理解和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 [1]段婧婧.浅谈“有被X到”[J].汉字文化,2022(4):9-10.
- [2]李慧敏.构式“有+被V/A+到”探析[J].汉字文化,2021(15):16-17.
- [3]毛翔.新兴流行构式“有被X到”的形成动因[J].现代语言学,2024(4):199-205.
- [4]罗美君,王雪晴.“有被X到”结构的构式化演变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21):41-45.
- [5]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430-434.
- [6]李连伟.“被”字新用法的新特点[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70-71.
- [7]尹世超.应答句式说略[J].汉语学习,2008(2):15-22.
- [8]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4.
- [9]庚桂兰.委婉语的掩饰功能及其运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6):54.
- [10]常莹.“糊弄学”,是个什么学?[N].光明日报,2020-12-10(6).
- [11]吴满意,刘克秀,宋歌.试论网络人际互动的基本特征[J].天府新论,2012(4):99-101.
- [1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45.
- [13]侯国金.间接言语的礼貌功能质疑[J].山东外语教学,2002(4):12-13.
- [14]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14.
- [15]陆俭明.构式与意象图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6(3):105.
- [16]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6.
- [17]董秀芳.现代汉语中的助动词“有没有”[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2):1.
- [18]詹卫东.从短语到构式:构式知识库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探析[J].中文信息学报,2017,31(1):230-238.
- [19]周宗奎,刘勤学.网络心理学:行为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3):55-67.
- [20]王寅.指称论新观:命名转喻论:从摹状论、因果论到转喻论[J].外语教学,2012,33(6):1-5.
- [21]宋文辉.与因果转喻相关的句法语义现象[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2-47.
- [22]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17-24.
- [23]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124-125.
- [24]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87.
- [25]张会森.被动句的功能与使用问题[J].外语教学,1989(3):40.

Camouflage: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You (有) Bei (被) X Dao (到)"

Zhang Yunf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Abstract: The network buzzword "You (有) Bei (被) X Dao (到)", adopting the guise of objective assertion, expresse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gree of attribute polarity associated with X. It defamiliarizes the familiar through novelty, humor, and wit, while serving discourse functions such as masking or disguise. The construction "You (有) Bei (被) X Dao (到)" is formed by the nested projection of the two schemas, the response schema and the effort schema, gradually finalizing by chance and expansion. Its comprehension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s mainly include "causal metonymy" and "legacy principle".

Keywords: "You (有) Bei (被) X Dao (到)";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realization mechanism

(上接第11页)

Symbiotic Conversion of Metaphor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and Empathic Ethic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hi Zengzh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be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are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symbiotic transcoding, shifting from the decoding of cultural genes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spirit of the age.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Georg Simmel, Rollo May, and Ernst Cassire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within the human-machine symbiosis environment. It analyzes the metaphorical mind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language and myth, elucidates the role of memory as media in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reveals the unique communicative value of myth as an infinite mode of contempl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 it investig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ythological metaphors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examines the latent interconnectivity underlying the "absence of presence" in mythological narration, and reflects on the return of mythological storytelling to the human. Ultimately, the paper explicates how empathic ethics embedded in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affect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social order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ag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in this context are not only carrier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but also existential strategies for individuals to preserve authenticity of life and resist spiritual nihilism in algorithmic society. The empathic ethics they manifest are actively reshaping the social relation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Keywords: being communication; mythological narrative; empathic ethics; metaphorical mind;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论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类型

张新杰¹, 王馥芳²

(1.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构式义为“的”激活的“领属”框架中两个实体N₁的N₂之间各种互动体验关系的概念化,其语义类型受制于“领属”框架中N₁与N₂之间的3种基本互动方式:主—客互动、主—主互动和客—客互动等。因此,该结构的构式义可以范畴化为3个主要类型:施为互动领属、交互主观化领属、主观化识解领属,并进一步次范畴化为9种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众多常用及非常用的非基本义等。这些语义纵横交错构成了该结构开放且具有层级性特征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

关键词: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语义类型;原型范畴化;图式范畴化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09

“N₁的N₂”结构(“X的Y”结构的一部分)是现代汉语中使用广泛且具有复杂语义类型的一种名词性结构。近一个世纪以来,其语义类型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吕叔湘、沈家煊、姜毅宁等把该结构的语义分成一般领属关系和特殊领属关系两个大类及若干小类^[1-3];黄国营、孔令达等将其语义分为领属关系和非领属关系两个大类及若干小类^[4-5];张新杰、张伯江、方梅等将该结构的语义描述为广义领属关系和狭义领属关系两个大类及若干小类^[6-7];里格罗夫、桥本环奈、吴早生等认为,该结构的语义主要包括不可让渡领属关系和可让渡领属关系两个大类及若干小类^[8-10];兰盖克、迪克森、罗永现等则认为,其语义主要由原型领属关系和抽象领属关系两个大类及若干小类组成^[11-13]。

上述相关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1)就“N₁的N₂”结构的基本构式义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其主要表征“领属”关系;(2)“领属”本身是一个范式性概念范畴,可以依据不同的语义理论对其进行范畴化或者作进一步的概念细分。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1)语义类型的划分基本还是

囿于对“领属”关系的二元划分,难以真正概括该结构的语义复杂性;(2)相关研究在对“N₁的N₂”结构进行语义分析时未充分考虑惯用法,尤其是未运用语料库统计法对其惯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3)没有针对该结构建构一个比较完备的、具有高度整合性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

有鉴于此,笔者综合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料库统计法,在探讨“N₁的N₂”结构的类型和构式义、确定和分析其主要惯用法及其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抽象出该结构常用和非常用的基本语义类型,并构建比较完备的、具有高度整合性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以期能够对该结构的复杂语义类型做出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并为该领域研究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一、“N₁的N₂”结构的构式义

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源于人类身体与其所处

收稿日期:2025-07-20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认知体验观视角下高校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研究”(Y202351962);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强国战略视阈下台州民俗文化英译研究”(23GHY09)

作者简介:张新杰(1969—),男,河南洛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王馥芳(1969—),女,江西吉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语言学。

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过程^{[14]152}。基于构式的象征功能本质^[15-16],任何构式的语义形成和构建本质上都象征着人类互动体验经验的某些侧面。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作为一种名词性构式,其基本构式义本质上是对各种互动体验(领属)关系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具体而言是对“的”激活的“领属”框架中N₁与N₂两个实体之间的互动体验关系的概念化。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认知假设”及王馥芳、马俊杰等的相关研究,“N₁的N₂”结构中的N₁与N₂之间主要有3种基本互动方式:主—客互动、主—主互动和客—客互动等^[17-19]。基于这3种互动方式,该结构的基本构式义可以范畴化为3个主要类型:施为互动领属(N₁与N₂之间为主—客互动关系)、交互主观化领属(N₁与N₂之间为主—主互动关系)、主观化识解领属(N₁与N₂之间为客—客互动关系)等,并进一步次范畴化。

但是,由于“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预测性很高、构式本身的开放性很强,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能够进入该构式的N₁与N₂几乎没有任何的语义限制(N₁可以是名词、代词、数词等,N₂可以是名词、名词化的动词和形容词、代词、数词等)。这就导致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其复杂,从而使“N₁的N₂”结构的分类和语义类型异常复杂。也就是说,要基于该结构的构式义对其语义类型进一步次范畴化,我们需要先从语义视角弄清该结构的类型及其惯用法和基本语义类型。

二、“N₁的N₂”结构的类型

国内学者黎锦熙、朱德熙、赵元任等主要根据句法特征把“N₁的N₂”结构分析为名词性结构,进而将其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20-22]。这些研究的主要缺陷是过分强调该结构的句法特征,无法详细说明其不同类型的语义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语义

关系。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N₁的N₂”结构的分类提出新的理论解决方案,以期对该结构的语义类型进行再分析。我们将该结构分成3个大类和12个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小类(见表1)。

主—客互动型“N₁的N₂”结构指的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N₁依据有关法律与N₂进行主—客互动形成的名词性结构。其中,N₁对N₂(或N₂对N₁)实施了长期的控制、操纵和使役行为,因此,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施为性互动,属于强互动。该类“N₁的N₂”结构又分为3个小类:(1)“人的物(所有)”结构(如“我的衣服”);(2)“物/人的人/物(隶属)”结构(如“房子的主人”“黄继光的连队”);(3)“物的人(相关)”结构(如“书的读者”)。

主—主互动型“N₁的N₂”结构指的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N₁依据有关法律与N₂进行主—主互动形成的名词性结构。其中,N₁通过对与N₂相关的“社会关系”的长期控制和操纵行为,对其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控制和影响。同时,N₂也对N₁施加了类似的控制和影响。因此,这里的N₁和N₂之间的互动是交互主观性互动,属于中强互动,凸显两者之间的平等地位。该类“N₁的N₂”结构又分为2个小类:(1)“人的人(亲属)”结构(如“我的妻子”);(2)“人的人(相关)”结构(如“我的老师”“他的朋友”)。

客—客互动型“N₁的N₂”结构指的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N₁依据有关自然法则或不明显的法则与N₂进行客—客互动形成的名词性结构。它们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是因为概念化者把自己的体验性经验(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到自然客体N₁和N₂之上。因此,它们之间的互动是主观性互动,属于弱互动。

该类“N₁的N₂”结构又分为7个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小类。前者包括:(1)“人/物的物(含属)”结构(如“她的眼睛”);(2)“时的人/物(时属)”结构(如“去年的报纸”);(3)“处的人/物(处属)”结构(如“广场中的集会者”);(4)“物的物(隐喻)”结

表1 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主要类型

主—客互动型	主—主互动型	客—客互动型
人的物(所有)	人的人(亲属)	人/物的物(含属),时的人/物(时属)
物/人的人/物(隶属)	人的人(相关)	处的人/物(处属),物的物(隐喻),人的物(内容)
物的人(相关)		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

构(如“铁的纪律”);(5)“人的物(内容)”结构(如“(关于)母亲的回忆”);(6)“物的物(质料)”结构(如“木头的桌子”);(7)“数的人/物(数量)”结构(如“三斤的肉”)。后者数量众多,如“百度的地图(同一)”“中国的‘中’(举例)”等等,但是因为不常用,在表1中没有标出。

综上所述,我们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把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分成3个大类和12个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小类(见表1)。这些类型,尤其是其中的12个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小类清晰反映了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的基本构式义: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 N_1 和 N_2 之间的互动体验关系。这对我们确定该结构的惯用法类型,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语义类型和语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N_1 的 N_2 ”结构的惯用法 及其基本语义类型

(一)“ N_1 的 N_2 ”结构的惯用法统计分析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把这12个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 N_1 的 N_2 ”结构看作该结构的12种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用法,因为词汇的用法和语义是密切相关的^[23-24]。至于这些用法是否该结构的惯用法,需要通过语料库对比统计分析来确定。

笔者通过“中国汉英平行语料大世界语料库”和“中国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并采用模糊匹配和“关键词附词性+‘的’+关键词附词性”的检索方法,对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的12个常用及众多非常用的小类在有关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发现,“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亲属)”“人的人(相关)”“物的人(相关)”“处的人/物(处属)”“时的人/物(时属)”“物/人的人/物(隶属)”“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等10种结构的使用比较频繁,而“物的物(隐喻)”“人的物(内容)”2种结构的使用不太频繁。同时,我们还检索到了其他众多使用较少的“ N_1 的 N_2 ”结构,如“时的人/物(同一)”“物的物(举例)”“物的物(内容)”等等。

笔者把使用频繁的10种“ N_1 的 N_2 ”结构看作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的10种惯用法,但为了更加全面地对这10种惯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笔者把使用不太频繁的“物的物(隐喻)”“人的物(内容)”2种“ N_1 的 N_2 ”结构,以及其他众多使用较少的“ N_1 的 N_2 ”结构统一看作该结构的1种惯用法“其他”。因为虽然这些结构的使用频率普遍较低,但是它们综合在一起的使用频率较高,可以达到或超过前10种结构中某一种或多种结构的使用频率。同时,因为使用比较频繁的“人的人(相关)”和“物的人(相关)”2种结构均蕴含“相关关系”,所以把它们整合为1种惯用法“人/物的人(相关)”。因此,笔者把“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亲属)”“人/物的人(相关)”“处的人/物(处属)”“时的人/物(时属)”“物/人的人/物(隶属)”“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其他”等看作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的10种惯用法(见表2)。

鉴于语料库“不完全代表性”的局限性^[25],笔者对这10种惯用法在有关文献中的分布数量和占比进一步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并取得了它们的最终平均占比,以便更加客观地反映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如表2所示,它们在有关文献中分布数量的最终占比平均值分别为34.47%、18.13%、13.77%、7.99%、9.35%、9.79%、3.55%、0.38%、1.62%和0.95%。

从平均水平看,“ N_1 的 N_2 ”结构的10种惯用法的占比平均值为10%。如表2所示,明显高于该平均值的有“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亲属)”等3种惯用法。它们的最终占比分别为34.47%、18.13%和13.77%,分别是该结构10种惯用法占比平均值(10%)的3.45倍、1.81倍和1.38倍。其余7种惯用法的最终占比都低于10种惯用法占比平均值(10%),尤其是其中的“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其他”等3种惯用法的最终占比都远低于该平均值。

因此,“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亲属)”3种惯用法的使用频率在“ N_1 的 N_2 ”结构的10种惯用法中占有显著优势。根据原型范畴理论^[26-27],当一个范畴的一个或几个成员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其他成员时,它们就获得了该范畴成员中的原型地位。因此,笔者把“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亲属)”3种惯用法看作“ N_1 的 N_2 ”结构的原型惯用法。同时,它们在原型性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人的物(所有)”惯用法的原型性最高,其次为“人物的物(含属)”惯用法,再次为“人的(亲属)”惯用法。

表2 “N₁的N₂”结构10种惯用法在有关文献中的分布数量和占比统计

类别	作品名称						总计	
	《京华烟云》		《毛泽东选集》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等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数量/个	比例/%
人的物(所有)	2 182	33.40	4 514	38.23	63 686	34.27	70 382	34.47
人/物的物(含属)	1 111	17.01	2 140	18.14	33 765	18.17	37 016	18.13
人的人(亲属)	915	14.01	38	0.32	27 152	14.61	28 105	13.77
人/物的人(相关)	556	8.52	470	3.98	15 287	8.23	16 313	7.99
处的人/物(处属)	1 007	15.42	1 629	13.81	16 457	8.85	19 093	9.35
时的人/物(时属)	456	6.98	1 808	15.32	17 741	9.55	20 005	9.79
物/人的人/物(隶属)	52	0.79	673	5.76	6 531	3.51	7 256	3.55
物的物(质料)	70	1.07	2	0.02	699	0.38	771	0.38
数的人/物(数量)	95	1.45	220	1.86	2 998	1.61	3 313	1.62
其他	88	1.35	301	2.56	1 526	0.82	1 915	0.95
惯用法总类	6 532	100.00	11 795	100.00	185 842	100.00	204 169	100.00

(亲属)”惯用法。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笔者把“人的物(所有)”看成是“N₁的N₂”结构的原型惯用法;把“人/物的物(含属)”和“人的人(亲属)”看成是次原型惯用法;把“人/物的人(相关)”“处的人/物(处属)”“时的人/物(时属)”“物/人的人/物(隶属)”“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看成是非原型惯用法;把“其他”中的众多用法看成是非原型惯用法中的边缘用法。

(二)“N₁的N₂”结构的基本语义类型

意象图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身体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较为简单的结构”^[28],是我们与周围环境互动并对其进行观察而形成的相对抽象的概念表征^{[14]152},也是我们对环境感知并与其互动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动态模型。这些模型赋予了我们体验以连贯性和结构性^{[29]301}。它们是从前概念身体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图式和想象概念,其功能是帮助构建更为复杂的概念,并为系统性(隐喻性)地延伸到更为抽象的概念和概念域提供结构^[30]。

意象图式理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有关词汇概念的本质具有重要作用^{[29]301}。我们可以运用该理论,结合前文对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惯用法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得到该结构的基本语义类型。

理由有三:(1)图式本质上是对有关词汇概念共性的概括化和抽象化^[31]。(2)语言结构的使用频率与其语义原型性直接相关:使用频率最高的用法,往往代表原型语义。以此类推,使用频率最低的用法,往往代表非原型语义中的边缘语义。(3)语言结构语义范畴中的基本层次成员(基本义)是其成员中最早出现、最常用,而且是最容易表达和习得的,与这些基本层次成员(基本义)密切相关的是有关语言结构的惯用法。我们所得到的“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是从该结构的惯用法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是其基本义。

根据意象图式理论,以及对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惯用法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笔者从“人的物(所有)”“人/物的物(含属)”“人的人(亲属)”“人/物的人(相关)”“处的人/物(处属)”“时的人/物(时属)”“物/人的人/物(隶属)”“物的物(质料)”“数的人/物(数量)”9种惯用法中分别抽象出了该结构9种常用的基本义:“所有”“含属”“亲属”“相关”“处属”“时属”“隶属”“质料”“数量”等;从“其他”抽象出的是该结构的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内容”“举例”“同一”等。

依据使用频率的高低(见表2),笔者把与“N₁的N₂”结构3种原型惯用法对应的3种语义“所有”“含属”“亲属”等看成是该结构的3种原型基本义。

其中,“所有”为该结构的原型基本义,“含属”和“亲属”为该结构的次原型基本义。笔者把与该结构6种非原型惯用法对应的6种语义“相关”“处属”“时属”“隶属”“质料”“数量”看成是该结构的6种非原型基本义,把与“其他”用法对应的众多语义(“内容”“举例”“同一”等)看作该结构非原型基本义的边缘语义。

如前所述,现代汉语“ N_1 的 N_2 ”结构的惯用法是在该结构构式义的基础上通过语料库统计分析而确定的,反映了该结构3个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互动关系: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 N_1 和 N_2 之间的互动体验关系。因此,从这些惯用法中抽象出来的9种常用的基本义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也具有互动体验特征,属于该结构构式义的3个次范畴:施为互动领属、交互主观化领属、主观化识解领属。

1.“所有”和“隶属”属于“施为互动领属”。有关“ N_1 的 N_2 ”结构中的 N_1 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有关法律对 N_2 施加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或 N_2 对 N_1 施加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因此,“所有”和“隶属”2种基本义蕴含的互动是施为互动,属强互动。

例如,在“ N_1 的 N_2 ”结构“小李的衣服(所有)”中, N_1 (小李)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物权法对 N_2 (衣服)施加了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因此 N_1 (小李)与 N_2 (衣服)之间的“所有关系”是施为互动领属,两者之间的互动属强互动。在“ N_1 的 N_2 ”结构“杯子的主人(隶属)”中, N_1 (杯子)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物权法隶属于 N_2 (主人),后者对前者施加了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属强互动。

2.“亲属”和“相关”属于“交互主观化领属”。有关“ N_1 的 N_2 ”结构中的 N_1 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有关法律对 N_2 相关的某种社会关系实施了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通过概念隐喻和转喻)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从而对 N_2 施加某种控制和影响。同时, N_2 也以类似的方式对 N_1 施加某种控制和影响。因此,“亲属”和“相关”两种基本义蕴含的互动是交互主观化互动,凸显 N_1 和 N_2 之间的平等地位,属中强互动。

例如,在“ N_1 的 N_2 ”结构“她的丈夫(亲属)”中,

N_1 (她)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婚姻法对 N_2 (丈夫)相关的夫妻关系实施了长期的控制和所有权行为,并(通过概念隐喻和转喻)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从而对 N_2 (丈夫)施加某种控制和影响。同时,后者也以类似的方式对前者施加某种控制和影响。因此, N_1 (她)和 N_2 (丈夫)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交互主观化领属”,凸显双方的平等地位,两者之间的互动属中强互动。

与此类似,在“ N_1 的 N_2 ”结构“他的老师(相关)”中, N_1 (他)和 N_2 (老师)依据教育法互相向对方施加了某种控制和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凸显双方的平等地位,也属中强互动。

3.“含属”“处属”“时属”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有关“ N_1 的 N_2 ”结构中的 N_1 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某种自然法则对 N_2 实施了长期的控制和影响,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但是, N_1 和 N_2 之间没有明显的互动体验关系,它们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是因为概念化者把自己的体验性经验(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到自然客体 N_1 和 N_2 之上。因此,“含属”“处属”和“时属”3种基本义蕴含的互动是主观化识解互动,属弱互动。

例如,在“ N_1 的 N_2 ”结构“桌子的腿(含属)”中, N_1 (桌子)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整体法则^[32]对 N_2 (腿)实施了长期的控制和影响,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实际上, N_1 (桌子)和 N_2 (腿)之间是自然的整体-部分关系,两者没有进行明显的互动体验行为。它们之间的互动体验源于概念化者的体验性经验投射,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因此, N_1 (桌子)和 N_2 (腿)之间的“含属关系”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两者之间的互动属弱互动。

在“ N_1 的 N_2 ”结构“去年的报纸(时属)”中, N_1 (去年)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基于时空动力量法则^[33]对 N_2 (报纸)实施了长期的控制和影响,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实际上, N_1 (去年)和 N_2 (报纸)之间是自然的时间关系,也没有进行明显的互动体验行为。它们之间的互动体验也是源于概念化者的体验性经验投射,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因此, N_1 (去年)和 N_2 (报纸)之间的“时属关系”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属弱互动。

以此类推,“ N_1 的 N_2 ”结构“操场中的运动员(处属)”中的 N_1 (操场中)和 N_2 (运动员)之间的互

动体验也是源于概念化者的体验性经验投射,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因此,它们之间的“处属关系”也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属弱互动。

4.“质料”“数量”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都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相关“N₁的N₂”结构中的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比“含属”“处属”“时属”等3种基本义相关的“N₁的N₂”结构中的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更弱,因为这里的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基础非常模糊。它们既不像“所有”“隶属”“亲属”“相关”等4种基本义相关的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那样,具有高权威性的法律作为基础;也不像“含属”“处属”“时属”等3种基本义相关的N₁与N₂之间的互动那样,具有权威性较低的自然法则作为基础。因此,这些语义为“N₁的N₂”结构基本义中的边缘语义。

例如,在“N₁的N₂”结构“木头的房子(质料)”中,N₁(木头)是N₂(房子)结构的材料,依附于后者,很难对后者施加明显的控制和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基础非常模糊。它们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概念化者将自己的体验性经验(即主观性心理)投射到自然客体N₁(木头)和N₂(房子)之上。因此,N₁(木头)和N₂(房子)之间的“质料关系”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两者之间的互动属弱互动。

以此类推,“N₁的N₂”结构“三斤的肉(数量)”“雷锋的故事(内容)”“二米的三米(成数)”“百度的地图(同一)”“中国的‘中’(举例)”等相关众多

非常用基本义都属于“主观化识解领属”。N₁和N₂之间的互动都属弱互动。

四、“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

根据认知语法,复杂范畴可以描述为一个图式网络结构,其形成过程是一个范畴化过程^{[34]174}。该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横向维度的原型范畴化(categorization by prototype)过程和纵向维度的图式范畴化(categorization by schema)过程。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包括1种基本构式义和3种次构式义、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是一个复杂范畴。因此,该结构的语义可以描述为一个图式网络结构。

笔者根据认知语法的范畴化模型^{[34]127},构建了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见图1),以期能够全面理清该结构的复杂语义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图1中的纵向和横向分别代表相关语义之间的纵向维度的图式范畴化关系和横向维度的原型范畴化关系。

该结构的语义图式网络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范畴化过程。该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横向维度的原型范畴化过程和纵向维度的图式范畴化过程。同时,该过程还发生在多个层次上,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层次上的基本层次范畴化(见图1)。它是“N₁的N₂”结构语义范畴化的开端,因为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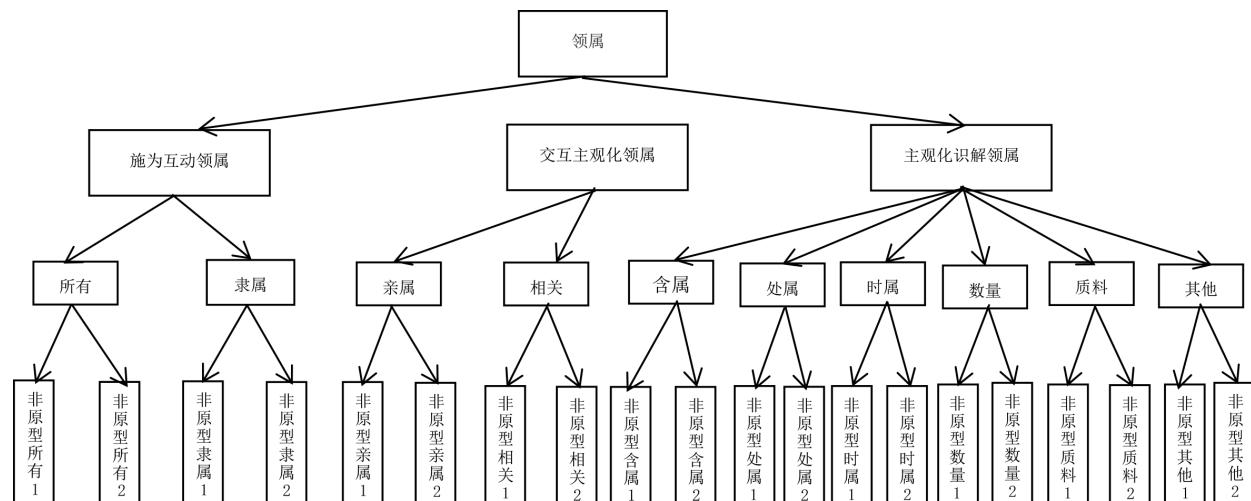


图1 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

层次上的范畴成员是最早形成,而且是最常用和最容易习得的^{[26]27-28}。第三层次上的横向维度原型范畴化以原型基本义“所有”为起点向外不断延伸,依次形成了2种次原型基本义“含属”和“亲属”、6种常用的非原型基本义“相关”“处属”“附属”“隶属”“质料”“数量”,以及众多非常用的基本语义“其他(同一、举例、内容)”等。

与基本层次上的原型范畴化同时展开的还有以这9种常用基本义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为基础的纵向维度的图式范畴化。该范畴化向上不断发展,先后分别从第三层次上的3种原型基本义、6种常用非原型基本义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中抽象出了第二层次上的3种次高层构式义“施为互动领属”“交互主观化领属”和“主观化识解领属”,并进一步从第二层次上的3种次高层构式义中抽象出了第一层次上的高层构式义“领属”。

同时,图式范畴化还以第三层次上的3种原型基本义、6种常用非原型基本义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为基础向下发展形成了第四层次上的众多常用的非基本义“非原型所有1”“非原型所有2”“非原型隶属1”“非原型隶属2”,以及众多非常用的非基本义“非原型其他1”“非原型其他2”等。另外,图式范畴化还以第四层次上的非基本义为基础继续向下发展形成更多层次的语义,而第三层次及其以下各层次上的原型范畴化不断向外延伸形成更多的基本义、非基本义,等等。因此,一个开放的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就得以形成(见图1)。

图1说明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复杂语义的形成是一个以原型基本义“所有”为起点,并开始于基本层次的多层次范畴化过程。该过程通过原型范畴化和图式范畴化两种方式,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同时展开,形成一个包括1种高层构式义、3种次高层构式义、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基本义、众多常用和非常用的非基本义,且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特征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该模型详细阐释了“N₁的N₂”结构复杂语义类型之间的关系:纵向的图式范畴化关系和横向的原型范畴化关系。

首先,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复杂语义类型之间的纵向图式范畴化关系指的是该结构复杂语义类型之间的图式—例示关系和阐释关系,凸显的是这些语义之间的层级性特征。位于顶层的

高层构式义“领属”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从该结构的3种次高层构式义、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众多常用和非常用的非基本义中抽象出来的,代表着这些语义的共性特征,而且对它们的形成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允准和限制作用。也就是说,从基本层次(第三层次)向上,“N₁的N₂”结构语义范畴的抽象性次第增强;从基本层次向下,该结构语义范畴的具体性次第增强。

其次,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复杂语义类型之间的横向原型范畴化关系指的是该结构复杂语义类型之间的原型与非原型关系,凸显的是原型语义到非原型语义的延伸性特征。图1中第二层次上的“施为互动领属”与“交互主观化领属”和“主观化识解领属”之间、第三层次上的原型基本义“所有”与2种次原型基本义和6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之间都是原型与非原型关系。第四层次上的众多常用和非常用的非基本义之间,以及该层次上第一个语义“非原型所有1”与后面众多非基本义之间都是原型与非原型关系。

因此,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的复杂语义类型中存在多个原型,其中第三层次上的基本义“所有”是该结构最重要的原型语义。它是我们经验中最早出现的,也是该结构使用最频繁的语义类型,而且是其他众多语义形成的基础。因为原型语义在我们语言使用中习得最早,对我们来说具有极高的认知突显度和心理固化程度,而且在一般语境下最容易被激活^{[34]130}。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指的就是表达该语义类型的“N₁的N₂”结构。它表示“N₂(物)”是“N₁(人)”在“的”激活的领属认知框架下通过施为互动体验获得的所有物。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语义类型中其他原型均为局部典型,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语法知识网络中的图式性和典型性都不是绝对的,对于每一个语义延伸实例来说,我们都可以识别出一个局部图式和典型^{[34]170}。

结 论

一个词语,不管其使用频率高低,几乎总是多义的:其各种语义尽管规约化程度不同,但都

密切联系;其中有些为原型或非原型语义,有些为图式义(即构式义),这些语义通过范畴化关系互相联系构成该词语开放且具有层级性特征的语义图式网络结构^[35]。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是多义的,笔者通过对该结构语义图式网络模型的建构发现,该结构主要有1种高层构式义、3种次高层构式义、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众多常用和非常用的非基本义等。其中的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是现代汉语“N₁的N₂”结构复杂语义范畴中最重要的成员,是其他语义形成的基础。因此,该结构语义相关问题的研究应该从探讨这9种常用和众多非常用的基本义入手。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1.
- [2] 沈家煊,王冬梅.“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J].世界汉语教学,2000(4):25-32.
- [3] 姜毅宁,陈振宇.名词性领属结构的蕴含关系考察[J].汉语学习,2022(1):27-36.
- [4] 黄国营.“的”字的句法、语言义功能[J].语言研究,1982(1):101-129.
- [5] 孔令达.“名₁的+名₂”结构中心名词省略的语义规则[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0(1):103-107.
- [6] 张新杰.现代汉语“的”字结构研究综述[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2(4):50-52.
- [7] 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78.
- [8] RYGAЛОFF A. Le syntagme nominal complexe, la fonction de de, et les valeurs de you[J]. Inga-Lill, 1971(6):145-156.
- [9] HASHIMOTO A.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J]. Princeton Chinese Linguistic Project, 1971(8):1-154.
- [10] 吴早生.领属关系研究的方法与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3):134-139.
- [11] LANGACKER R W.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338.
- [12] DIXON R M W.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grammatical topics: Vol.2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276.
- [13] LUO Y X.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C]// AIKHENVALD A Y, DIXON R M W.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6-207.
- [14] EVANS V.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5]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49.
- [16]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2-203.
- [17] JOHNSON M, LAKOFF G.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3): 245-263.
- [18] 王馥芳.主观化理论:关于理论根源、地位和挑战的思考[J].外国语,2017(5):43-50.
- [19] 马俊杰,王馥芳.“花儿”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兼论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向度及其理论根源[J].外语学刊,2018(5):40-46.
- [20]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83-85.
- [21]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2.
- [22] 赵元任.赵元任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67.
- [23]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Translated by ANSCOMBE G 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53:168.
- [24] MARTI G. Use theories of meaning [C]// BROWN K, ANDERSON A, BAUER L, et 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10. Oxford: Pergamon Press, 2006: 276-278.
- [25] HUNSTON S.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 [26] ROSCH E.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C]// LLOYD B, ROSCH E.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NJ: Erlbaum, 1978: 27-48.
- [27]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2-207.
- [28]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475.
- [29]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0] LANGACKER R W.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6.
- [3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5.
- [32] HAWKING S.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M]. New York/ London: Bantam Books, 1988:178.
- [33] STOCKWELL P. Schema theory: stylistic applications [C]// BROWN K, ANDERSON A, BAUER L, et 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8. Oxford: Pergamon Press, 2006: 8-11.
- [34]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5] LANGACKER R W. 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37.

从英语名词的汉译看英汉的时空差异性

——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为例

李国宏, 余玥莹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英汉两种语言在很多维度存在时空差异性。通过对英语名词的汉译可以进一步管窥这一差异性表现。在汉译英语名词的过程中,汉语会通过添加类词缀的方式来显化汉语的空间性特征,而英语名词从词源上表明其动性更强,是一个更具时间性的语言。从英语名词的汉译可以清晰地看出英汉的时空差异性,进一步佐证了英汉两种语言在时空编码上的差异。

关键词:类词缀;名词;词源;时空差异性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10

一、引言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根本维度。不同语言在意义潜势的编码上是偏向于时间,还是偏向于空间,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王文斌首次指出,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并据此提出了英汉语的“时空分立”观^[1]。刘正光等从汉语的文化渊源到汉字的构造,再到汉语的语法系统各层次,提出了汉语“时空同态”的假设,认为英语时空分立,而汉语时空同态^[2-4]。但近些年来,王文斌等从语法、英汉名动关系、离合词成因、汉英词构、汉语流水句、英汉否定表征以及汉英句子对比分析等不同角度论述了英汉的时空差异性,系统阐释了“时空分立”观^[5-11]。王文斌等进一步指出,虽然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但这既不意味着英语绝对没有空间性、汉语绝对没有时间性,也不是说英、汉都是时间性和空间性各占一半;相反,时空分立是相对的,即英语相对更加偏爱时间性思维,而汉语更加偏爱

空间性思维^{[12],[13]xix}。

基于此,本文将在“时空分立”观的基础上,以英语名词的汉译类词缀为研究对象,对《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进行语料检索,统计分析英语名词在汉译后的词缀添加情况,以及相关的类词缀和词源特征,进一步阐释英语的强时间性和汉语的强空间性,为“时空分立”观提供新的佐证维度。

二、类词缀的空间性

最早关注到汉语“类词缀”这一现象的是瞿秋白。他称“资本家”里的“家”和“民族主义”里的“主义”为“新式的字尾”,“非资本主义”里的“非”为“新式的字头”^[14]。吕叔湘于1979年将这类词汇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并指出:“汉语中地道的语缀为数不多,但存在许多词素,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前缀或后缀,然而却略有不足,只能被称作类前缀和类后缀。之所以在这些词素前加上‘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尚未完

收稿日期:2025-07-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主观化‘左移’现象研究”(17XYY019)

作者简介:李国宏(1978—),男,陕西西安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余玥莹(1999—),女,江西景德镇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全虚化,有时仍保留词根的形态。这种类前缀和类后缀的存在,可谓是中国语缀的一大独特之处。”^[15]可见,词缀化现象的产生是汉民族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及交际需要而实施的一种语言修正策略。新事物大量涌现,原有词汇已不能满足描写新事物的需求,于是实词参与构词过程并逐渐词缀化^[16]。

汉语类词缀具有使汉语词汇空间性增强的特质。沈家煊指出,汉语是一个名词性的语言,动词也是名词的一个次类,而且在构词上汉语词汇以复合词为主,所谓的词缀其实也是独立词,具有完整的词法和语法功能^[17-18]。从这一观点来看,汉语的类词缀本质上是对“词根”概念的整体性“打包”,突显空间性,抑制时间性。例如,“获得感”中,“获得”为动词,具有时间性。对“获得”概念的理解需要依托这一过程的执行者、执行方式、执行结果等一系列的其他因素,这也是Langacker所说的“名词具有概念独立性,动词具有概念依存性”^{[19]14}。但是,类词缀“感”的添加改变了“获得”的动性,使其更加突显了“获得者”的最终体验,空间性增强。

类词缀的强空间性也得到了一些个案研究的支持。杨爱姣指出,汉语“里”词缀化的过程伴随着搭配成分的空间感渐强和词义的渐虚,并最终由指向实物的平面概念演变为指向空间的方位词^[20]。赵芳也指出,汉语词缀不是强制性的,位置比较灵活,有些甚至可以单独使用,体现了汉语词汇在空间上的离散性^[21]。因此,汉语的构词本质上是句法结构的浓缩^[22]。只是在浓缩的过程中,句法的时间性受到抑制,而新构成的词汇空间性得以突显。

三、语料收集与分析

通过对《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近乎穷尽的人工检索,我们共得到496个符合“词根+类词缀”汉译结构的英语名词。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23],同一词汇在不同语境里可能产生不同的词性解读。基于这一现状,我们以词典中给出的词根的词性为基准,筛选出可以追溯至其词根词性且仅具有单一词性的名词。这类词共有347个,占总数的70.0%。将它们根据“词根词性+类词缀”的方式分为三类:“动词+类词缀”(如abrasion:磨

损处,absorbance:吸光度)、“形容词+类词缀”(如accuracy:准确性,credibility:可靠性)和“名词+类词缀”(如diversity:差异性,infancy:婴儿期)。经过语料统计,“动词+类词缀”结构共有193个,占总数的38.9%;“形容词+类词缀”结构共有103个,占总数的20.8%;“名词+类词缀”结构共有51个,占总数的10.3%。这样的占比,说明动词的时间性强,汉语强烈地要求对其进行词缀化,以提升其空间性;名词的空间性强,添加词缀的需求不那么高。具体分析如下。

(一)动词+类词缀

“动词+类词缀”结构的词往往通过类词缀将整个词汇的词性彻底改变,同时增强整个词汇的空间特性。如:

(1) a. His first music teacher was a major influence in his life.

他的第一位音乐老师是他一生中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人。

b. She could probably exert her influence with the manager and get you a job.

她很有可能对经理施展她的影响力,给你弄份工作。

英语名词“influence”在常态下译为“影响”,通常当动词理解,如例(1)a。该“影响”描述的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动态过程,这种影响可能还在持续性进行,因此时间性较强。在例(1)a中,该“影响”由音乐老师发出,在一生的时间范围内传递到他身上,强调了时间的连续性和过程的动态性。例(1)b通过添加类词缀“力”后,改变了原来动词性“影响”在时间维度的特性,新形成的词语“影响力”描述的是一种能力或状态,“影响”原有的时间维度的特性受到抑制,继而凸显的是整个“影响”过程的整体性。在例(1)b中,“影响力”由她发出,经传递到经理身上,体现了由时间维度到整体状态的转变,即实现了从顺序扫描到整体扫描的转变^{[19]21}。沈欣怡等指出,一些“X力”虽然不能直接测量,但也是比较具象化的,也有一定的计量形式,空间感较强^{[24]127}。本质上而言,例(1)b的汉译使用“影响”也可以,因为“影响”也可以当名词使用,但语感强烈地要求添加类词缀“力”,这体现了汉民族较强的空间性思维。如:

(2)a. high fluid intake 高流质摄取量

b. The cold winter has led to a large-than-

expected drawdown on oil stocks.

寒冬使石油储备消耗量高出预期。

汉语中的量词和量化结构可以用来限定名词所指代事物的范围或规模,如例(2)a和例(2)b均是通过添加类词缀“量”来量化名词所指代事物的范围或规模。具体的事物都具有空间性,而“量”能够反映出这些空间性的大小和数量等特征。这种限定范围的方式也体现了汉语的强空间性,通过对范围的描述来界定事物的空间范围和边界,体现了汉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如:

- (3)a. visibility: 可见度;能见度;能见距离
- b. good/poor/bad/zero visibility 高/低/差/为零能见度

例(3)a中,“可见”表示能够被观察到,是一个描述视觉感知的词语。而“度”此时作为量词,用来衡量“可见”的程度或水平,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或度量,而且与观察者的感知和体验紧密相连。“可见度”通常用于描述在特定条件下(如光线、距离、障碍物等)某物被观察或识别的难易程度,这里的“度”隐含了空间的概念,因为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之间的距离和空间关系直接影响到可见的程度。正如例(3)b通过添加类词缀“度”,使得词语可以用“高/低/差”等程度形容词修饰,汉语中经常使用空间性的词语和表达来描述事物的状态或特征,例如“高”“低”“远”“近”等词语都与空间关系紧密相关,体现了汉语的空间性。

在汉语中,“力”“量”“度”等类词缀的应用体现了汉语空间化的语言特征。“力”作为类词缀出现时,使原本静态的词语变得具有动态性和内在驱动力;“量”作为类词缀出现时,使得我们能够对事物的多少、大小、轻重等属性进行精准的描述和比较;“度”作为类词缀出现时,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状态和程度。这些词缀的使用不仅增强了词语的表达能力,而且赋予了词语更为丰富的空间维度。它们通过拓展词语的语义范畴,使语言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物质世界的空间属性。

(二)形容词+类词缀

“形容词+类词缀”结构的词共有103个,占总数的20.8%。如:

- (4) a. I can't stand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humour.

我无法忍受毫无幽默感的人。

- b. intellectual snobbery

智力上的自我优越感

例(4)a和例(4)b通过添加类词缀“感”使词语能够更加有效地传达个体在空间环境中的情感体验与感知反应。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人类重要的概念范畴之一,情感也毫无例外地由空间概念架构而成,使得人类赋予了情感状态以空间方位的意象特征^[25]。比如,“幸福感”不仅仅是指幸福的程度,还强调了人们在空间中所感受到的幸福体验,这样可以使得词语更具有情感、感知和体验的特点,从而凸显汉语的强空间性。如:

- (5) a. I was astonished by the size and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涉及面之广使我感到惊讶。

- b. S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good teamwork.

她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 c.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two ideas

这两种想法的相对重要性

例(5)a中“复杂性”更多地体现了系统在空间上的深层次结构和动态变化,在句子中通过使用“复杂性”和“涉及面之广”,不仅表达了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还强调了其涉及范围的广泛性。汉文化注重整体性思维和具象思维,汉语中常常使用具象化的类词缀来描述抽象的概念,如“性”“化”等,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抽象概念在汉语中变得更加具体、可感。我们可以使用如“较高”“较低”等程度词对抽象概念加以量化,以凸显该名词的空间性。如例(5)b和例(5)c在句子中都将“importance”翻译为“重要性”。“~性”表示的是事物本身的特征,语义上的类化使得“性”逐渐成为名词或区别词的标志,而到了现在,“性”作为类词缀也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和构词频率^{[26][38]},通过增加类词缀“性”以凸显汉语的强空间性特征。

在汉语中,“感”“性”等类词缀的运用体现了汉语空间化的特性。“感”作为类词缀出现时,能够将内心的情感体验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将抽象的感知转化为具体的空间形象;而“性”作为类词缀出现时,能够定义和限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为事物提供空间化的分类和描述。这些词缀在构成新词时,不仅丰富了词语的情感色彩,还赋予了词语更为深层的空间感知。

(三)名词+类词缀

“名词+类词缀”结构的词共有51个,占总数的

10.3%,占比最低。如:

(6)a. Reading will increase your vocabulary.

阅读会增加你的词汇量。

b. to have a wide/limited vocabulary

词汇量大/有限

例(6)a和例(6)b将“vocabulary”译为“词汇量”。“vocabulary”作为名词时可译为“词汇”,若译为“阅读会增加你的词汇”显然不符合汉民族的表达方式。而通过量化后,“vocabulary”具有了一个空间化的范围,表达会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汉语的空间性。该空间量可以受空间性较强的性状成分修饰,如例(6)b使用“大/有限”等修饰尺寸、规模等量性成分对其进行空间框定。量词的典型作用就是提供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数量或其他感知性特性,尤为明显的是,量词性语言注重于物体的形状及其离散性^[27]。这也看出汉语为更具空间性的语言。如:

(7) a. She showed a lack of judgement when she gave Mark the job.

她把这工作交给马克表明她缺乏判断力。

b. good/poor judgement

判断力强/弱

例(7)a中“判断力”指代一个人或个体作出判断的能力或水平,更注重于个体的认知能力或水平,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呈现出来,凸显了汉语的强空间性。“力”作为类词缀,意义发生虚化,着重凸显“程度”与“量化”的语义特征^{[24][28]}。例(7)b通过给本就为名词的“判断”增添一个类词缀“力”后将这个名词量化,变成一个可以被“强/弱”等描述程度性的词语所修饰的、更符合中国人思维的、具有显性空间性的词语。可见,汉语偏向从三维空间来刻画事物,而英语偏好从单一维度来认知客观世界。这是汉民族注重整体思维,而英民族注重个体思维的体现。然而,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汉民族的空间思维偏向和英民族的时间思维偏好使然^{[13][45]}。

在汉语中,“量”“力”等类词缀的应用体现了汉语的空间性特质。这些类词缀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意层次,更赋予了词汇空间维度的概念。“量”作为类词缀出现时,常用于描述事物的规模、程度和范围,为抽象概念提供了具体的空间参照;而“力”则更多地体现了事物的动态性和内在驱动力,使得语言能够更生动地描述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趋势。这些空间化的表达方式,

不仅增强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也更符合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四、英汉词汇和时空差异

(一)汉语的强空间性

通过对这496个符合“词根+类词缀”构词方式的汉译名词所使用的类词缀进行统计,发现这些类词缀主要有“层”“处”“地区”“点”“度”“范围”“感”“关系”“过程”“化”“会”“阶段”“经历”“类”“力”“量”“流量”“率”“能”“能力”“品”“期”“期间”“情况”“权”“群系”“任期”“时期”“术”“速率”“体”“物”“行为”“性”“意”“欲”“状况”“状态”“作用”等。表1为在类词缀统计中出现次数排名前八的高频类词缀的列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类词缀“化”。该类词缀看似具有“动性”,时间性较强,实则不然。沈孟璎指出,构词能力强的老词缀,词性上有分化的趋势,比如“化”作为类后缀已经有动词、形容词、名词一身三任了^[28]。张云秋用语法研究中的等级化观念来考察“化”尾动词的语法特征,提出“化”尾动词是一个语法功能由动词性功能向名词性功能方向弱化的等级序列^[29]。这都说明“化”最初具有动词性词尾功能,但随着词缀的发展,其名词性功能逐渐增强,兼具动词性词尾和名词性词尾的功能。其实,进一步的语料分析可以发现,由“化”构成的词汇除了“美、丑”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形容词+化”具有动性外,其他的合成词均无法和强时间副词“正在”进行组配,如“*正在现代化”“*正在国际化”。显然,“X化”的空间性更强。

表1 汉译名词的高频类词缀列表

类词缀	性	力	量	物	度	感	期	化
数量/个	111	69	39	31	29	22	22	18
占比/%	22.3	13.9	7.8	6.2	5.8	4.4	4.4	4.0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中涌入了许多新词语,由于现代传媒的助推与语言接触的影响,汉语的构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派生词所占比重显著增加,“汉语新词的词缀化倾向”日益明显^[30]。而空间如何在语言中表征是语言的一个基本问题,许多学者对空间表征问题进行过探讨^[31]。名词空间性强弱的语法表现,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与各名量词的组合能力上,名词加上“式、型、质”等,属性

意义空间性就由隐性转为显性^[32]。

根据表1统计后可以得知,在我们统计下的汉译名词类词缀中,使用次数最多的分别为“性”“力”“量”。在汉语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带有“性”的词语,如上文提到的“复杂性”“重要性”等,或是我们日常中经常使用的“可能性”“历史性”“弹性”等。这些词语中的“性”作为类词缀,虽然并没有直接表达空间的概念,但它们所构成的名词往往与某种特性或属性相关,而这些特性或属性往往与空间或时间等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性”的发展也逐渐由动态过程逐渐虚化成静态的状态或性质^{[26]38}。因此,虽然类词缀“性”本身并不直接体现汉语的空间性,但它所构成的词语往往与空间性相关的概念有所联系。通过考察这些词语的使用和含义,我们可以间接地理解汉语的空间性特点。

而“力”作为一个类词缀,在汉语中经常用来构成表示能力、作用或影响的词语,如“影响力”“判断力”“说服力”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通常与能量、作用或影响在空间中的分布和传递相关。它们涉及客观存在的“力”,而这些“力”具有可计算的特点。量化是现代汉语表达的新趋势,为了清晰易懂,人们习惯把抽象的事物具象化,从而对其进行总结或比较。“力”的[+计量]特征满足了这一需求,不断增加的交际需求使得“X”的范围逐渐扩张,“力”作为类词缀的出现频率也随之大幅增加,最后固定为“力”的功能^{[24]128}。

同样,类词缀“量”在汉语中经常用于构成表示测量、计量或数量的词语,如“摄入量”“词汇量”“力量”“数量”等,这些词语不仅涉及对事物数量的计量,也隐含着对事物空间特征的描述。正如王文斌所言,汉语偏向于对事物的数量、大小、形状等空间性属性的思辨和表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的强空间性^{[13]178}。

类词缀“物”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引发人们对物质实体在空间中的感知和想象。“物”通常指物质实体,即占据一定空间、可以被感知到的具体存在,它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因此,当“物”作为类词缀构成词语时,往往与具体的空间位置、范围或状态相关联。类词缀“度”最早的意义指“计量长短的标准”,这一意义本身就与空间性紧密相关。而随着语言的发展,“度”的意义逐渐泛化,可以用来表示“物质有关性质所达到的程度”。而这些具有数

词义的语素,如“值”“率”“度”等的构词能力不断增强,反映出人们在表达过程中更偏向于用具体的、清晰的实例或数值等进行阐述和比喻^[33]。但无论是计量长短还是表示程度,都与空间或空间中的变化有关,都体现了汉语的强空间性。类词缀“感”形成的词语在汉语中主要通过表达个体在空间环境中的情感体验与感知感受来体现空间性,这些词语通常不仅描述物理空间的存在,还能传达与空间相关的情感和心理反应。类词缀“期”在汉语中形成的词语,常用于构成表示时间段、阶段或预定目标的词语,如“时期”“潜伏期”等,它能够反映出特定时间段内的空间场景或状态,凸显了汉语的空间性。而尽管类词缀“化”本身更多关注的是变化的过程,但它的应用在某些语境下能够体现空间的概念和空间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在描述环境、场所、布局等方面的变化时。因此,“化”通过指代过程中的转变,间接展示了空间本身的变化、形态的演进及空间感知的转换。

(二)英语的强时间性

通过使用英语在线词源网站^①,笔者对词典中符合“词根+类词缀”构词方式的496个汉译名词的词源进行检索,共追溯到160个单词的词源。统计结果显示,其中121个单词可追溯至原始印欧语的动性词根,占所检索单词总数的75.6%(见表2)。例如,abrasion原始印欧语词根的本义为to scrape, scratch, gnaw; adventure原始印欧语词根的本义为to go, come; clarity原始印欧语词根的本义为to shout(见表3)。显而易见,英语中的大部分普通名词,追溯其印欧语词源仍多数为动性词根。王文斌、刘庚曾通过统计《通用英语词表》中的英语名词发现,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词根,英语中有77.7%的普通名词的词根是动性的^[34]。这与笔者统计出的数据接近,进一步佐证了英语名词的词源为动性词根的推论。

表2 词源词性统计

词源词性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数量/个	121	7	26	6
占比/%	75.6	4.3	16.3	3.8

^① 在线英语词源词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参见<https://www.etymonline.com>。

表3 英语名词源于原始印欧语动性词根列举

英语名词	原始印欧语词根	词根本义
abrasion	*red-	to scrape, scratch, gnaw
adventure	*gwa-	to go, come
clarity	*kele-	to shout
complication	*plek-	to plait
consumption	*mer-	to rub away, harm
covering	*kel-	to cover, conceal, save
harvest	*kerp-	to gather, pluck, harvest
ingress	*ghredh-	to walk, go
junction	*yeug-	to join
prospect	*spek-	to observe

注:通常,以“*”标识原始印欧语这一构拟形式。

名词常用于描述具体的实物,而实物总是具备特定的空间属性,比如大小、长短、厚薄和形状等。动词则常用于描述行为动作,而行为动作总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过程中发生、发展和结束。故而毫无疑问,名词具有空间性,动词具有时间性^[35-37]。因此,多数英语词源来源于动性词根,也间接地反映了英语的强时间性。

汉语的后缀与英语的后缀相似,其主要的功能都是改变词性。不同的是,英语的后缀构成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各类词,而汉语的后缀构成的基本上都是名词^[38]。而对于一个普通单词而言,词根是词汇的核心部分,它承载了词汇的基本含义。在英语中,许多名词的词根与动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动性词根在转变为名词后,依然保留了其原始的动作或状态含义。动词,作为表示动作、状态或发生过程的词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它们描述的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或时间段内发生的动作。当动词转变为名词时,虽然词性发生了改变,但其所蕴含的时间性特征并未消失,而是被名词所继承,从英语语词的派生机制表现出名源于动的特征^[39]。在英译过程中,英语有意将汉语中的类词缀再次翻译出来,是因为西方人难以仅通过一个名词单词感受到其带来的空间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显化其背后中文的空间性,以使表达更能让西方人理解,体现出英语的空间性较弱。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动词在印欧语言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主导作用表明像英语这类语言更加强调时间性。

五、结语

在深入探讨英语名词翻译及其所反映的时空差异性后,我们不难发现,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背后的时空观念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语之中。Langacker和Lakoff都曾强调,不同的语言体现不同的概念系统(即思维方式)^[40-41]。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为例,我们得以窥见这种差异性的冰山一角。研究表明:英语名词的翻译往往顺乎顺应汉民族的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选择使用“词根+类词缀”的方式以凸显其强空间性,其中使用最多的类词缀为“性”“力”“量”这类能表示状态、能力、数量等的空间性词缀;而英语名词中多数词源来源于动性词根,占统计名词总数的75.6%,体现了英民族语言的强时间性。

这种时空差异性的存在,既为英汉翻译带来了挑战,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深入理解这种差异性,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英汉两种语言的精髓,提高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同时,这种差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不同文化、拓宽视野的窗口。在未来的英汉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更加注重对时空差异性的理解和把握,力求在保留原文精髓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准确、生动的翻译。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探索和创新翻译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语言环境和文化需求。

致谢:本研究得到2024年上海外教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 [1]王文斌.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45(2):163-173.
- [2]刘正光,徐皓琪.英汉时空概念化方式差异:时空分立与时空同态[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2):163-175.
- [3]刘正光,鄢克非,吕盈烟.英汉时间概念化差异对“前、后”时间指向对立的解释[J].现代外语,2018,41(5):608-620.
- [4]刘正光,李易.英汉语量词使用中的时空意义比较研究[J].现代外语,2020,43(2):147-160.
- [5]阮咏梅,王文斌.汉英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差异及其时空特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8(1):75-82.
- [6]何清强,王文斌.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英汉名动关系多视角探析[J].现代外语,2016,39(4):439-448.
- [7]何清强,王文斌.空间性特质与汉语的个性特点:从离合词的成因谈起[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39(1):2-11.
- [8]王文斌,于善志.汉英词构中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特质[J].解放

- 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9(6):1-8.
- [9]王文斌,赵朝永.论汉语流水句的句类属性[J].世界汉语教学,2017,31(2):171-180.
- [10]王文斌,张媛.英汉否定表征及其时空性民族思维特质差异[J].现代外语,2019,42(1):1-12.
- [11]王佳敏,王文斌.汉英句子时序律和空序律对比探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3):36-47.
- [12]王文斌.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 Humboldt 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J].中国外语,2013,10(3):29-36.
- [13]王文斌.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 [14]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M]//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683-693.
- [15]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52.
- [16]廖福涛,徐静.论英汉类词缀的语法化隐喻本质[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3(6):139-142.
- [17]沈家煊.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J].中国社会科学,2017(7):131-143.
- [18]沈家煊.有关思维模式的英汉差异[J].现代外语,2020,43(1):1-17.
- [19]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杨爱姣.空间感在古代汉语的“里”词缀化进程中的作用[J].古汉语研究,2012(4):56-60.
- [21]赵芳.汉英词汇的空间性差异[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38(2):133-135.
- [22]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8.
- [23]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
- [24]沈欣怡,冯莉,钱张颖溢.“力”的类词缀化[J].黑河学院学报,2023,14(12).
- [25]孙毅.英汉情感隐喻视阈中体验哲学与文化特异性的理据探微[J].外语教学,2010,31(1):45-48.
- [26]隽娅玮.从文化隐喻谈“性”的语义演变[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3).
- [27]FOLEY W.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7:245.
- [28]沈孟理.试论新词缀化的汉民族性[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35-41.
- [29]张云秋.“化”尾动词功能弱化的等级序列[J].中国语文,2002(1):50-54.
- [30]沈孟理.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93-99.
- [31]任龙波.论空间图式系统[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31-35.
- [32]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4.
- [33]于海辰.量化词语的隐喻分析:以“颜值”为例[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32(8):136-139.
- [34]王文斌,刘庚.侧显化视角下英语名词源于动性词根的成因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2):163-175.
- [35]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5-57.
- [36]陈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中国语文,1988(6):401-422.
- [37]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中国语文,1994(5):339-346.
- [38]刘欢,麻珊珊.现代汉语词缀与英语词缀的差异[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1(1):78-80.
- [39]刘庚,王文斌.从构词词源看英汉时空性差异[J].外语学刊,2021(1):108-115.
- [40]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one: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2-13.
- [41]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7.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ouns —A Case Study of the 9th Edition of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i Guohong, Yu Yue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demonstrate marked differences in how they handl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se differences ar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ouns into Chinese. In this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Chinese language frequently employs quasi-affixes to emphasize its spatial features. From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English nouns typically convey a more pronounced sense of motion, reflecting the language's temporal traits. Thus,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ng English nouns into Chinese not only brings to light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but also affirms the distinct ways they encode time and space.

Keywords: quasi-affix; noun; etymology;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教育共同体助力乡村义务教育:缘起、历程与启示

董江华, 吴银银

(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体育)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自21世纪以来,教育共同体在回应基础教育改革的时代挑战中启动,经历了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当前进入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教育研究者、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教育主管部门及成长中的民间公益组织等多主体协同,探索出多种教育共同体模式,推动了我国乡村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教育共同体助力乡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启示包括: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资源,引领教育发展与乡村建设双向互促;推动师资双向流动与在地化专业成长,助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突破困局;创新教育评价,改善乡村教育生态;利用异质性资源与差异性文化,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与学校育人质量等。

关键词:教育共同体;乡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异质性资源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11

一、问题提出

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2035年实现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前列的建设目标^[1]。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关键在乡村。乡村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教育研究者、教育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乡村教育工作者及村民等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自21世纪以来,教育共同体(Education Community,以下简称教共体)助力乡村义务教育发展,为我国建设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共同体”一词源自滕

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19世纪末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指向一种生机勃勃的持久的共同生活,涵盖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精神共同体^[2]。1916年,杜威(John Dewey)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强调,学校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交往合作的社会生活,应以“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的形式展开^[3]。20世纪末,佐藤学有关学习共同体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对于学习型组织的思考,以及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对于教育复杂性的深刻洞见,助推了21世纪以来我国教共体的实践探索。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大批富有教育情怀的教育研究者与中小学教师回应新时代教育转型的现实呼声,组建教共体投身基础教育改革。回看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教共体发展经

收稿日期:2025-07-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公平视域下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短板’及补板机制研究”(21YJA880069);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浙江省县域乡村学校内源发展模式研究”(2025SCG155);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质量教育背景下‘师道’意涵构建与培育路径研究”(22GHB33)

作者简介:董江华(1972—),女,山东昌邑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吴银银(1978—),女,浙江台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教育与教师教育。

历了怎样的探索历程?其发展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本研究围绕以上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提炼我国本土教育实践智慧,为我国优质公平的公共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有别于狭义的教共体概念,本研究中的“教共体”概念指基于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共同愿景,义务教育相关利益方携手合作,从政策、资源、平台、师资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乡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协作共同体。

二、发展历程

(一)多主体协同、多样态发展的教共体启动阶段(2000—2010)

2000—2010年,我国教共体启动了多主体协同、多样态发展的探索历程。

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江苏、北京等地是我国较早探索以教共体促进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地区。杭州于2001年率先探索“名校+新校”“名校+弱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2004年开始试点以技术赋能推进城乡学校均衡发展的“农村远程教育”工程^[4]。2005年,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整体加入“新教育实验”,探索一所城区学校带动多所中心小学、村小联合体带动农村学校的方式,教共体成为促进海门教育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载体^[5]。靖江市从2005年开启以教共体支持乡村教育的实践探索,形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教共体格局,普遍提高了乡村学校教学质量^[6]。

从推动主体来看,随着“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新教育实验”^[7]等影响全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相继展开,高校教育研究者与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携手回应教育发展的时代挑战,开启了以教共体促进城乡教育及区域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的探索道路。十年间,教共体参与主体持续增多。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中小学、家庭、社区等组织机构以多样化的协同方式助力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02)、真爱公益基金(2007)、田字格公益(2010)等公益组织及民办非营利性组织也相继出现。它们协同多方资源、集聚多方智慧,通过资源下沉、师资培训、课程开发、教育研究等多种途径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成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协同模式来看,在十年的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多样化的协同模式。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

家校教共体、以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为目标的“以强带弱”的校际教共体、以提升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水平为目标的高校与中小学共建的教师发展学校^[8]、通过网络建立的跨区域教育协作共同体^[9]等多种模式,均在实践中发挥了良好作用。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教共体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显著成效在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中相继得到确认。浙江、江苏、云南、湖北、山东等多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总结前期探索经验,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10-13]。

(二)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的教共体发展阶段(2011—2021)

发展乡村教育,关键在教师。2011年,我国基础教育实现了“两基”全面普及的重大历史成就。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为提高国民素质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显著差异与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公平的基础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依旧凸显。2012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项目,保障义务教育学校“硬件”均衡落地^[14]。在此背景下,作为“软件”的乡村师资队伍建设成为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问题。

自2010年开始,国家启动重点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的大规模教师培训计划——“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下简称“国培计划”)。“国培计划”集中支持乡村教师专业成长,借助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等教研平台构建跨界教共体,促进教师专业发展。2015—2019年,“国培计划”基本实现对中西部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全覆盖^[15]。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2)、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2012)、国务院办公厅《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2015)、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相继颁布,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教共体不断探索有效路径,助力乡村师资队伍建设。

浙江省基于本省教师队伍现状,多种举措并进,积极推动师资队伍建设。2015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教师发展学校建设实施方案(试行)》。教师发展学校建设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中小学为主体,高校和中小学分工合作、互相配合”^[16]。与此同时,“U-D/G-S”模式发挥大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各自的差异性资源优势,协

同发力,提升师资队伍质量,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发展^[17-18]。2020年,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推动城乡师资双向流动、优化乡村教师激励机制等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新办法。

(三)优质均衡发展背景下的教共体发展新阶段(2022年至今)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正向着优质均衡的目标迈进。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治理体系适应教育强国需要,市(地、州、盟)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绝大多数县(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总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1]。今天,身处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需要大量热爱乡土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乡村教师。当前,教共体需探索如何基于校本,协同多主体,赋能一线教师提升自主性,破解乡村义务教育实践困境,促进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实践改进。

三、启示

浙江省是我国较早开始探索以多样化的教共体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地区。截至2024年,浙江省城乡教共体已覆盖95%以上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和所有的乡村学校^[19],借助“U-D/G-S”“U-S”“S-S”等多种教共体模式,显著推动了乡村义务教育发展。本研究以21世纪以来浙江省教共体实践探索的经验为个案,归纳其启示。

(一)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资源,引领教育发展与乡村建设双向互促

浙江省教共体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同频共振。2003年启动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与2005年省政府提出的“教育强省”目标相互促进,衢州市、舟山市、义乌市、嘉善县等多地开启了以教共体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探索,并在实践反思中持续完善教共体的实施方式、评价方式及保障机制^[20-22]。2013年,浙江农民大学成立,大学整合浙江农林大学等9家单位的场地、师资等资源,为乡村人才建设“蓄水池”^[23]。2019年,浙江省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优势,全面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

”,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实时互通。2020年底,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共同发布《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全省域推行教共体建设,以提升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促进浙江省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2022年,浙江省将“支援山区26县和6个海岛县组建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500所”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下沉^[24]。同年,省教育厅统筹组织全省109所高校成立浙江省高校助力乡村振兴联盟。各高校充分发挥资源与人才优势,加强涉农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拓展涉农人才培训,从科技帮扶、技术应用、平台建设、成果转化、智库服务、项目驱动等途径入手,探索“政校企村”四位一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浙江模式^[25]。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浙江省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教共体”建设模式。例如,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台州受地理环境影响,基础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乡村教育面临校、师、生的“三弱困境”。台州市组建“乡村教育联盟”,编制《乡村教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强化政策、经费、机制支撑;实施“乡村特色学校”建设工程,以顶层设计推进全市教共体实践探索;提出村校“抱团”发展、名家“组团”把脉、资源“成团下沉”的破局思路。通过多方协同,台州市不断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探索出一条体现时代精神、具有台州特色的乡村教育振兴之路^[26]。

(二)推动师资双向流动与在地化专业成长,助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突破困局

优质师资不足与教师流失是制约乡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教共体通过促进城乡师资双向流动及乡村教师在地化专业成长,助力突破师资困局。

自2016年起,浙江实施“县管校聘”改革,并推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为乡村学校引进优秀教师提供了政策保障。2017—2019年,全省共有1788名校领导和4710名骨干教师从城镇学校和优质学校交流到乡村小学和薄弱学校^[27]。2020年底,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出台《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师资的双向流动。各地将精简和调剂的事业编制资源,统筹用于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的补充;教育主管部门优先满足教共体内教师的双向交流,优化师资结构;鼓励特级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到乡村学校

支教讲学,对在同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连续任职达到10年的校长和连续任教达到12年的教师,均要求交流,并随迁人事关系。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新举措。例如,“初任教师学在城里,优秀教师干在农村”的乡村学校新教师培训模式,即借助教共体的帮扶,乡村学校新任教师先在优质学校锻炼1年再正式上岗^[28]。再如,台州市探索“名师工作室乡村扎根实验行动”,市县两级联动,建立名师工作室乡村基地学校,常态化开展引领研修活动。村校涌现出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带动乡村薄弱校教育质量的显著提升^[26]。

与此同时,高校通过对本土师资的培养与培训,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定向培养热爱家乡、有志于建设家乡的全科教师、紧缺学科教师;与中小学组建跨界学习共同体,与乡校教师共同提炼学校特色育人文化、研发“五育”校本课程,支持乡村教师在服务乡村建设中实现在地化成长。同时,高校精心设计培训内容,采取网络研修、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教师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三)创新教育评价,改善乡村教育生态

2013年,浙江被列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各地积极探索构建以优化区域教育生态为目标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海盐县联合高校的专业力量,制定城乡学校“发展性评价标准”,提出“增量”概念,使薄弱学校的进步能够被看见^[29]。马海燕等(2021)提出,区域义务教育评价的重点应转向优化教育生态。良好的区域教育生态应体现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与公平发展。结构型质量,整合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从教育均衡、优质和公平的三个维度,反映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及发展状态的可持续性。评价区域的结构型质量,有助于缩小区域内教育差异,促进教育的优质公平发展^[30]。村校、优质、生态等关键词更高频地出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评价中^[31]。将乡村伙伴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作为评价核心学校和教共体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极大地增强了教共体伙伴间的凝聚力,改善了乡村教育生态。同时,创新性的教育评价也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台州对32所联盟学校开展专项监测,联盟学校可以全市参数为参照,明确发展突破口。当发现监测结果显示乡村学生家庭阅读氛围不良时,台州将村校

书吧、读书角的覆盖率提升了60个百分点,全面推行整本书阅读活动^[32]。

与此同时,浙江省强化督导考核,以落实民生实事的方式推进教共体建设。2021—2022年,省政府相继将“新增城乡教育共同体结对学校(校区)1500家”^[33]“支援山区26县和6个海岛县组建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500所”列入民生实事项目。省、市、县三级教育主管部门分别负责相关层级教共体建设的统筹协调、业务指导、过程管理和绩效评估,将教共体建设落实情况纳入民生实事专项督查考核和地方年度教育业绩考核双考核,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34],改善教育生态。

(四)利用异质性资源与差异性文化,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与学校育人质量

伴随着优质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学校物理意义上的固有边界逐渐松动,教师跨界学习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教师通过轮岗、挂职、支教、援建和校企合作等方式,在跨界学习中实现内生性成长,提升专业自主性与创造力^[35]。那么,伙伴成员是如何利用异质性资源与差异性文化实现心智跃迁与实践改进的?阿克曼和贝克提出由识别、协调、反思、转化构成的跨界学习的四大对话学习机制。伙伴成员在跨界学习中识别、解读差异,在合作性或常规性对话中拓展个人视角,建立新的观点并审视问题,生成新实践^[36]。例如,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以学校改进与教师专业成长为目而构建的U-S跨界学习共同体,客观存在学术文化与工作文化、批判文化与权威文化等方面的不同^[37]。伙伴成员共同面对困扰一线教师的实践难题,在彼此信赖的真诚对话中激发个体反思。研究者为一线教师提供具有可沟通性的理论支持,并充分信任一线教师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行动力。这种“激发性信任”能够唤起教师学习的主体性^[38],进而实现视角再造,形成共同理解。教师在实践反思中实现顿悟式学习,中小学教师成为知识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39]。研究者也在共同破解源自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身的认知边界,形成新知。

作为一所有着百年师范教育传统的地方院校,台州学院秉持校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奋斗共同体”的办学理念,与台州各地中小学创新构建伙伴式U-S共生体,协同促进台州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校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院,以顶层设计推动

高校研究者深入中小学,服务地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校本项目共研、附属学校助建、共建教师发展学校、设立专业研学基地与教育实践基地等多种途径,大学与小学共享资源,通过共享经验推进深层对话,实现视域融合,推动学校改进与师范教育提质^[40]。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课程评价研究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台州市文华小学、三门县实验中学等多所城乡薄弱学校合作,探索课堂评价的实践改进。团队发挥异质性资源和差异性文化优势,构建出促进教与学的课堂评价质量标准、运行模型,总结促进教与学的课堂评价策略,开发实用技术和工具^[41],显著提升了城乡薄弱学校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与学校育人质量。

结语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教共体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逐步拓展深化,所创设的教育实践智慧以制度创建与理论总结的方式得以积累。未来,教共体将继续探索如何基于义务教育学校的本土生态文化,统筹资源配置,完善智慧教育服务平台,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无边界共享。在重视顶层设计、政策推进的同时,鼓励促建更多基于校本的跨界学习共同体,赋能学校管理者与一线教师持续提升专业性与创造性,协同破解应试教育的捆绑;促建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气息的幸福乡村教育生活;培养立足乡土、敬爱自然、走向未来,富有生存力、生活力、生长力^[42]的全面发展的孩子;以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突破口,为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贡献中国教育智慧。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23-06-13)[2024-07-02]. 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546/202306/content_688957.html.
- [2]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3-70.
- [3]佐藤学,钟启泉.学校再生的哲学:学习共同体与活动系统[J].全球教育展望,2011,40(3):3-10.
- [4]浙江省:以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为抓手 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EB/OL].(2023-06-16)[2024-05-0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3/2023_zl07/202306/t20230616_1064666.html.
- [5]许新海.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形态及其价值[J].人民教育,2012(24):25-27.
- [6]蔡丽洁,丁昌桂.靖江:“教育共同体”推进城乡教育共同发展[N/OL].江苏教育新闻网,2015-10-21[2024-07-02].http://www.jsenews.com/news/sx/201510/20151021_2459919.shtml.
- [7]俞水,杜京虹.“新教育实验”给教师带来了什么?:可见的成长[N].中国教育报,2023-03-17(9).
- [8]宁虹.重新理解教育:建设教师发展学校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1,22(11):49-52.
- [9]郑展文,郑兰桢.构建网络远程协作教育共同体的研究[J].教育信息技术,2009(6):54-55.
- [10]马君诚.依托教育发展共同体,努力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J].江苏教育(教育管理),2012(9):49.
- [11]陈树德,阎春艳.筹备成立区域教育共同体集团[N].人民政协报,2009-06-12(2).
- [12]刘光瑾.构建义务教育共同体 探索均衡发展新模式[J].湖北教育(综合资讯),2010(12):28-29.
- [13]宏火,李靖,刘胜,等.发展办大教育 均衡办优教育 为民办好教育:云南省沾益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发展之路[J].云南教育(视界综合版),2015(10):39-42.
- [14]宋成龙.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EB/OL].(2012-09-03)[2024-06-1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s6236/s6811/201209/t20120903_141499.html.
- [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国培计划”蓝皮书(2010—2019)摘要[EB/OL].(2020-09-04)[2024-07-02].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16/guopeijihua/guopeilanpishu/202009/t20200907_485968.html.
- [16]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教师发展学校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EB/OL].(2015-06-19)[2024-12-02].<http://www.zjteacher.net/info/1061/4586.htm>.
- [17]陈娜.“U-D-S”伙伴协作:价值、阻力与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8):29-31.
- [18]李国栋,杨小晶.U-D-S伙伴协作:理念、经验与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3,40(10):30-37.
- [19]金澜.以高质量教育筑牢共同富裕之基:浙江奋力谱写“浙里优学”新篇章[N].浙江教育报,2025-01-07(1).
- [20]金致红.实施城乡联校行动推进教育共同体发展[J].中小学管理,2009(6):18-20.
- [21]陈龙宽.教育共同体 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J].上海教育科研,2006(7):72-73.
- [22]江南.浙江建设教育共同体,探索义务教育“乡村弱”现象的破解之道[N].人民日报,2021-04-02(12).
- [23]搭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平台 浙江农业大学挂牌成立[N/OL].中国教育报,2013-12-18[2024-12-0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312/t20131218_160946.html.
- [24]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帮扶民生实事任务的通知[EB/OL].(2022-01-25)[2024-09-11].https://jyt.zj.gov.cn/art/2022/1/25/art_1532973_58924608.html.
- [25]浙江省全力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接续推动乡村教育全面振

- 兴 [EB/OL]. (2022-06-20) [2024-08-1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04/dongtai/difang/02206/t20220620_638866.html.
- [26]姚苗苗.资源“成团下沉”,台州乡村教育蝶变记[N].台州晚报,2023-11-28(3).
- [27]浙江:着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N/OL].浙江日报,2021-01-15 [2024-06-12].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15/content_5580138.htm.
- [28]高众.美好教育扮靓乡村: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浙江美好乡村教育实践(中)[N/OL].中国教育报,2021-12-21[2024-07-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12/t20211221_588919.html.
- [29]蒋亦丰.确保每所学校每个孩子都能享受有品质的教育:优质均衡海盐“交卷”[N/OL].中国教育报,2019-10-31[2024-07-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19n/2019_zl45/t201910/t20191031_406172.html.
- [30]马海燕,李强,张丰.结构型质量:区域教育生态水平的评价创新[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10):18-23.
- [31]蒋亦丰.教育向优村娃筑梦: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浙江美好乡村教育实践(下)[N/OL].中国教育报,2021-12-22[2024-07-1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12/t20211223_589602.html.
- [32]蒋亦丰.点亮乡村教育的熠熠星光[N].中国教育报,2022-06-24(1).
- [33]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落实好“新增城乡教育共同体结对学校(校区)1500家”省政府民生实事任务的通知[EB/OL].(2021-03-25)[2024-06-12].https://jyt.zj.gov.cn/art/2021/3/25/art_1532973_58916845.html.
- [34]浙江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21-01-05)[2024-06-12].https://jyt.zj.gov.cn/art/2021/1/5/art_1532973_58916609.html.
- [35]叶菊艳,卢乃桂,曹钰昌,等.教师跨界学习研究:概念,现状与展望:“跨界教育实践中的教师学习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教师发展研究,2022,6(3):116-124.
- [36]AKKERMAN S F, BAKKER A. Boundary crossing and boundary objects[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 81(2):132-169.
- [37]卓进,蔡春.论U-S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文化冲突[J].教育学术月刊,2018(3):89-96.
- [38]陈向明.以“激发性信任”唤起教师学习的主体性[J].中国基础教育,2022(10):42-45.
- [39]陈向明.让教师成为知识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N].中国教师报,2024-06-05(13).
- [40]董江华.“大”“小”协同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N].中国教育报,2025-02-28(6).
- [41]张樱樱.台州学院王少非教授团队:聚焦课堂评价 提升教学质量[EB/OL].(2025-04-15)[2025-05-02].<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2496504?d=134ff2&channel=weixin&time=1744704893053>.
- [42]肖诗坚.乡村为什么需要属于自己的教育[J].中国乡村发现,2021(3):115-123.

Support from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for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Origin, Process, and Insights

Dong Jianghua, Wu Yinyi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value pursuit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initiated in response to the era's challenges i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al stage focused on teaching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has currently entered a new phase aimed at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Education researcher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education authorities, and growing civil welfare organizations have collaborated to explore various educational community model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insights of this education community include: coordinating resources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to lea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wo-way mobility and localized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with rural teaching workforce construction; innovat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rural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utilizing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and diverse cultures to enhance teachers'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community;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探究

徐宁宁¹, 许利敏², 应永利³

(1. 台州学院 商学院, 浙江 台州 318000; 2. 台州学院 组织部, 浙江 台州 318000;
3.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大学生农村创业是乡村人才振兴和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通过对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2789名大学生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浙江省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较高,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高于城市籍大学生;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受到政策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农村籍大学生尤为显著;大学生农村创业行为态度总体积极正向,但城乡差异明显;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准备对其创业意愿具有复杂影响,城乡差异加剧了这一复杂性。基于此,建议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强化创业活动分类指导;加强政策效应评估,提升创业政策帮扶的精准性;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建构农村创业者的地方认同感。

关键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城乡差异;影响因素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12

农村创业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由于城乡二元分割,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长期向城市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回流创业成为新的就业选择^[1]。受金融危机、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支持等影响,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日益明显,“逆城市化”现象受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界广泛关注。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回流进入现代农业及相关第二、三产业,有利于破解农村人才瓶颈制约,形成资金、技术、信息等多要素汇聚和多元业态布局,激发农村内生发展驱动力。据统计,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2]。在大学生竞争激烈的就业难和乡村人才匮乏的引人难这一“两难”的形势下,吸引更多大学生农村创业,无论是对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共

同富裕,还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创业是把农村不同资源组合起来开发、利用,并为农村创造收入的创业形式,有助于提高农业创新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还有利于提升地区创业氛围,产生创业吸引力,形成地方关系网络和特色资源的集群化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农村资本良性流动^[3]。城乡间的推拉力量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经历了乡村衰落、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共性问题。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英国推行“农村中心村建设”,法国实

收稿日期:2025-06-21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省青年返乡创业政策适配性研究”(Y202249615);浙江省妇女研究课题“女大学生择业困境、就业质量及优化对策研究”(202350)

作者简介:徐宁宁(1993—),女,山西洪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旅游与旅游消费者行为;许利敏(1983—),女,浙江台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生发展与教育;应永利(1972—),男,浙江台州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乡村治理、社会文化。

行“农村振兴计划”，日本推出“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这些国家都是通过创新机制吸引人口回到农村就业创业^[4]。Steffen Korsgaard等研究发现，资源匮乏地区的农村创业者会尽可能挖掘地区潜力，并在必要时引入非本地资源以创造创业机会，通过地方性嵌入和非地方战略网络的相互补充提升创业竞争力^[5]。Sabine Müller等的研究也表明，区域资源禀赋对农村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影响巨大^[6]。创业活动能够积极推动区域发展，区域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又反过来影响创业活动^[7]。在我国，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相继推进，农村的政策供给、产业环境、生态建设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创业逐渐步入商业主体“自下而上”追逐创业机会、政府“自上而下”赋权增能的相向耦合机遇期。

大学生是农村创业的主要群体之一。汪红梅等研究发现，性别、生源地、创业技能、家庭支持、创业教育、个人能力以及成就事业的动机都会影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8]95}。刘志侃等总结出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五个因素，包括教育引导机制、贷款优惠程度、税收优惠程度、家庭精神支持程度和所学专业^[9]。吴旭梦研究认为，大学生缺乏较高的回乡创业意愿，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缺乏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0]。国外有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显著，父母创业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更强^[11]。父母对孩子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有榜样作用，父母的创业经验和关系资源有助于孩子创业^[12]。此外，区域创业文化、市场结构、人才技术水平等都会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起到重要作用。潜在创业者会将自己内心想法、目标等要素与所处环境进行比较，当感知到成功预期时，创业意愿才会固化并转化为实践。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重要的空间环境类型，通过影响场域中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其创业意愿。城市籍大学生有更多机会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支持^{[13]80}。农村籍大学生处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双重不利地位，面临的就业机会更少，因而他们把创业作为就业目的的动机更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个人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概率的判定，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三大因素的影响，是目前研究行为内生影响因素的关键理论模

型。刘加凤和胡永青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过分析^[14-15]。于丽卫和刘倩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研究发现，创业动机、媒体报道和同学支持对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邻里非议、缺少资金、缺乏项目、经验不足则对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6]。

综上来看，既有大学生创业意愿研究主要聚焦创业者个人特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区域政策等对其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的影响，且多是以整个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部分研究注意到大学生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但并未对此现象及影响因素作深入分析。此外，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地农村发展日新月异，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部署，而既有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研究中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的则十分少见，远远滞后于实践，这为本文提供了新的研究情境和研究方向。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通过对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2 78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城乡差别，剖析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为分类指导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借助政策工具推动农村创业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 指标要素的选择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已有研究，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意愿，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分别为愿意、不愿意。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自变量中，主观规范包括响应国家号召、家人和朋友支持、社会大环境支持、亲戚朋友创业；行为态度包括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自主创业行为评价；感知行为控制包括对农村了解程度、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生源地，其中生源地分为农村和城市。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框架，结合研究实际，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建构出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理论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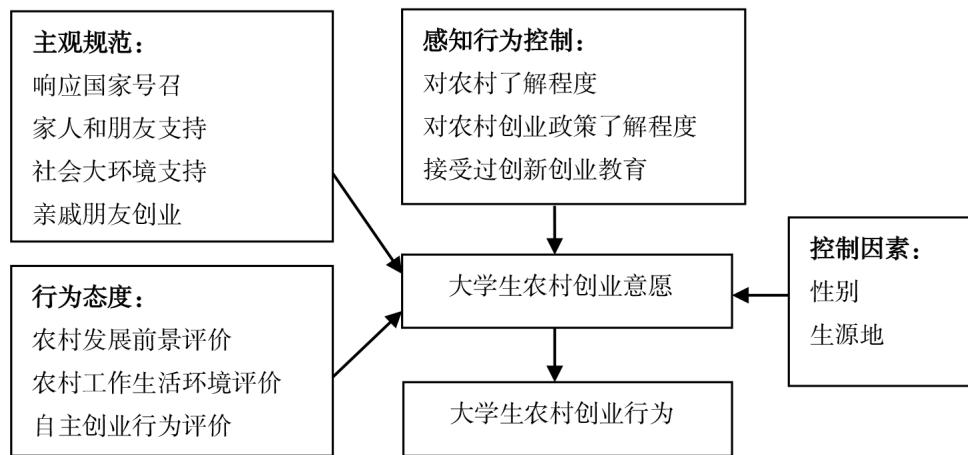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理论框架

(二)模型的构建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其会在综合衡量每个因素的基础上作出最后选择,即“愿意参与”或是“不愿意参与”两个端点值,表示为 $[0,1]$,是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二元 Logistic 模型是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有效模型。因此,本文选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以期精准识别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显著因素。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p_i = F\left(\beta_0 + \sum_{j=1}^m \beta_j x_{ji}\right) = 1 / \left\{ 1 + \exp\left[-\left(\beta_0 + \sum_{j=1}^m \beta_j x_{ji}\right)\right] \right\} \quad (1)$$

对式(1)取对数,可以得到 Logistic 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ln\left(\frac{p_i}{1 - p_i}\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i} + \dots + \beta_j x_{ji} + \beta_m x_{mi}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p_i 是指第*i*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本文中表示大学生参与农村创业意愿的概率; x_{ji} ($j = 1, 2, 3, \dots, m$)表示第*i*个事件中第*j*个影响变量;*m*则表示自变量的个数; β_0 代表常数项; β_j ($j = 1, 2, 3, \dots, m$)则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若 β_j 的符号为正,则表示第*j*个影响因素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反之则具有负向影响。大学生愿意农村创业和不愿意农村创业的概率比值 $\frac{p_i}{1 - p_i}$ 则代表事件发生比。

(三)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基于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定义,并据此设计了调查问卷,对影响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因素进

行了整理分类(见表1)。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第一手数据。2023年9月在浙江省台州市发放100份问卷,进行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结果调整初始问卷中存在的问题,邀请教育学、创新创业等领域的专家进行头脑风暴,形成正式调研问卷。随后根据抽样结果,于2023年10月至12月在4个省辖市的7所大学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 095份,全部回收,回收率为100%。在剔除无效问卷(未填写完整、题项回答全部相同)后,共得到有效问卷2 789份,有效率为90.1%。

受访者样本中,生源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有1 289人,占46.2%;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有1 500人,占53.8%,农村籍学生占比略高于城市籍学生占比。样本中,男大学生983名,占35.2%;女大学生1 806名,占64.8%(见表2)。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的占多数,但有创业经历的却很少;城乡大学生的农村创业意愿呈现出一定差异(见表3)。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结果

本文借助SPSS26软件,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城乡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模型的卡方值为122.609,显著水平为0.000,Cox&Snell R^2 和Nagelkerke R^2 分别为0.091和0.168,对数似然值

表1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变量及定义

变量	定义
性别	若性别为男取值为1,性别为女取值为0
响应国家号召	若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取值为1,否则为0
家人和朋友支持	若家人和朋友支持农村创业取值为1,否则为0
社会大环境支持	若认为社会大环境支持大学生农村创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亲戚朋友创业	若有亲戚朋友创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村发展前景评价	若认为农村发展前景好取值为1,否则为0
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	若认为农村工作生活环境好取值为1,否则为0
自主创业行为评价	若认为自主创业行为能实现个人价值取值为1,否则为0
对农村了解程度	若了解农村取值为1,否则为0
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	若了解农村创业政策取值为1,否则为0
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若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取值为1,否则为0

表2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样本基本特征

背景	维度	数量/名	占比/%
生源地	城市	1 289	46.2
	农村	1 500	53.8
性别	男	983	35.2
	女	1 806	64.8
独生子女	是	1 015	36.4
	否	1 774	63.6
成绩排名	班级前 50%	2 002	71.8
	班级后 50%	787	28.2
创业经历	是	207	7.4
	否	2 582	92.6
创新创业教育	是	1 763	63.2
	否	1 026	36.8

表3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城乡差异

变量	分类	生源地			
		农村		城市	
		数量/名	占比/%	数量/名	占比/%
农村创业意愿	是	715	47.67	435	33.75
	否	785	52.33	854	66.25

为 874.850。另外,霍斯默检验的 P 值为 0.932, 大于 0.05, 说明本模型数据与真实数据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见表 4)。与此相对,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模型的卡方值为 51.608, 显著水平为 0.000, Cox&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分别为 0.034 和 0.085, 对数似然值为 714.326, 霍斯默检验的 P 值为 0.594, 大于 0.05, 说明本模型数据与真实数据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见表 5)。

(二)结果分析

1. 浙江省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较高,农村籍大学生高于城市籍大学生。调查发现,此次调查的浙江省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为 41.23%, 其中城市籍大学生愿意在农村创业的占比 33.75%, 农村籍大学生愿意在农村创业的占比 47.6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高于城市籍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见表 3)。例

表 4 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估计系数	标准误差	瓦尔德值	自由度	显著性	OR 值
响应国家号召	0.858***	0.179	23.055	1	0.000	2.359
家人和朋友支持	-0.624	0.380	2.693	1	0.101	0.536
社会大环境支持	0.267	0.232	1.332	1	0.248	1.165
亲戚朋友创业	-0.363	0.198	3.365	1	0.067	0.696
农村发展前景评价	0.017	0.201	0.007	1	0.932	1.017
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	0.537***	0.147	13.241	1	0.000	1.585
自主创业行为评价	0.092	0.205	0.202	1	0.653	1.097
对农村了解程度	0.753***	0.188	25.658	1	0.000	1.593
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	0.131*	0.613	0.046	1	0.022	1.177
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0.231	0.189	1.487	1	0.223	0.794
常量	-0.319	0.699	0.208	1	0.648	0.727
性别	-0.421	0.191	4.853	1	0.058	0.657

注:*,***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估计系数	标准误差	瓦尔德值	自由度	显著性	OR 值
响应国家号召	0.485*	0.213	5.193	1	0.023	1.624
家人和朋友支持	0.354	0.341	1.077	1	0.299	1.424
社会大环境支持	0.632*	0.286	4.872	1	0.027	1.531
亲戚朋友创业	-0.268	0.217	1.535	1	0.215	0.765
农村发展前景评价	0.567*	0.259	4.811	1	0.028	1.763
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	-0.228	0.167	1.859	1	0.173	0.796
自主创业行为评价	0.093	0.254	0.135	1	0.713	1.098
对农村了解程度	-0.890***	0.275	37.619	1	0.000	0.185
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	0.209*	0.362	0.335	1	0.035	1.233
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0.064	0.221	0.084	1	0.772	0.938
常量	-0.456	0.902	0.256	1	0.613	0.634
性别	-0.281	0.223	1.579	1	0.209	0.755

注:*,***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上显著。

如,梁春晓等选取全国范围内 15 336 名大学生所进行的大学生创业意愿调研结果表明,全国大学生创业意愿为 25.49%,其中农村籍大学生达 30.8%,城市籍大学生为 17.5%^{[13]79}。汪红梅等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79 名学生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为 36.95%,其中城市籍大学生为 24.3%,农村籍大学生为 47.5%^{[8]93}。浙江省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比较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创业意愿受区域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区域示范作用明显。二是地方认同作用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生成。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乡村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农村内部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相对健全,一些农村资源和要素条件较好,创业机会较成熟。

2. 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受政策和社会关系影响,农村籍大学生尤为显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籍大学生关于响应国家号召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858,符号均为正;农村籍大学生关于响应国家号召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485,分别在 1% 和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响应国家号召是影响城市籍和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显著因素,且响应国家号召对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籍大学生。城市籍和农村籍大学生对身边有亲戚朋友创业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363 和 0.268,符号均为负,未达到显著水平。城市籍大学生关于家人和朋友支持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624,符号为负,未达到显著水平;农村籍大学生关于家人和朋友支持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354,符号为正。城市籍大学生关于社会大环境支持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267,符号为正,未达到显著水平;农村籍大学生关于社会大环境支持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632,符号为正,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表明,对于城市籍大学生而言,社会大环境支持对其农村创业意愿并无影响;而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而言,社会大环境支持是影响其农村创业意愿的显著因素。这与上述梁春晓、汪红梅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村人深刻感受到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跳农门”思想根深蒂固,其奋斗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逃离农村、到城市安家落户。农村又是“熟人”社会,社会规范的压力更大,农村籍大学生更在意“重要他人”的评价,调研中不少农村籍大学生表示“毕业后回农村会被周围人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相比之下,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籍

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受到的他人影响较少。

3. 大学生农村创业行为态度总体积极正向,但城乡差异明显。上述数据分析显示,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017,但并不显著,说明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对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567,符号为正,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对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显著。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537,符号为正,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对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显著。OR 值为 1.585,说明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创业意愿就会提高 58.5%。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228,符号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对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城市籍大学生和农村籍大学生对自主创业行为评价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92 和 0.093,符号为正,未能在模型中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自主创业行为评价变量没有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产生明显的干扰效应。在“双创”的大背景下,一些对自主创业认可度高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便会选择创业,毕业后更青睐于在所在城市延续自己的创业行为,不会立即转到农村场域。这一原因消解了自主创业行为评价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

4. 创业准备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复杂,创新创业教育实效性有待提高。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了解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753,符号为正,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了解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890,符号为负,并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市籍和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的了解程度与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相关。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了解程度的 OR 值为 1.593,说明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的了解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创业意愿就会提高 59.3%;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了解程度的 OR 值为 0.185,说明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的了解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创业意愿就会降低 81.5%。逃避主义认为空间移动是人们逃避的主要途径之一,即从一个相对了解的却并不是太满意的地方逃往一个想象中的或不十分了解的地方^[17]。访谈中一

些城市籍大学生认为农村充满自然、浪漫和自由气息,可以让人逃避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不少农村籍大学生则认为农村代表落后,城市里充满机会。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09和0.131,符号为正,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变量的OR值分别为1.233和1.177,这说明农村籍大学生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创业意愿就会提高23.3%;城市籍大学生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创业意愿就会提高17.7%。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关于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64和0.231,符号为负,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问卷调查及分析发现,浙江省大学生的农村创业意愿整体较强,且农村籍大学生的农村创业意愿高于城市籍大学生。城乡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影响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的因素包括响应国家号召、农村工作生活环境评价、对农村了解程度和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影响农村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包括响应国家号召、社会大环境支持、农村发展前景评价、对农村了解程度和对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另外,对农村了解程度与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显著相关,其中与城市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正相关,与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负相关。

(二)启示

1.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强化创业活动的分类指导。本研究强调城乡背景对大学生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学校要聚焦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对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对城市籍大学生,既要加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有关政策的宣讲,也要鼓励其通过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形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研究农村,增进其对农村文化的理解、认知和认同。而对农村

籍大学生,一方面要注重引导其正确理解乡村振兴的深刻内涵,提振对农村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规划指导,鼓励其根据自身的特长、爱好、性格作好职业规划,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作出合理选择。此外,高校要提高创新创业教育课的实效,通过增设与当地“三农”工作相关的专业课、选修课,探索项目化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把所学的农业技术、市场营销、产品包装设计、旅游管理等知识应用到“三农”工作中,培养学生农村创业机会的发现和识别能力。

2.加强政策效应评估,提升创业政策帮扶的精准性。农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与城市籍大学生、农村籍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均显著正相关,但调查中也发现,大学生对农村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不高,政策知晓率亟须提高。此外,长期城乡分化造成城市籍大学生和农村籍大学生在个人特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们对政策的需求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如农村籍大学生更关注创业资金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小贷险办理业务等,城市籍大学生则更关注创业用地政策、孵化园招商政策等。因此,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差异,因人施策,才能实现精准帮扶。

3.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建构农村创业者的地
方认同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流网络开始向农村延伸,但农村的互联网、冷链物流等方面建设仍较为滞后,教育、医疗、养老水平与城市差距较大。当前进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叠加实施期,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投入力度,优化农村生活工作环境,建构农村创业大学生的地方认同感和对乡村的情感依恋,避免现有创业者流失,同时吸引更多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就业。

参考文献:

- [1]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 [2]周世祥.教育部、人社部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N/OL].光明日报,2024-11-15[2025-04-12].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4-11/15/nw_D110000gmrb_20241115_1-08.htm.
- [3]王肖芳.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驱动乡村振兴:机理与策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6):101-108.
- [4] LIU Y, LI Y.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J]. Nature,

- 2017,548(7667):275-277.
- [5] KORSGAARD S, FERGUSON R, GADDEFORS J.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how rural entrepreneurs use placial embeddedness and strategic network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5, 27(9/10):574-598.
- [6] MÜLLER S, KORSGAARD S. Resources and bridging: the role of spatial context i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1/2):224-255.
- [7] FRITSCH M, WYRWICH M.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1):157-189.
- [8] 汪红梅,薛建宏,赵帝焱.大学生农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79名学生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90-97.
- [9] 刘志侃,唐萍萍.农村生源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0所高校的调查分析[J].调研世界,2014(7):30-35.
- [10] 吴旭梦.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回乡创业意愿研究[J].农业经济,2021(5):112-114.
- [11] SCOTT M G, TWOMEY D F. The long-term supply of entrepreneurs: students' career aspirations in rela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88, 26(4):5-13.
- [12] GREVE A, SALAFF J W. 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8(1):1-22.
- [13] 梁春晓,沈红.创造力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城乡大学生的比较[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9):77-83.
- [14] 刘加凤.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分析[J].高教探索,2017(5):117-122.
- [15] 胡永青.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4,34(9):77-82.
- [16] 于丽卫,刘倩.大学生回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J].调研世界,2015(12):33-37.
- [17] 段义孚.逃避主义[M].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6.

A Study on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n Rural Areas

Xu Ningning¹, Xu Limin², Ying Yongli³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3. Taizhou Party School of CPC,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rural talent and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rvey data of 2,789 college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 model reg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llege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mong them,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demonstrate great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 than those from urban areas. Their willingnes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lic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among rural-origin students. Their disposition is generally positive, but there is a noticeable disparity between those from urban and rural backgrounds. The prepa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has a complex influence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ich is aggravat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lassified guid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enhance the evaluation of policy effect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ntrepreneurial policy support, accelera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build the local identity of rural entrepreneur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s

数字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挑战与对策

郑殷珏

(台州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开展与中国语境和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媒介素养教育,应从价值、实践、认同三个逻辑向度出发,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数字时代催生了后真相与泛娱乐化盛行、亚文化圈层与西方思潮冲击、技术异化与媒介崇拜加剧等媒介乱象,借鉴西方“免疫—甄别—批判—赋权”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导大学生提升媒介素养,促进其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数字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发展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5.05.013

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媒介越来越广泛地浸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更是思想、文化、价值与观念的重要传播渠道。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媒介塑造了其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两栖”生活方式,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写与重构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数字时代,构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逻辑、分析数字时代下的媒介乱象、提出本土化的教育策略,对高校运用好现代媒介技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 逻辑指向解析

媒介素养教育是帮助个体认知、把握和应用

各类媒介,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以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通常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烙印和时代化特征。开展与中国语境和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应从价值、实践、认同三个逻辑向度出发,深入思考和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一)价值逻辑:“培养什么人”的价值旨归

“培养什么人”这一命题,就是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培养人,以及培养具备什么样价值观的人。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之翼”,承载着意识形态的价值旨趣,是意识形态的根本表达和本质向度。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塑造价值观的重要力量。在数字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打造了全新的媒介形态,这些新媒介又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影响甚至重塑了大学生的精神文化内核。算法推荐、分众投送等传播手段加剧了大学生“亚文化”圈层的涌现与分化,在“过滤气泡”“回音壁效应”的双重影响下,极

收稿日期:2025-08-06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00后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及教育引导研究”(Y202351831);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

“00后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及教育引导研究”(23GHZ06)

作者简介:郑殷珏(1983—),女,浙江临海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管理。

易导致大学生认知窄化和价值观极化。更严重的是,一些标榜“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多元价值观的西方社会思潮,正在利用即时传播的媒介技术向大学生群体加速渗透。面对这样的挑战,必须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不被各种诱惑和偏见左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二)实践逻辑:“怎样培养人”的最终指向

“怎样培养人”的实践准则,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旨,同时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终极追求。“自由”发展,是指尊重并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作用,使其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展现;“全面”发展,是指能力素质的全方位、立体化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和谐发展。“自由”与“全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本真意义。这不仅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应有的发展状态,也是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指南和最终指向。特别是元宇宙、AIGC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盲目崇拜媒介技术的“媒介拜物教”。大学生在享受媒介技术带来的舒适便利中,逐渐放弃了思考的主动性和批判性,沦为了媒介技术的附庸和奴隶。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应更加注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建构,使其获得凭借媒介自由穿梭于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过上更有自主权和满足感的美好生活的能力^[1]。

(三)认同逻辑:“为谁培养人”的关键命题

“为谁培养人”的关键,在于用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引导大学生,使其成长为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媒介作为信息、观念的传播载体,其生成的拟态环境是构建和凝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场域,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和最前沿。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媒介通过特有的符号系统、话语结构和传播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其意识形态认同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媒介通过跨时空、跨层级的聚合与互动,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搭建了广泛连接的数字桥梁;另一方面,媒介又通过引导、规训、屏蔽等技术手段,使个人意识形态处于“议程设置”“流量寻租”的操控之下,催生了后真相、泛娱乐化等媒介乱象,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分化与消解。可见,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介信息、技术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更包含了对媒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辨识和洞察能力。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必须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贯穿始终,以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意识形态的免疫力,从而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任。

二、数字时代下的媒介乱象:现实挑战透视

在“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快速迭代升级中,媒介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快捷,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媒介乱象,给现实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后真相与泛娱乐化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挑战

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的舆论^[2]。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形势下,传统“把关人”作用被不断消解和抵制,使得“真相”的客观性逐渐让位于人的主观性^[3]。当客观事实与个人的情感、信念发生冲突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拼贴、重构传播符合个人偏好的“伪事实”。在“众声喧哗”的媒介领域下,这一趋势不仅增加了发现真相的难度,还使得后真相话语成为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媒介舆论的显著特征。由此,舆论反转、污名化等现象频发,严重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空间,导致大学生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呈离散化趋势,进而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基础。同时,泛娱乐化作为娱乐元素过度泛滥和无底线运用的一种异化现象,正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加持下,媒介实现了娱乐信息的精准“投喂”,使大学生在其编织的“娱乐茧房”中,沉迷于对浅层快感的追逐,陷入赫胥黎式“痛并快乐”的困境。随着资本的深度介入和“流量至上”观念的盛行,娱乐在不断解构和异化中僭越了理性的边界,演变成一种去意识形态的大众狂欢式的泛娱乐化乱象,从而催生了大量颠覆传统、解构经典等以戏谑、调侃为特征的畸形文化现象。这种“万事皆可娱乐”的叙事方式极易导致大学生陷入信仰缺失、精神虚无的意识形态危局,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了严

峻挑战。

（二）亚文化圈层与西方思潮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挑战

亚文化圈层，是指基于共同兴趣爱好而形成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具有特定风格和特征的文化群体。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的媒介环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会圈层的限制，在大学生群体中催生了大量以趣缘为导向的亚文化圈层。这些圈层在算法技术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一种阻碍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文化区隔带。一方面，圈层内成员因其共享的价值观在“回音壁效应”的强化下而变得“固执己见”，客观上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跨圈层传播与渗透；另一方面，圈层间群体又因彼此间的异质文化而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引发非理性的对抗和冲突，使社会整体逐渐走向“支离破碎”，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主体离散的风险。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思潮作为代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思想潮流，借助媒介的脱域功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些思潮通常被包装成“普世价值”，以更加隐蔽和隐晦的方式向大学生群体渗透。在“价值无涉”“客观中立”的伪装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在网络上肆意蔓延，通过所谓的“社会公知”“网络大V”等自媒体制造话题、吸引眼球，企图争夺话语权。大学生正处在思想成长的关键期，在亚文化圈层与西方思潮的双重冲击下，极易陷入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陷阱，进而模糊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知。

（三）技术异化与媒介崇拜加剧：人的单向度与原子化挑战

技术异化，是指人类通过技术实践以期实现自我解放而创造出的对象物，最终却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甚至演化为压迫人、奴役人的工具。在技术异化的作用下，人就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4]。目前，媒介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必需品，并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逐渐由从属于人、服务于人的工具异化为控制人、束缚人的存在物。大学生在媒介精心编织的舒适圈中不断沉沦，个体的自由选择和理性思维遭到压制^[5]，其内在的真实需要也被媒介构建的外在虚假需要所遮蔽，不再有能力想象和追求与媒介导向相异的生活

方式。在技术替代和惰性本能的驱使下，大学生的思维模式陷入了肯定性、浅表性和局限性的窠臼，在媒介技术打造的“硅笼”中逐渐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与此同时，媒介崇拜也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普遍心理状态。所谓媒介崇拜，就是指人们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对媒介过度依赖、盲目认同的心理状态。在数字社会，大学生不再热衷于现实世界的社交联系，转而投向ChatGPT等媒介社交的怀抱，因为这些虚拟存在比现实人更“懂得”体贴和迎合人的需求。在媒介提供的虚假情绪价值中，大学生极易迷失自我、沉迷于离群索居，逐渐失去与社会共同体的互动和连接，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化的个体。这不仅会使大学生陷入情感孤立和心理失衡的困境，更会加剧社会整体的碎片化趋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三、西方范式的综合借鉴： 本土化规训策略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源自西方，并在西方先后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的范式转移。但这四种教育范式并非完全割裂，也不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对中国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均有借鉴意义。面对错综复杂的媒介乱象，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应在融合并借鉴西方四种教育范式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坚持在地经验和中国立场，提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全球化视野的本土化策略。

（一）借鉴免疫范式：抵制低水平满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

免疫范式是西方媒介素养教育最早提出的一种教育范式，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通俗流行文化的抵抗力和免疫力^[6]。虽然该教育范式在忽略个体主体性方面一直饱受争议和批判，但其所倡导的“抵制低水平满足”的逻辑起点，对于应对数字时代后真相话语泛滥、泛娱乐化盛行所带来的认同挑战，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免疫范式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强调，要在教育过程中用传统经典文化来增强大众对流行文化的免疫力。鉴于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国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应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加强主流意

识形态的认同教育,以增强大学生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免疫力。

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引导大学生深刻把握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制作时间线谱。通过向大学生介绍不同时期的媒介形态、传播技术和社会影响,引导其根据媒介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更加准确地把握媒介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媒介案例来分析媒介的运作规律。通过深入剖析媒介信息的来源、目的和影响,帮助大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结构和动力,从而正确处理媒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防止被媒介的表面现象或虚假叙述所误导。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摆脱后真相的纷扰与误导,更能有效遏制后真相现象的蔓延与泛滥。

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中国化、时代化的教育理念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充分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专门设置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章节或模块,系统介绍传统文化中的媒介观念、传播方式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这不仅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媒介元素以提升综合媒介素养,还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奠定坚实的文化自信基础。同时,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元素,积极利用在线课堂、社交媒体等现代媒介技术,引入典型的泛娱乐化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引导大学生在交流中形成正确的媒介观念,自觉抵制泛娱乐化的媒介乱象,共同营造健康的媒介环境。

(二)借鉴甄别、批判范式:倡导价值观引导,以核心价值观构筑精神内核

甄别和批判范式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不再是全面抵制媒介文化,而是对此加以审慎的甄别和批判性的取舍。该范式主张价值观的正面引导,鼓励用批判性思维深入剖析信息背后的价值观念,识别、摒弃带有不良价值导向的信息。随着媒介环境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媒介“把关人”作用逐渐式微,这使不良文化和社会思潮得以广泛传播,在大学生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进而导致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的扭曲和偏离。因此,积极倡导价值观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媒介素养的精神内核,使大学生成为自

身信息接收的“把关人”,对帮助大学生拨开“信息迷雾”,有效抵御“亚文化”圈层及西方社会思潮所带来的认知挑战和价值挑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方面,要深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构建理性甄别、批判性吸纳的价值准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指导原则,借助媒介丰富的交互功能和强大的算法算力,精准捕捉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深入洞察其价值追求,从而打造更为灵活多样和更具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帮助其形成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价值观体系。比如借助在线教育平台的数据分析技术,根据大学生点赞、评论等情況了解其兴趣点,设置贴近大学生生活、能够引发其共鸣的教学主题,引导大学生在积极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帮助大学生进一步提高对“算法推荐”的认知水平,主动打破“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的束缚,克服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偏见和局限,摆脱圈层桎梏从而不断拓宽个人的知识领域和思维广度。

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不断加大对不良社会思潮的批判力度。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着力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自觉与甄别批判能力,使之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洞悉媒介信息背后所隐匿的价值导向,提高对错误思潮传播、演化规律的认识。同时,还应积极借力官方媒介矩阵的广泛影响力,充分利用在微博、B站、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的官方账号,通过引用其发布的高质量内容深入揭露西方势力借助媒介技术侵蚀中国文化根基和价值体系的企图,及时纠正和治理各种错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确保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思想文化交锋中,始终坚守中国的文化立场和价值高地。

(三)借鉴赋权范式:强化主体性构建,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赋权范式旨在培养受众的主体性意识,强调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媒介拥有更多的自主控制权。媒介素养的赋权教育呼应了数字时代下媒介环境对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也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展示提供了前提条件。马克思曾深刻揭示了主体性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用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来指导媒介素养教

育,就应该注重大学生主体性意识的培养,鼓励其不断挖掘自身潜能以获得超越媒介的能力,通过创新性重组和拓展媒介功能,实现媒介的再利用和再创造。由此,帮助大学生摆脱媒介“受众”的被动地位,成长为能够自由穿梭于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领航人”。

一方面,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的互动参与式教育模式。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通常以单方面灌输媒介知识为主,往往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参与性,难以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媒介化生存需要。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应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以具体实践来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探究欲望和创新意识。通过开展多元化的媒介活动,鼓励大学生积极尝试不同的媒介工具和平台,从而了解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例如,组织定期的媒介工作坊,邀请专业人士指导大学生参与媒介制作,使其在动手实践中了解媒介的构成和制作流程,逐步揭开媒介技术的神秘面纱,在技术祛魅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坚守和凝聚“人”的价值,避免沦为“媒介拜物教”的受害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提升。

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媒介的伦理教育,建立人与媒介之间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规范。深化大学生对媒介技术越界行为的伦理认知,引导其建立起负责任的自我反馈机制,学会反思自我的媒介行为,进而有意识地调整和优化个人媒介使用习惯,做到对媒介秩序的自觉维护,实现媒介使用与个人成长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注重提升大学生对虚拟世界交往关系的认知水平,引导其识别、应对虚拟交往中隐私泄露、知识产权侵犯等潜在风险,强化其风险防范和处理意识。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明确虚拟世界中的数字身份并非真实自我的全部,鼓励其在虚拟交往与现实交

往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张力,使之重新珍视真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进而推动虚拟世界中“原子化的个体”复归现实世界中更为紧密和有意义的“联结的共同体”。

结语

数字时代为大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渠道与自我表达平台,同时也对其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媒介素养教育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技术与伦理的桥梁,不仅关乎大学生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更是构建健康信息传播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面对数字时代后真相与泛娱乐化盛行、亚文化圈层与西方思潮冲击、技术异化与媒介崇拜加剧的媒介乱象,高校应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立场,批判性借鉴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与内容,加强媒介伦理与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思维、良好媒介行为习惯及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

参考文献:

- [1] HEPP A. Deep mediatization: key ideas in media & culture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20: 194.
- [2] 冯月季.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符号伦理反思[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48-162.
- [3] 邵芳强,吴云志.“后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的隐忧与改进[J].思想教育研究,2020(8):55-60.
- [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 [5] 李洁,李伟.数字异化视域下大学生的时间焦虑及其破解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3(11):92-98.
- [6] 姚姿如,喻国明.试论媒介化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新范式及逻辑框架[J].中国出版,2021(3):26-32.

The Logic,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Zheng Yinjue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where everything serves as a medium,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s an objective necessity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t also constitutes a vital avenu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yber power. To carry ou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that i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digital age, the three logical dimensions—value, practice, and identity—should be initiated,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education: "What kind of people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them,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them." The digital age has given rise to media chaos, such as the prevalence of post-truth and pan-entertainmentization, the impact of subculture circles and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s, the exacerbati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media worship. By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Western paradigm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s "immunization – discernment – critique – empowerment", and integrating it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led to enhance their media literacy an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ir personal capabilities.

Keywords: digital ag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上接第65页)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Types of N_1 de N_2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Zhang Xinjie¹, Wang Fufa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2.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N_1 de N_2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i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various kinds of interactively experi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entities N_1 and N_2 under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possession activated by "de". The semantic types of this structure are subject to three main interactively experiential modes between N_1 and N_2 : subject-object interaction, subject-subject interaction and object-object interaction. On the basis, the basic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this structur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performative interaction possession, intersubjective possession and subjectively construing possession, which are further subcategorized into 9 frequently-used and quite a lot of rarely-used basic meanings, quite a lot of frequently-used and rarely-used nonbasic meanings. These types of meanings crisscrossed constitute an open and hierarchical semantic schema network of N_1 de N_2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N_1 de N_2 structure; semantic type; prototypical categorization; schematic categorization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学位点简介

师资力量

学院专任教师中教授6人，副教授26人，一级笔译2人，获浙江省151人才和台州市211人才等省、市级各类人才称号10余人次。学位点现有专任硕士生导师14人，是培养翻译硕士人才的核心力量。学位点聘请了福州译国译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世宋，浙江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爱锐（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杭舟等10余人担任行业导师。90%以上的行业导师是拥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资深翻译，为翻译硕士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3年，学位点教师取得教学科研成果300多项，其中专著、译著、编著30余部，在国内一级权威期刊及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完成各级各类科研项目60多项，多人获省、市、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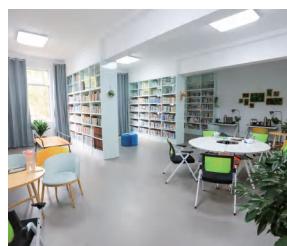
与福州译国译民集团达成合作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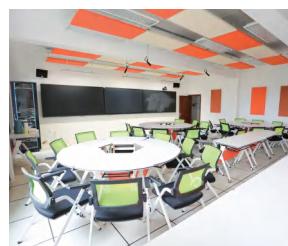
《外国文学》编辑部专家莅临指导

科研实践平台

学位点设有翻译研究所、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建有笔译翻译实验室、同声传译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国际贸易模拟谈判室、跨境电商综合实训平台、直播间及产品展厅等。学位点与译国译民集团、临亚集团等多家知名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培养优秀翻译人才；举办多渠道的校政企深度合作活动，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翻译和跨文化服务200余次，为提升翻译人才的实践能力搭建实战化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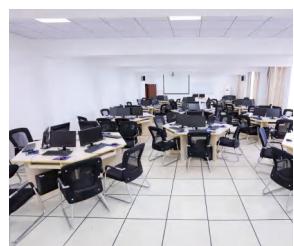
学院资料室



研究生教室



研究生研讨室



研究生实操室

中国 • 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7卷 第5期

(总第253期) 2025年10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53) Vol. 47 No. 5 Oct. 2025

封面题字: 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定价: 12.00元

ISSN 1672-3708



10>

